

# 高校改革与发展 参考资料汇编



内蒙古工业大学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室

二〇二〇年五月一日



# 目 录

## 高层声音

-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大力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 1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陈宝生, 2020.03.30
- 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5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 杜玉波, 2020.04.07

## 政策导读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0 年工作要点 …………… 12  
【原文出处】教高司函〔2020〕1 号, 2020.02.20
- 自治区党委、高校工委、自治区教育厅 2020 年工作要点 …………… 20  
【原文出处】内党高工函〔2020〕10 号, 2020.02.24
- 储能技术专业学科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4 年）…………… 33  
【原文出处】教高函〔2020〕1 号, 2020.01.17
- 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  
的若干意见…………… 38  
【原文出处】教研〔2020〕4 号, 2020.01.21
-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 …… 43  
【原文出处】教科技〔2020〕2 号, 2020.02.18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46  
【原文出处】新华社, 2020.03.20

# CONTENTS

---

## 高等教育研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 年发展报告  
——基于高校分类人才培养提质增效视角…………… 53  
【原文出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史秋衡, 2020. (2) :15-25
- 从“重点学科”到“一流学科”: 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范式转换…………… 73  
【原文出处】《高教探索》/ 谢冉、章震宇, 2020. (2) : 36-40
- 培养跨界融合精准培养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  
——三部委联合发文加快“双一流”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 83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 董鲁皖龙, 2020.03.04
- 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86  
【原文出处】《中国高教研究》/ 邓传淮, 2020. (2) : 6-8
- 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及路径(笔谈)…………… 91  
【原文出处】《教育科学》/ 钟秉林、洪成文、李立国、周海涛、李梈鹰, 2019.(6):1-13
- 疫情防控供给高等教育变革新动能…………… 115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 刘向兵, 2020.03.16

## 本科教学与研究

- 新工科教育治理刍议…………… 118  
【原文出处】《中国大学教学》/ 刘坤、陈通, 2020. (1) : 37-41
- 本科生的质疑态度及其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126  
【原文出处】《江苏高教》/ 阎光才, 2020. (3) : 1-8
- 大学生选课与评教行为理性与非理性倾向…………… 138  
【原文出处】《江苏高教》/ 李琳琳, 2020. (3) : 8-14
- 工科本科生主动学习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49  
【原文出处】《江苏高教》/ 丁飞已, 2020. (3) : 23-29

#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大力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宝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对劳动和劳动教育作出重要论述。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劳动教育纳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之中，明确提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做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必须增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紧迫感、责任感。

## 强化认识抓重点

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具有综合育人价值。劳动教育是新时期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加强劳动教育，关系到亿万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关系到国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大意义。切实抓好劳动教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加强劳动教育首先要学懂弄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新时代劳动和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内涵，明确劳动教育重点，把劳动教育做实、做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重大发展，也是新时代党对劳动教育的根本要求。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主要使命就是要让学生牢固确立“四个最”的劳动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不劳而获、贪图享乐、崇尚暴富的错误思想，让中华民族勤俭、奋斗、创造、奉献的劳动精神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身上发扬光大。

如何弘扬劳动精神？劳动精神是在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劳动教育不能泛化，必须按照《意见》要求，突出劳动教育重点，组织学生实实在在地劳动，以体力劳动为主，让学生在劳动中出力流汗，坚持日常生活自理，定期到工厂、农村劳动，到社会参加义务劳动，完成一定劳动任务。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强化责任担当，切切实实地感受、体认到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劳动价值，进而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崇尚劳动。今天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在不愁吃穿的环境中长大的，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精神、奋斗精神更为重要，也更有挑战性。对学生的劳动教育不仅要有质的要求，还要有量的规定，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更不能在课上“听”劳动、在课外“看”劳动、在网上“玩”劳动，要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防止弄虚作假和走过场。

### 点面结合抓覆盖

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内容、专门的载体和考核评价办法。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把劳动教育目标树起来，把劳动教育必修课开出来，把学生课外劳动实践时间定下来，把劳动周等实践活动搞起来，把考核评价体系建起来。特别是要引导学校和学生加强时间管理，明确一定时间参加劳动，努力做到劳动和学习相互促进。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读书，不参加劳动，不接触社会实践，事实证明，就很难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增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不利于有效学好各门功课，增长实际本领。

在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的同时，其他课程、其他活动也要结合学科特点、活动特征，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确保劳动教育全方位融入。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艺术等学科，要有重点地纳入劳动创造人本身、劳动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不分贵贱等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纳入歌颂劳模、歌颂普通劳动者的篇目，纳入阐释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加强对学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合法劳动等方面的教育。数

学、科学、地理、技术、体育等学科，要注重培养学生劳动的科学态度、规范意识、效率观念和创新精神。高等学校要将劳动教育有机纳入专业教育，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加强与行业骨干企业、中小微企业紧密协同，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门设课要与有机融入相结合，实现全覆盖，形成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劳动教育新要求。

### 面向全体抓贯通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培养必备的劳动能力，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有序安排劳动教育内容要求，形成各学段依次递进、贯通一致的劳动教育制度，把劳动教育任务落到实处。

《意见》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对小学、中学、大学各学段劳动教育内容要求做了系统设计。各个学段、各类教育要围绕重点，把准定位，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在目标要求、内容选择、组织实施、考核评价等方面做好衔接，持续推进。中小学要夯实基础，打好爱劳动的底色。普通高校要通过劳动教育，引导学生积累职业经验，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职业院校要根据劳动教育新要求，调整和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抓好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强化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教育，让学生增强职业荣誉感，感受和体会平凡劳动中的伟大。

### 注重统筹抓协同

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要求面对真实的生活世界和职业世界，以动手实践为主要方式，学会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塑造自己，提高自身素养。在劳动教育中，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承担实施劳动教育的主体责任，强化劳动观念、劳动技能和劳动品质的系统培育。劳动教育仅靠学校关起门来抓是不行的，必须推动建立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齐抓共管、协同实施的机制。家庭要注重发挥基础作用，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让孩子养成从小爱劳动的习惯；社会各方面要发挥支持作用，充分利用各类资源，为劳动教育提

供条件保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积极支持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是每个社会机构、企事业单位应尽的义务和共同的责任。

当前,社会上还存在着轻视劳动,特别是看不起普通劳动者的不良倾向。从根本上讲,劳动教育就是要在全社会创造浓厚的劳动文化,激发青少年学生热爱劳动的内生动力,教育引导他们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立志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是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阵地,教育部门要走在学习、宣传、传承劳动文化的前列,结合植树节、学雷锋纪念日、五一劳动节、农民丰收节、志愿者日等,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主题教育,培育崇尚劳动的校风、教风和学风;要积极协调新闻媒体大力传播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思想,大力宣传劳动教育先进学校和先进个人,让“四个最”的劳动价值观深入人心。



# 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杜玉波

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既有着十分丰富的实践内涵，又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全新的世界意义。立足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跨越的新起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需要，我们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

## 1、完善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立德树人绝不仅仅停留在德育课程的讲授上，而是应该渗透到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

今天的大学，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延伸到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承载着越来越多的使命和责任。但究其根本，立德树人仍然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是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核心理念，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有效落实这个根本任务，需要我们坚决贯彻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想理念，构建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相统一、校内教育和校外培养相协同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在大学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解决大中小学德育教育衔接不紧密的突出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大中小学的德育在传授内容上呈现步步高的趋势，但在实践层面上却难以达到层层深的效果，必须有效解决知识传授与行为实践相背离的矛盾。与中小学相比，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认知范式

和交际行为都具有一系列新特点，特别是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方面，呈现出思想观念多元化、价值追求个性化、人生理想务实化等鲜明特征。对于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的思想品德教育，当代大学生大多有一个独立思考、评判选择、内在转化、自觉践行的过程。这就需要树立系统思维，科学把握各个阶段学生成长的认知规律，建立既与中小学德育相衔接，又真正适合大学生成长特点的一体化育人体系，从而使中小学的德育教育在大学阶段得到巩固和完善，真正内化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

在大学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中“五育”割裂化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立德树人绝不仅仅停留在德育课程的讲授上，而是应该渗透到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诸多方面中。要明确所有教师都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德育的要求贯穿到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之中，加强学校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力构建以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为依托，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形成强大育人合力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在大学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解决长期存在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不协同的突出问题。当代的大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所以，在大学生的教育培养特别是思想品德养成过程中，大学不能再唱独角戏，应该统筹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育人资源。特别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这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是每一个人教育的起点。同时，要高度重视社会教育，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必要延伸，是学生走向社会不可或缺的历练过程。只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不唱对台戏，同唱一台戏，才能相互协同，形成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强大合力。

## 2、夯实以服务需求为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

——压缩“平原”，多建“高峰”，避免赶速度、铺摊子、求规模

学科专业设置的特色是一所高校的最根本特色，学科专业建设水平是一所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整个体系中，各高校应该立足本校实

际，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需要，设置科学合理的学科专业体系，这是解决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这一结构性矛盾的迫切需求。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供给与需求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就业难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另一方面是人才供给远远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产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就业难与人才难得的矛盾更加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过程中，一些高校过分关注规模数量发展，而忽视了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内外部管理等结构的调整，影响了高等教育整体效能的发挥。所以，要扎根中国大地、坚持服务需求这一导向，把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前提条件，把落实国家标准作为学科专业建设的底线要求，确保学科专业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选择性地设置和发展学科专业，是学科专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类型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已经从相对单一的结构向多元多样化办学结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不是说学科专业越多越好，越全越好。学科专业不在多、不在全，而在特、在强。关键要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避免赶速度、铺摊子、求规模。尤其要把学校传统的优势学科专业做强，把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做精，把新兴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做实。一些高校选择学科专业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些问题，简单与其他学校的学科专业进行对比，认为论文发表量高的学科专业就是优势，忽视了学科专业和学校的特色定位。

实际上，“特色+优势+一流”，才是真正的一流，才是持久的一流。在具体操作上，要不断强化学科专业高点，培育学科专业重点，扶持学科专业增长点。既要克服“唯学科专业论”的倾向，也要克服“撒芝麻盐”的倾向，把有限的资源统筹利用好，好钢用在刀刃上，形成学科专业发展优势带动、多元发展、交融并存的良好态势。另外，要针对高校学科专业上的盲目布点、重复设置，“多而散”的功利性现象，必须痛下决心建立预警机制，把就业状况反馈

到人才培养环节上来，引导高校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统筹好学科专业的存量升级、增量优化、余量消减工作。

### 3、形成以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分类办学体系

——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综合型，要形成梯度、对接需求，要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既有研究型大学，又有应用型大学，还有职业技术型院校。我们的各级各类高校要在不同地区、层次、领域内办出特色，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把多样化、有特色、服务需求作为高校发展的战略选择，实现高校的错位发展、内涵式发展，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格局。

在学校层次类型上，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综合型，要形成梯度、对接需求。要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既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也要发展应用型大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要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实现高校差异化发展。本科教育要培养适量的基础性、学术型人才，但更重要的是加大力度培养多规格、多样化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研究生教育要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培养结构从以学术学位为主向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协调发展转变。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为重点，走校企结合、产教融合、突出实战和应用的办学路子。近年来，教育部强调，特色学校不能变为综合学校，专科高职学校不能升为普通本科学校，职教体系学校不能转为普教体系学校。现在，职业学校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着办学层次的提升，转入普教体系发展，而是保留职业学校名称特色，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本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路径。

同时，要通过推动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使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比例更为合理。通过加快“双一流”建设，形成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要针对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办学特点和资源需求，形成分类评价的体系标准和管理政策，建立不同类型高校的经费投入、人事管理、质量评估、监测评价制度，逐步构建起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分类办学体系。

#### 4、构建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

——学校过于追求排名是一种学术短视的功利行为，世界上名声赫赫的大学，没有哪一所是通过排名排出来的

评价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践行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价值导向，构建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这样一种教育评价体系，应重点把握好四个方面：

一是培养一流人才，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培养的学生优秀不优秀。大学应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在其中涌现出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工巧匠、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

二是产出一流成果，把对国家的贡献度和国内外公认度作为重要考量。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的使命。大学的成果应该表现为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难题、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答解决区域行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等多种形式。

三是发挥一流影响，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最高评价。大学的影响源自大学文化的沉淀和积累，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趋势的引领。要以长远的眼光、历史的视野，审视一所大学对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以及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

四是办好一流本科，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立校之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础在本科。没有高质量的本科，办好大学就缺乏根基。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在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投入等方面具备充足的保障。在办学质量的评价条件中，要加大本科教育的指标权重，使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真正成为大学的底色和第一使命。

需要强调的是，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评价体系时，可以借鉴参考国外一些通行的做法，在可比领域和具有显示度的指标上，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赢得国际的认可和尊重。但是，我国的大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色，



绝不能被国外的排名指标牵着鼻子走，更不能简单套用、完全依赖。建设“双一流”，不能唯国际排名论英雄、论成败，关键是要解决好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这是我国大学不可回避、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学校过于追求排名是一种学术短视的功利行为，不符合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普遍规律。世界上名声赫赫的大学，都是因为优秀人才培养和卓越学术成果积淀而得到公认的，没有哪一所是通过排名排出来的。

## 5、坚持以党的领导为统领的内部治理体系

——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格局，释放办学活力，激发办学动力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要构建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职能部门和专业院系为依托，以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理事会等为支撑的现代化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这个治理体系，才能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格局，释放办学活力，激发办学动力，不断提升高校办学治校的治理能力。

首先，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增强政治引领力。在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根本制度，就是党委重在谋划和决策，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职责，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校长重在实施和管理，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依法行使职权。在这一体制运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好“集体领导、科学决策、分工负责”这三个关键点。

其次，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各个院系和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形成高效、协调、顺畅的运行机制。注重激发院系“中场发动机”作用，把党的教育方针和重大战略部署，落实到院系的各项工作中来。充分发挥学校各职能部门联动的工作优势，始终围绕学校的中心任务特别是人才培养这个核心，坚持不懈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要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原则，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再次，要学习借鉴国内外办学治校先进经验，把学校的学术组织和群团组

织作用发挥好，创造良好的办学生态环境。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既相对分离，又相互促进，形成相得益彰的良好工作机制。既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学术的事，多听教授的”“上课的事，多听老师和学生的”；又要充分发挥工会、教代会、学代会在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作用，调动广大师生参与学校改革发展的积极性，推进学校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还要充分发挥理事会或董事会在参与讨论学校发展规划、经费筹措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0 年工作要点

教高司函〔2020〕1号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深入实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行动，全力推进高等教育“质量革命”。

**工作目标：**持续打好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工作主题：**提高提高再提高。

**工作主线：**全面推进“四新”建设，持续深化新工科、新农科建设，积极推进新医科、新文科建设。

**工作重点：**“三抓三促”，抓领导促管、抓教师促教、抓学生促学。

**工作发力点：**抓教师、促教学。

## 一、全面推进“四新”建设

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促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思想、理念、理论、技术、评价、方法、标准、体系、文化改革创新，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深化新工科建设。启动第二批新工科建设研究与实践项目，深化理念研究与实践探索。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优化工科专业设置。深化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等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组织形态创新。深化教学改革，推进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提质增效。加强资源条件建设，推进工程创新训练中心、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共享型实习基地、人工智能教学资源建设等工作，分批开展工学院院长和骨干教师培训。抓好紧缺人才培养，依托示



范性微电子学院、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储能学院、网络安全学院等，统筹推进关键核心领域人才培养。

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紧扣时代新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和科技革命新进展，设立一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项目，分类推进文史哲、经管法、艺术、教育等领域新文科建设。强化价值引领，重点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深化与实务部门合作，继续办好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启动新闻实务、经管实务、文史哲等系列大讲堂。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持续深化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加强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推进外语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打造国际组织后备人才“蓄水池”，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持续推进新农科建设。召开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重要回信精神一周年座谈会，研究制定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设立一批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实现高等农林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制定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指导意见，加快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新医科建设。实施新一轮医学教育综合改革，推动“5+3”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医学+”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印发《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设置指南》，建设国家教学案例共享资源库，支持长三角等区域医学院校加快建设新医科。研究制定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中医药教育传承创新发展。办好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覆盖临床医学、中医学、护理学专业，实现“中医西医齐赛、医疗护理共比”。

## 二、举办首届世界慕课大会

把学习革命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生产力，建立“互联网+教学”“智能+教学”新形态，促进学习方式变革，提高教学效率，激发教与学的活力。

召开世界慕课大会。充分利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组织高校在线教学的经验，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慕课建设方案，让这次革命性的实验转化

为教育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打一场“学习革命”之战,深入推进教育观念革命、课堂革命、技术革命、方法革命。促进更多高校课程在国际著名课程平台和更多国家平台上线。组建世界慕课联盟。发布《慕课发展北京宣言》。下好从并跑到领跑的战略先手棋。把首届世界慕课大会开成世界高等教育学习技术革命的大会,把大会办成世界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形态发生重大改变的标志会议,推动实现变轨超车。

### 三、办好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以“敢闯会创”为核心要素,引领高校人才培养范式变革,提升学生敢闯的素质、会创的能力,建立新的人才质量观、新的教学质量观、新的大学质量文化。

完善赛事组织持续发展机制。按照更全面、更国际、更中国、更教育、更创新的要求,做好第六届大赛各项筹备工作。立足大湾区改革开放前沿,汇聚世界高水平大学和顶尖专家,全面提高大赛国际影响力,努力把大赛办成全球最有影响的双创顶级赛事。

持续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重温改革开放奋进之路,激发大学生“敢闯敢干”奋斗精神。

打造创新创业教育升级版。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建好国家级高校双创示范基地、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试点开展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深入开展“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导师示范培训。

### 四、召开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推进会

落实“四点一线一面”战略布局,加快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增强服务区域发展能力,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共赢发展。

召开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推进会。印发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若干意见,深入宣传解读文件精神,推广典型经验,全面动员部署振兴中

西部高等教育工作。完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六大机制，打造西北、西南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支点，推进高校集群发展，推进完善质量导向的支持机制，建立健全部际协调机制和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联席机制，建立东中西部高校全国性支援合作对接平台，推动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建设，成立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加快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高质量完成教育脱贫攻坚任务。精准把握收官阶段的新要求与新任务，认真抓好定点帮扶云南临沧工作落实，做好对广西都安县和贵州纳雍县调研指导、挂牌督战。组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项目团队对接（临沧、都安、纳雍、威县、青龙）脱贫需求。深入开展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提高受援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实施医学教育精准扶贫攻坚行动计划，继续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培养6000名左右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为基层输送高素质全科医疗人才。继续实施“慕课西部行计划”，推动西部高校应用慕课开展线上教学和混合式教学。

## 五、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充分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深入挖掘各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促进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实现价值引领、知识教育、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研制发布《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统筹抓好课程、课堂、教材和课程思政工作，发挥专业课教师的育人作用。召开全国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推进会，交流各地各高校工作经验，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选树一批课程思政先行高校，打造学校有氛围、课程有示范、教师有榜样、成果有固化的课程思政建设典型。在不同类型、不同性质课程中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教学名师和团队，构建国家级、省级、校级课程思政名课名师三级建设体系。及时总结提炼课程思政建设的新成果、新经验、新模式，设立一批课程思政研究项目，建设一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 六、持续推进一流专业“双万计划”

应对产业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人才的迫切要

求，积极开展专业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新建工作，建好建强一流专业，打造一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支撑载体。

做好2020年度一流专业建设点遴选认定工作。加强对一流专业建设点的指导，总结经验，完善支持措施，持续推进条件建设，深化综合改革，提升建设质量。组织研究制订一流专业认证标准，引领一流专业建设。遴选认定3500个左右2020年度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做好省级一流专业推荐报送工作，推动各地完善专业建设三年规划。

改进优化专业设置工作。把按社会需求办专业作为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前提条件，把落实国家标准作为专业建设的底线要求。完善专业申报网上平台，加强教指委对专业设置的咨询把关，开展高校专业设置负责人培训，引导高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急需领域专业设置，避免大量重复设置“过热”专业。

## 七、统筹实施一流课程“双万计划”

全面开展一流课程建设，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形成多类型、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深入推进“课堂革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释放潜能、全面发展，推动课堂改革成为教育者的一场心灵革命、观念革命、技术革命、行为革命。

完成首批“双万计划”一流课程认定工作，发布首批国家级一流课程名单。统筹规划国家级和省级一流课程的持续建设，打造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金课”。

大力推动慕课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应用。倡导国内课程平台横向联合，依托各类课程平台及联盟，开展教学交流研讨。加强慕课规范化管理，出台狠抓慕课建用学管推进新时代高校学习革命的意见，加强分类指导，建设线上“金课”，促进优质课程资源更加广泛共享，为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变轨超车”奠定基础，引领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课程改革与课堂革命。

开展全国教材建设奖金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评选工作。根据《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指导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示范中心开展评估

工作。

## 八、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探索完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造就更多有家国情怀、人文关怀、世界胸怀的杰出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医学科学家。

遴选认定 2019 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推动多样化探索，支持高校开展“三制”（书院制、学分制、导师制）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启动 2020 年基地申报工作。

推动政策协同。完善拔尖计划 2.0 长效工作机制，实现部委协同、司局联动，做好拔尖计划 2.0 与英才计划、强基计划的衔接。

推动交流共享。协调推进拔尖计划 2.0 工作交流、学术研讨和学生交流等，研发拔尖计划 2.0 信息平台，促进经验互鉴、资源共享。开展拔尖计划 2.0 课题研究工作，形成一批有质量有分量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 九、全面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大力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使卓越教学成为每一位教师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建强建好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成立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指导各省份、区域和行业性教师教学发展联盟机构建设，引导各高校加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提升教学学术水平，打造追求卓越教学的质量文化。组织培训平台和有关高校全面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以教学理念、教学技术和方法、教学内容改革为重点，推动实现青年教师上岗培训全覆盖、三年内教师全部轮训一遍。选树一批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建立完善基层教学组织。研究制订加强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意见，推动高校以院系为单位，恢复设立或完善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实现基层教学组织全覆盖、教师全员纳入基层教学组织。推动高校制定完善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相关管理制度，提供必需的场地、经费和人员保障，由院长、高水平教授等担任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落实责任制，激发基层教学组织活力。探索推



进“虚拟教研室”项目，以现代信息技术助推教学组织建设。

选树一批新时代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教务部、本科生院），引领提升教务管理服务能力。构建高校图书馆服务新体系，推动图书馆融入本科教育全过程。

## 十、完善部省校联动的基本工作制度

强化组织动员，采取“部省司处共同发力、上下联动，各地各校同频共振、协作并进”方式，深入推进“质量革命”，引导各类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加强对直属高校的统筹指导工作。支持直属高校深化改革，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完成第十届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执行主席换届工作，完善咨询委员会建言咨政工作机制，发挥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战略咨询作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参考。以编制《教育部直属高校年度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为契机，推进科学数据分析，客观反映直属高校发展贡献与面临困难。探索直属高校多维评价分析，激发办学活力，引导直属高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做好直属高校“十四五”规划编制指导工作，引导直属高校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发展目标、重大举措，全面提升直属高校办学水平。

办好全国高等教育年度工作会议。召开第29次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暨2020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分析研判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发挥大学报国强国的重要战略作用，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深化综合改革，提升服务能力，引导学生刻苦学习、教师潜心育人、学校风清气正，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召开2020年高教（厅）处长会。全面部署年度工作，指导各地各高校深入实施振兴本科教育行动方案，持续推进“以本为本”“四个回归”，加强从严管理、从严治教，合力推进全面振兴本科教育“三部曲”。部署指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按照高教法执法检查报告要求，持续抓好改进落实工作。

指导地方应用型高校和民办高校发展。以推进“四新”建设和实施“双万计划”为契机，加快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深化产教融合和城校共生，推出

一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示范案例和一流专业。指导民办高校深化内涵建设，在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中支持民办高校建设，推动民办高校与企业多样化合作共建、多途径提升办学质量。

### 十一、狠抓党建增强履职尽责能力

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提升理论水平，加强政治建设，奋力担当高等教育强国报国的历史使命。凝心聚力建设“奋进支部”。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强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强化工作实效，严控发文数量，提高发文质量，加强会议管理，落实会议计划。践行“一线规则”，打造高等教育司“百校千课”工作品牌，组织全司党员干部深入高校开展蹲点式调研、听课。弘扬奋进文化，夯实干部队伍能力基础，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努力打造高质量奋进队伍，营造“一想三能”“四会两商”温馨友爱的文化氛围。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通报精神，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会议精神、部党组《关于加强廉政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精神等。坚持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坚持“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全部通过召开司务会集体决定。严格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做好一流专业评审、“互联网+”大赛、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等廉政风险防控，构建以岗位为点、流程为线、制度为面的风险防控体系。

# 自治区党委、高校工委、自治区教育厅 2020 年工作重点

内党高工函〔2020〕10 号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收官之年。

全区教育工作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治理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下功夫、求实效，写好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教育篇章。

##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目标任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教育系统特色，聚焦重大教育改革任务，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工作措施：**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程，纳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内容，切实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工



作。开展全区高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制度建设专项调度，完善办学治校制度，抓好制度体系建设。举办高校领导干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暑期读书班，每季度举办1次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会。聚焦教育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教育科学研究。

**责任单位：**组织部、办公室、党建办公室、机关党委、教育科学研究所。

## 2. 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

**目标任务：**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健全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工作措施：**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实施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深化培育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落实党员发展纪实制度，提高高校党员发展质量。加强中小学校和民办学校党的建设，推进中小学党组织建设规范化。研制《内蒙古自治区民办院校派驻党组织书记兼政府督导专员实施办法》。推动呼和浩特地区民办高校党委换届。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持续加强厅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全面提升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规范化水平。

**责任单位：**组织部、党建办公室、机关党委、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 3. 着力打造爱国奉献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目标任务：**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加注重实践锻炼、更加注重提高专业化水平、更加注重增强斗争本领，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工作措施：**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忠诚教育，突出选人用人政治标准，注重在严峻复杂的斗争一线、急难险重的任务中真枪真刀地磨砺、识别、考察干部。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健全优秀年轻干部选育管用的全链条机制。研制《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处级干部调整动议备案服务手册》，优化工作流程。配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做好“草原英才”“万人计划”“新世纪321人才工程”遴选评审工作。举办第三期高校党政领导班子副职专题培训。

**责任单位：**组织部（人事处）、机关党委。

#### 4. 纵深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目标任务：**坚持真管真严、常管长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贯通协同、形成合力。

**工作措施：**制定高校工委、教育厅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进警示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不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四风”反弹回潮，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巩固为基层减负成果。启动开展教育巡察，建立教育巡察工作基本制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直属高职院校和事业单位政治巡察监督。

**责任单位：**机关党委、办公室、组织部、驻厅纪检监察组。

#### 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面动员、全面部署、有效防控，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工作措施：**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和自治区党委部署，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要求做好防控工作。组织动员全区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广大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确保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让党的旗帜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责任单位：**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

## 二、完善立德树人机制

#### 6.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目标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树牢爱国主义根基，一体化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工作措施：**研制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的具体措施。深化“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改革，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出台《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实施意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开展少年传承中华美德、圆梦蒲公英、开学第一课等主题教育活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体现到教育全过程。

**责任单位：**学生工作处（思想政治工作部）、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民族教育处、学位管理与研究生处。

## 7.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目标任务：**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推动大中小学体育、美育一体化建设，加强劳动教育、国防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

**工作措施：**开展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周末联赛，探索深化校园足球联赛社会化机制，加强体系建设。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组织参加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举办全区大中学生单项体育竞赛。举办全区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加强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持续推进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学生军事训练工作实施办法》。构建劳动教育责任链条，加强劳动实践教育试点学校建设。开展第二批自治区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创建工作。

**责任单位：**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民族教育处。

## 8. 提升基础教育教学质量

**目标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研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

**工作措施：**制定出台《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全面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教研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教研队伍和教研工作体系建设。加强和改进实验教学，出台实验教学指导目录，修订完善实

验室管理规定。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评估工作，发挥好考试命题的导向作用。全面修订教辅材料目录，修订地方教材管理办法和教材委员会章程。修订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和音体美教学仪器及器材设施配备7个标准规范。组织实施2020年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推动全区义务教育质量检测结果应用工作。

**责任单位：**基础教育处、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教育督导评估中心、教育装备技术中心、教学研究室。

### 9. 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

**目标任务：**严格中小学招生和教学管理，持续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切实减轻学生负担。

**工作措施：**严格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管理，严肃查处违规办学行为，坚决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继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综合专项治理，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加强对校外线上培训机构的备案审查，规范校外线上培训行为和线上培训市场监管。

**责任单位：**基础教育处、财务处、发展规划处、驻厅纪检监察组。

### 10. 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目标任务：**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以上，全面提升社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应用水平。

**工作措施：**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普及攻坚工程，加强专项督导。继续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组织“三类重点人群”和农村牧区蒙古语授课幼儿园教师普通话培训。开展全区“中华经典诵写讲”“书法名家进校园”“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开展自治区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评估验收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校创建活动。

**责任单位：**汉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处、民族教育处、督导室。

## 三、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 11. 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

**目标任务：**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和城镇小区配套园专项整治，扩大普惠性

学前教育资源。年内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50%。

**工作措施：**继续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完成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全面整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提高到年生均 600 元，适当提高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规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工作。指导各地贯彻落实幼小衔接行动计划，实现幼儿园和小学双向衔接。

**责任单位：**基础教育处、发展规划处、财务处。

### 12. 推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

**目标任务：**2020 年基本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控制在 4% 以内）。改善农村牧区学校办学条件。

**工作措施：**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试行）》。定期通报消除“大班额”工作进展情况。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指导各地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全力推动中小学厕所改造达标。

**责任单位：**基础教育处、发展规划处、财务处。

### 13. 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

**目标任务：**着力解决普通高中发展模式单一、同质化问题，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

**工作措施：**继续实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开展县域优质特色多元化高中和自治区级优质特色示范高中创建工作。建立普通高中消除“大班额”台账，督促指导各地如期完成专项规划目标。将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高到年生均 1000 元，提升普通高中经费保障水平。

**责任单位：**基础教育处、财务处、职业教育处。

### 14. 推进职业教育融合发展

**目标任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稳步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点，着力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工作措施：**贯彻落实职教 20 条，完善职业教育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提高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扩大 1+X 证书制度试



点、现代学徒制试点。启动自治区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加强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举办全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教学能力比赛。做好2019年高职扩招学生培养和教学管理工作。完善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

**责任单位：**高等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教师工作处。

### 15. 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目标任务：**加快“双一流”建设，夯实本科教育基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工作措施：**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落实“部区合建”协议、加快推进内蒙古大学“双一流”建设的若干意见》。统筹推进自治区博士学位授权点结构和布局调整，做好学位授权点增列审核工作。继续推进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业遴选与建设工作。实施自治区“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做好自治区级五类一流本科课程的建设工作。举办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继续实施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积极融入“科技兴蒙”行动，促进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完善高校科研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落实好基层就业和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政策，开展精准就业指导服务。出台《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责任单位：**高等教育处、发展规划处、学生工作处（思想政治工作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处、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助学管理中心。

### 16. 优先重点发展民族教育

**目标任务：**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质量。

**工作措施：**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落实优先发展、重点扶持民族教育工作保障机制，统筹各项教育工程向民族教育倾斜。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加强双语教育，继续实施各项招生计划，加大人才培养和加大蒙汉双语教学教师培养和培训力度。提高蒙古语授课教育教学质量，加强

蒙古文教材建设，加大中小学（幼儿园）蒙古文教材审查力度，强化大中专院校蒙古文教材编审、出版、发行工作。

**责任单位：**民族教育处、蒙古文教材编审办。

#### 17.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目标任务：**加快制度建设进程，加强民办教育管理。

**工作措施：**稳步推进民办学校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改革。建立健全民办学校理事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推广使用《内蒙古自治区民办学校信息查询系统》，将教育部门审批设立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基本信息向社会公开，扩大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处、发展规划处、教育信息中心。

#### 18. 提高继续教育供给能力

**目标任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供更多优质资源。

**工作措施：**引导各类院校开展面向重点人群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深入实施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推动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开设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课程，生源相对不足的中职学校加挂社区学校、老年学校牌子，扩大旗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终身教育资源。规范高校网络高等学历教育管理。

**责任单位：**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教研室。

### 四、提升教育治理能力

#### 19. 深化考试制度改革

**目标任务：**建立健全高考综合改革制度体系，加强考试招生治理能力建设，完善高考综合改革条件保障，积极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推进职业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工作。

**工作措施：**出台《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修订《内蒙古自治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

意见》。加强命题管理队伍和命题专家队伍建设，建立考试评价制度，着力提高命题质量。规划论证命题基地建设，筹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科学评估普通高中办学基础条件，优化普通高中师资结构，补齐高考综合改革短板。推动高中教育教学全面改革，扩大选课走班试点范围。进一步深化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评价方式，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责任处室：**基础教育处、政策法规处、发展规划处、财务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民族教育处、教师工作处、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教学研究室。

## 20. 提高依法治教能力

**目标任务：**完善教育制度体系，加强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校，提升治理能力。

**工作措施：**启动编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四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立法，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学前教育条例》立法调研，推动纳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计划，修订《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健全依法行政机制，全面落实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加强教育行政执法，落实执法三项制度，积极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推动高校依法依规自主办学。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创新普法宣传教育形式，组织中小学法治教师培训。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处、发展规划处、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

## 21. 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目标任务：**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动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

**工作措施：**落实教育部等五部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若干意见》，做好自治区督查整改工作。加大教育统计数据公开力度，发挥教育统计监督职能。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处、办公室、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处、学位管理与



研究生处、教师工作处。

## 22. 推进教育督導體制機制改革

**目标任务：**完善督導體制機制，加強對各類學校辦學行為和教育熱點難點的評估監測。

**工作措施：**研製《內蒙古自治區深化新時代教育督導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開展對盟市級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職責評價。繼續開展幼兒園辦園行為督導評估。穩步推進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督導評估認定，指導申報旗縣（市、區）開展創建工作。聘任第六屆自治區督學，做好各類督學培訓工作。開展義務教育教師工資待遇督查工作。

**責任單位：**督導室、教師工作處、教育督導評估中心。

## 23. 推動教育對外開放

**目标任务：**深入推進“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着力打造“留學內蒙古”品牌，提高合作办学质量，深化人文交流。

**工作措施：**堅持以與俄蒙教育交流合作為重點，以雙向留學教育為基礎，統籌推進涉外辦學、國際科研合作、中外人文交流，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研製《內蒙古自治區學校招收和培養國際學生管理實施細則》和《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獎學金管理辦法》。推動孔子學院（課堂）可持續發展和對外漢語教學推廣工作。推進內蒙古大學等高校為蒙古國培訓教師項目。加強教育系統因公臨時出國（境）管理服務。

**責任單位：**對外合作與交流處。

## 五、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 24. 完善師德師風長效機制

**目标任务：**深化師德建設主體責任落實，完善師德師風建設長效機制，着力營造尊師重教的社会氛围。

**工作措施：**研製《師德失範行為處理辦法》《高校、中小學、幼兒園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負面清單》。嚴格落實《新時代高校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新時代中小學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新時代幼兒園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

则》。开展“强师德、铸师魂”活动以及教师节评选表彰和先进事迹宣传活动。研制《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全面清理和规范针对教师的各类督查、检查、考核、评比和抽调借用教师行为。

**责任单位：**教师工作处。

## 25. 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目标任务：**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升教师培训质量。加强农村牧区教师队伍建设。

**工作措施：**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印发《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评估认证实施办法》，稳步推进师范类专业评估认证。组织实施“国培计划”“区培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实施自治区公费定向培养师资计划、特岗教师计划，优化农村牧区学校教师结构，加大农村牧区学校教师培养储备。开展中小学特级教师及退休教师到乡村支教活动。

**责任单位：**教师工作处、发展规划处、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民族教育处、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 26. 深化教师管理改革

**目标任务：**推动教师管理机制创新，增强教师队伍治理能力。

**工作措施：**出台《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的指导意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研制《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实施办法》《高校人员总量备案管理改革试点方案》。深化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全面推进教师校长交流轮岗。稳步推进教师管理信息化，启用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

**责任单位：**教师工作处。

# 六、完善教育保障机制

## 27. 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目标任务：**全面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提高控辍保学水平，强化精准资助，

办好特殊教育，按时保质完成教育脱贫攻坚任务。

**工作措施：**聚焦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落实“一县一策”教育脱贫攻坚方案。坚持“一家一案、一生一案”，运用控辍保学管理动态数据库加强日常监督和专项督导，确保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坚决落实“四不摘”要求，做好教育厅定点扶贫工作。继续开展“农校对接”。加快推进京蒙协作教育项目落地。强化精准资助，规范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程序。做好农村牧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完成10所特殊教育学校建设任务，加强资源中心、资源教室建设，推动医教结合、送教上门、随班就读。

**责任单位：**发展规划处、财务处、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机关党委、助学管理中心。

## 28. 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目标任务：**完善政府主导、权责清晰、分担合理、更为多元的教育经费筹措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的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体系。

**工作措施：**明确教育领域自治区和盟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各级各类教育政府拨款、学校收费、学生资助、社会投入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加强“两个只增不减”等法定要求的动态监测，加强拨款标准、收费标准、资助标准的动态调整。调整优化教育经费存量结构，新增经费重点保障困难地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多投向教师、学生和教育教学改革等内涵建设。保障农村牧区教师待遇，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应当水平不低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全面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研制《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推动高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

**责任单位：**财务处、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民族教育处、督导室、教师工作处、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

## 29. 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

**目标任务：**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全区中小学校（含教学点）光纤接入覆盖率达到100%，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

**工作措施：**推进教育云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盟市建设以服务区域内所辖学校数字校园应用为重点的区域教育云平台，加大数字校园建设力度，培育优质在线教育资源。推动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应用，推动“同频互动课堂”在教研教学中常态化应用。严格执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推进学校视频监控系统联网应用，加强教育数据治理与应用，提升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

**责任单位：**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处、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民族教育处、教师工作处、学校安全管理处、教育信息中心、教学研究室。

### 30. 建设平安和谐校园

**目标任务：**以防范重大安全事故为重点，进一步推动学校安全体系建设，确保学校安全稳定和谐。

**工作措施：**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履职尽责、失职追责”的安全工作责任体系，把各项安全工作制度落实落细。落实“三个清单”制度，集中治理重大安全隐患。完善应对突发事件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继续推进警务室规范化建设和平安校园创建活动。开展“四D”厨房创建活动，进一步提高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开展易燃易爆危化品专项整治，推动学校实验室和实训场所安全规范管理。启动学校安全素质教育图书角建设。开展防范学生意外伤亡、溺水、校车交通事故专题教育活动。继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项整治校园及周边环境。落实最高检“1号检察建议”，进一步加大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力度。推动落实《加快推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建设微型消防站，集中开展打通疏散通道专项行动，在中小学全面普及消防疏散救生操。

**责任单位：**学校安全管理处、政策法规处、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等教育处、民族教育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处。

# 储能技术专业学科发展行动计划 (2020—2024年)

教高函〔2020〕1号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对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储能技术在促进能源生产消费、开放共享、灵活交易、协同发展，推动能源革命和能源新业态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储能技术的创新突破将成为带动全球能源格局革命性、颠覆性调整的重要引领技术。储能设施的加快建设将成为国家构建更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为加快培养储能领域“高精尖缺”人才，增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能力，以产教融合发展推动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决定实施储能技术专业学科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4年）。

## 一、背景和意义

随着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由依赖传统化石能源向追求清洁高效能源的深刻转变，我国能源结构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无论是从电力能源总量结构，还是从装机增量结构，以及单位发电成本构成看，清洁能源发展势头迅猛，已成为我国加快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

储能产业和储能技术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核心支撑，覆盖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居民侧以及社会化功能性储能设施等多方面需求。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储能产业，大力规划建设储能项目，加强储能产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储备，抢占能源战略突破高点。随着我国储能技术发展从试点建设向大规模产业应用加快推进，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等学校面向能源



革命战略需求，培育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研究团队，在储能相关领域积累了大量基础性研究成果，在部分相关学科实现了原创性关键突破。但同时也要看到，储能技术作为重要的战略性新兴领域，需要加快物理、化学、材料、能源动力、电力电气等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协同创新，高校现有人才培养体系尚待完善，相关学科专业尚待健全，特别是学科专业壁垒急需突破。立足产业发展重大需求，统筹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加快建立发展储能技术学科专业，加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破解共性和瓶颈技术，是推动我国储能产业和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

## 二、总体要求

### （一）目标任务

经过5年左右努力，增设若干储能技术本科专业、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储能技术人才培养专业学科体系日趋完备，本硕博人才培养结构规模和空间布局科学合理，推动建设若干储能技术学院（研究院），建设一批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推动储能技术关键环节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形成一批重点技术规范 and 标准，有效推动能源革命和能源互联网发展。

###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需求，分类发展。引导和支持有关高校围绕实现储能技术大规模应用、降低储能成本、解决储能技术和储能产业发展的经济性问题创实招、谋实效，大力培养技术研发型人才和产业应用型人才。

坚持统筹规划，引领发展。注重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储能科技创新工作，统筹规划储能技术人才培养规模。鼓励先行先试，坚持扶优扶强，支持有关高校在模式、机制、标准、保障等方面探索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坚持科教联动，创新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建立健全以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机制，以及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向学生深度开放的科研育人机制。

坚持产教融合，协同发展。贯彻新工科发展理念，从机制、平台、师资、产出等领域促进要素交叉渗透，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和深

度融合，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等环节。

### 三、重点举措

#### （一）加快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完善储能技术学科专业宏观布局

1. 布局建设储能技术相关专业。在京津冀、东北、长江经济带、长三角、西北等地区支持有关高校围绕产业需求、结合办学定位、整合办学优势，布局建设储能技术、储能材料、储能管理等新专业，改造升级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已有专业。加快推进储能技术相关专业的建设标准、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以及教材体系建设。

2. 加快发展储能技术学科。支持有关高校在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等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储能技术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加强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化学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内涵建设，促进储能技术与相关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完善储能技术学科体系。

3. 科学调配人才培养存量增量。坚持转存量、扩增量，引导高校调整优化招生结构，加大对新设储能技术学科专业的支持力度，合理确定层次结构。结合区域能源需求和能源供给特点，统筹规划储能技术学科专业总体规模和空间布局，重点支持建设学科基础好、发展后劲足、服务面向清晰的学科专业。深入调研和预测储能技术相关专业的人才需求和供给情况，建立招生、培养和就业的联动机制。

#### （二）深化多学科人才交叉培养，推动建设储能技术学院（研究院）

1. 创新储能技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组织机制。加强资源整合、扶优扶强、精准支持，建立国家、地方、高校、企业四位一体的协同支持机制，支持有关高校依托现有的储能相关国家级科研平台，推动建设储能技术学院（研究院）。加强政策、编制、经费和物理空间的保障力度，积极支持储能技术学院（研究院）创新组织机制，完善内部治理机构，提高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水平，激发创新活力。

2. 加强高端储能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深入推进储能技术学院（研究院）评价考核制度改革，加快建设跨学科、综合交叉的高水平创新团队，汇聚学术声

望高、专业理论水平扎实、实践教学经验丰富的精英师资队伍，大力培育储能领域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支持储能技术学院（研究院）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大力培养引进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加强对从事基础性研究、公益性研究的拔尖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的稳定支持。

### （三）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加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

1. 面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建设储能技术创新研究平台，加快储能技术的机理和材料创新研究。以攻克储能领域储热 / 储冷、物理储能和化学储能中存在的低容量、低集成度，以及分布式储能等关键科学问题为目标，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储能技术创新研究平台。重点推进压缩空气储能、化学储能、各类新型电池、燃料电池、相变储能、储氢、相变材料等基础理论研究，强化储能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为开发高效率、低成本、安全可靠的大规模储能系统提供理论支撑。

2. 面向产业应用发展，建设储能技术应用研究平台，推动储能系统核心关键技术研究应用。聚焦制约和影响储能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重点围绕新能源革命带来的能源转换、传输、利用和管理等环节中的挑战，汇聚校企合力，建设校企融合的储能技术应用研究平台。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储能技术与系统、大规模集成储能与应用、分布式储能技术及系统优化、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及管理的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形成新一代储能技术体系并推广应用。支持企业积极投入平台建设，探索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 （四）加强储能技术专业条件建设，完善产教融合支撑体系

1. 建设储能技术产教融合校外实践基地。坚持共建、共享、共赢，创新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建设管理机制，形成校企在人才培养方面稳定互惠的合作制度。推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工作，共同完成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共同开发教学项目。推进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制度化、规范化，提高企业职工在岗教育培训覆盖水平和质量。

2. 推动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学团队。加强校企人才双向交流，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其中“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比例不低于 50%，行业企业专家占专业课教



师比例不低于20%。落实教师定期到校外实践基地教学、岗位实践和学习制度，每年时间不低于2个月，提高高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探索实施产业教师（导师）特岗计划，从企业引进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基础扎实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

3. 支持建设产教融合联合体。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行业资源，建设储能技术产教融合联合体，汇聚多方力量参与储能技术学科专业建设。扎实推进“引企入校”“引校进企”工作，发挥企业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构建产教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

# 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

教研〔2020〕4号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社会变革的战略性的技术，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培养和汇聚具有创新能力与合作精神的高层次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原创算法、高端芯片和生态系统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学科交叉融合亟待深化，人才培养导向性亟待加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部署，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着力构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勇闯“无人区”的高层次人才，现提出如下意见。

## 一、总体要求

###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依托“双一流”建设，深化人工智能内涵，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提升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水平，为我国抢占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提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

### （二）基本原则

需求导向、应用驱动。以解决人工智能重大理论和实践应用问题为牵引，促进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在重点行业领域的转

化应用。以产业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为导向，拓展核心技术和创新方法，实现人工智能对相关学科的赋能改造，形成“人工智能+X”的复合发展新模式。

项目牵引、多元支持。服务支撑国家重大项目、重大发展规划的任务需求，统筹布局多学科交叉的基础理论、算法、软件及集成电路设计等方向的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投入、政策支持引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鼓励企业、社会加大投入，形成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合力支持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格局。

跨界融合、精准培养。深化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信息科学、医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丰富完善人工智能主干知识体系和跨学科核心知识体系，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和特色方向。把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规律，学用结合，强化实践。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面向领域和应用方向培养学生掌握不同学科的概念体系、方法工具等方面的知识。强化产教融合，构建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共同体。

## 二、壮大高层次人才队伍

### （三）培育高水平创新型人才

加大对优秀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稳定支持力度，大力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人工智能领军人才。构建多类型、高质量、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涵盖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研究，以及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产业创新、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人才。加强人工智能科研伦理教育。鼓励人工智能龙头企业根据产业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对人才培养的最新需求，提供试验实践环境，对高校教师开展培训。

### （四）有序推动人工智能高端人才队伍建设

培育和吸引人工智能前沿领域优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注重人才学科背景的多样化、互补性，实行个性化支持政策，实现不同学科背景人才的系统性整合。以双聘等灵活聘用方式吸引企业和科研院所优秀人才到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统筹利用各类资源，为人才流动和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

### 三、打造高水平发展平台

#### （五）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

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处理与挖掘、智能芯片与系统、数据分析与大数据系统、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相关方向建设。鼓励高校统筹各类资金，支持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逐渐形成学科优势特色，推动人工智能向更多学科渗透融合。

#### （六）设立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依托“双一流”建设高校，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发展重大问题和突破方向上，实行联合科研攻关和融合育人，强化课程体系、计算平台、实验环境等条件建设。鼓励企业参与共建，在资金、项目等方面优先支持。

#### （七）密切校企合作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产业联盟和骨干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合作建设面向重大研究方向或重点行业应用的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应用场景平台、联合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和实训基地，共建示范性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鼓励企业参与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组织开展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和技能竞赛，引导学生以企业实际问题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 四、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

#### （八）确立专项任务培养研究生机制

以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问题的专项任务作为研究生课题主要来源和培养载体，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高校在承担的重大科研任务中，自主确定研究生培养规模，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完善人才培养成本分摊机制。对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博士生，高校应参照科研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保障和提高博士生相关待遇的具体办法，保护博士生的合法权益。

#### （九）强化博士生交叉复合培养

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算法、关键技术和核心应用，强化问题导向的多学科交叉博士生培养，提高博士生将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科学前沿与企业实践进行整合再创新的能力。支持高校与人工智能领域骨干企业、产业化

基地和地方政府设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建立任务驱动的跨行业跨学科导师团队，促进科研协同创新发展和博士生联合培养。完善工程博士培养标准，加大工程实践在培养方案中的比重，联合企业开展人才职业能力认证培训。鼓励企业向博士生开放课程、数据、案例、工具和实训平台。

#### （十）加强课程体系建设

面向全产业链和社会发展需求，科学设计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避免简单“拼盘化”。以理论沿革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为主干，打造人工智能核心知识课程体系，重点建设一批与数学、物理学、计算机、控制、神经和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人工智能基础课程。以重大科技前沿和产业应用创新需求为导向，打造人工智能关联知识课程体系，鼓励高科技创新企业参与建设一批“场景驱动”的应用型模块课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教材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 （十一）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瞄准人工智能国际前沿和国内发展短板，加大国内外联合培养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博士生的支持力度。积极鼓励高层次人才开展国际交流，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学术会议与论坛，创办高水平学术期刊。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科研平台和基地，加强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和培训。鼓励高校发起和组织人工智能国际大科学计划，创设国际学术组织和大学合作联盟。推动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国际标准和伦理规范。大力培养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化人才。

### 五、加大支持与组织力度

#### （十二）健全学科设置机制

健全以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学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有条件的高校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以自主试点、先行先试方式，自主设置人工智能交叉学科。

#### （十三）完善学科评价机制

完善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应用成效为核心的学科评价体系，探索有利

于新兴交叉学科深度融合发展的评价办法，给予相对宽松的建设和评价周期。鼓励高校开展自我评估，支持学会、行业协会开展第三方评价，合理借鉴国际评估。构建激励学科交叉研究人员动态流动的复合评价机制，认可其对来源学科和交叉融合学科的双重贡献，以及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成果形式。

#### （十四）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

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支持范围，综合考虑有关高校高水平师资、国家级科研平台、重大科研项目和攻关任务，以及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成效等情况，安排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招生计划专项增量。积极引导高校通过实施常规增量倾斜和存量调整办法，切实优化招生结构，精准扩大人工智能相关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

#### （十五）健全学位质量保障机制

鼓励高校在人工智能相关学科设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开展多样化教学评价。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设立人工智能专门工作组，负责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学位标准和管理规范制定，承担学位评审相关工作。完善硕博贯通培养和分流退出机制。设立跨学科评议专家组，设置专门的评议要素，适时进行人工智能领域学位论文抽检和人才培养质量专项检查。

#### （十六）加强资金投入引导

鼓励高校统筹财政投入、科研收入等各种资源，加大支持研究生培养、开展基础前沿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的力度。加强与骨干企业的合作，利用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及资本市场融资等多种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高校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实施，加大对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基地平台建设和成果转移转化的支持力度。

#### （十七）加强组织实施

教育部加强政策措施统筹协调，成立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专家委员会，指导高校实施人才培养专项计划，及时总结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监测评估机制。



#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

教科技〔2020〕2号

为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 SCI 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 SCI 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鼓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准确理解 SCI 论文及相关指标。SCI ( ScienceCitationIndex, 科学引文索引) 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SCI 论文是发表在 SCI 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

二、深刻认识论文“SCI 至上”的影响。SCI 论文相关指标已成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使得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 SCI 论文相关指标，甚至以发表 SCI 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科技创新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三、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应分别建立各有侧重的评价路径。对于基础研究，论文是成果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坚决摒弃“以刊评文”，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对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果，不以论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对于服务国防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般不把论文作为评价指标。

**四、完善学术同行评价。**组织实施部门要完善规则，引导学者在参加各类评审、评价、评估工作时遵守学术操守，负责任地提供专业评议意见，不简单地以 SCI 论文相关指标和国内外专家评价评语代替专业判断，并遵守利益相关方专家回避原则。组织实施部门可开展对评审专家的实际表现、学术判断能力、公信力的相应评价，并建立评审专家评价信誉制度。

**五、规范各类评价活动。**大力减少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事项。涉及学术评价的，组织实施单位应就评价指标和办法听取本单位科技管理部门意见。制定明确的工作流程和决策规则并在一定范围内听取意见和公示。实行代表作评价，精简优化申报材料，不再要求填报 SCI 论文相关指标，重点阐述代表性成果的创新点和意义。评审过程应严谨科学，遵循同行原则，对评审对象合理分组，遴选合适专家，并合理设定工作量，保障专家有充足评审时间。

**六、改进学科和学校评估。**减少对学科、学校的排名性评价，坚持分类和分领域评价。对创新能力的评价突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评价结果减少与资源配置直接挂钩。引导社会机构准确把握国家方针政策，科学开展大学评估排行。

**七、优化职称（职务）评聘办法。**在职称（职务）评聘中，学校应建立与岗位特点、学科特色、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指标，细化论文在不同岗位评聘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实际水平、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不以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判断的直接依据。在人员聘用中，学校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

**八、扭转考核奖励功利化倾向。**学校在绩效和聘期考核中，不宜对院系和个人下达 SCI 论文相关指标的数量要求，在资源配置时不得与 SCI 相关指标直接挂钩。要取消直接依据 SCI 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避免功利导向。

**九、科学设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学校应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过程，发挥基层院系和导师的质量把关作用，加强对学位论文的质量审核，结合学科特点等合理设置学位授予的质量标准，不宜以发表 SCI 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

十、树立正确政策导向。高校、高校主管部门及其下属事业单位要按照正确的导向引领学术文化建设，不发布 SCI 论文相关指标、ESI 指标的排行，不采信、引用和宣传其他机构以 SCI 论文、ESI 为核心指标编制的排行榜，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人员、学科和大学评价的标签。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2020年3月20日)

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现就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提出如下意见。

## 一、充分认识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

### (一) 重大意义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长期以来，各地区和学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育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对此，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劳动教育。

### (二)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三) 基本原则

——把握育人导向。坚持党的领导，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把准劳动教育价

值取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报效国家，奉献社会。

——遵循教育规律。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以体力劳动为主，注意手脑并用、安全适度，强化实践体验，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提升育人实效性。

——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深化产教融合，改进劳动教育方式。强化诚实合法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

——强化综合实施。加强政府统筹，拓宽劳动教育途径，整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力量。家庭劳动教育要日常化，学校劳动教育要规范化，社会劳动教育要多样化，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和学校实际，结合当地在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条件，充分挖掘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可利用资源，宜工则工、宜农则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劳动教育，避免“一刀切”。

## 二、全面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

### （四）把握劳动教育基本内涵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实施劳动教育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 （五）明确劳动教育总体目标

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 （六）设置劳动教育课程

整体优化学校课程设置，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小学国家课程方案和职业院

校、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根据各学段特点，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1课时，学校要对学生每天课外校外劳动时间作出规定。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16学时。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中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大中小学每学年设立劳动周，可在学年内或寒暑假自主安排，以集体劳动为主。高等学校也可安排劳动月，集中落实各学年劳动周要求。

根据需要编写劳动实践指导手册，明确教学目标、活动设计、工具使用、考核评价、安全保护等劳动教育要求。

### （七）确定劳动教育内容要求

根据教育目标，针对不同学段、类型学生特点，以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注重选择新型服务性劳动的内容。

小学低年级要注重围绕劳动意识的启蒙，让学生学习日常生活自理，感知劳动乐趣，知道人人都要劳动。小学中高年级要注重围绕卫生、劳动习惯养成，让学生做好个人清洁卫生，主动分担家务，适当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学会与他人合作劳动，体会到劳动光荣。初中要注重围绕增加劳动知识、技能，加强家政学习，开展社区服务，适当参加生产劳动，使学生初步养成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职业意识。普通高中要注重围绕丰富职业体验，开展服务性劳动、参加生产劳动，使学生熟练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理解劳动创造价值，具有劳动自立意识和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情怀。中等职业学校重点是结合专业人才培养，增强学生职业荣誉感，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高等学校要注重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科和专业积极开展实习实训、专业服务、社会实践、勤工助学等，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应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增强诚实劳动意



识，积累职业经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树立正确择业观，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神，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注重培育公共服务意识，使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

#### （八）健全劳动素养评价制度

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制定评价标准，建立激励机制，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果展示、劳动竞赛等活动，全面客观记录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加强实际劳动技能和价值体认情况的考核。建立公示、审核制度，确保记录真实可靠。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 三、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 （九）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

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动，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1至2项生活技能。鼓励学校（家委会）和社区等组织开展学生生活技能展示活动。学生参加家务劳动和掌握生活技能的情况要按年度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鼓励孩子利用节假日参加各种社会劳动。家庭要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家长要通过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让孩子养成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

#### （十）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学校要切实承担劳动教育主体责任，明确实施机构和人员，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不得挤占、挪用劳动实践时间。明确学校劳动教育要求，着重引导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系统学习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根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科学设计课内外劳动项目，采取灵活多样形式，激发学生劳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统筹安排课内外时间，可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好劳动周，小学低中年级以校园劳动为主，小学高年级和中学可适当走向社会、参与集中劳动，高等学校要组织学生走向社会、以校外劳动锻炼为主。

### （十一）社会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

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资源，为劳动教育提供必要保障。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开放实践场所，支持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使学生与普通劳动者一起经历劳动过程。鼓励高新企业为学生体验现代科技条件下劳动实践新形态、新方式提供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以及各类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要组织动员相关力量、搭建活动平台，共同支持学生深入城乡社区、福利院和公共场所等参加志愿服务，开展公益劳动，参与社区治理。

## 四、着力提升劳动教育支撑保障能力

### （十二）多渠道拓展实践场所

大力拓展实践场所，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多样化劳动实践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综合实践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农村地区可安排相应土地、山林、草场等作为学农实践基地，城镇地区可确认一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机构，作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的实践场所。建立以县为主、政府统筹规划配置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劳动教育资源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学校建设标准，学校逐步建好配齐劳动实践教室、实训基地。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服务社会功能，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和劳动实践基地。

### （十三）多举措加强队伍建设

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根据学校劳动教育需要，为学校配备必要的专任教师。高等学校要加强劳动教育师资培养，有条件的师范院校开设劳动教育相关专业。设立劳模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荣誉教师岗位等，聘请相关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劳动实践指导教师。把劳动教育纳入教师培训内容，开展全员培训，强化每位教师的劳动意识、劳动观念，提升实施劳动教育的自觉性，对承担劳动教育课程的教师进行专项培训，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建立健全劳动教育教师工作考核体系，分类完善评价标准。

#### （十四）健全经费投入机制

各地区要统筹中央补助资金和自有财力，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加快建设校内劳动教育场所和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加强学校劳动教育设施标准化建设，建立学校劳动教育器材、耗材补充机制。学校可按照规定统筹安排公用经费等资金开展劳动教育。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吸引社会力量提供劳动教育服务。

#### （十五）多方面强化安全保障

各地区要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安全管控机制。建立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劳动教育风险分散机制，鼓励购买劳动教育相关保险，保障劳动教育正常开展。各学校要加强对师生的劳动安全教育，强化劳动风险意识，建立健全安全教育与管理并重的劳动安全保障体系。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安全风险，认真排查、清除学生劳动实践中的各种隐患特别是辐射、疾病传染等，在场所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使用、活动流程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的操作规范，强化对劳动过程每个岗位的管理，明确各方责任，防患于未然。制定劳动实践活动风险防控预案，完善应急与事故处理机制。

### 五、切实加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

####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级政府要把劳动教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劳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做好督促落实。省级政府要加强劳动教育工作的统筹协调，明确市地级、县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劳动教育的职责，推动建立全面实施劳动教育的长效机制。

#### （十七）强化督导检查

把劳动教育纳入教育督导体系，完善督导办法。对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保障劳动教育情况以及学校组织实施劳动教育情况进行督导，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开，同时作为衡量区域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对被督导部门和学校及其主要负责人考核奖惩的依据。开展劳动教育质量监测，强化反馈和

指导。

#### （十八）加强宣传引导

引导家长树立正确劳动观念，支持配合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加强劳动教育科学研究，宣传推广劳动教育典型经验。积极宣传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机构提供劳动教育服务的先进事迹。注重挖掘在抗疫救灾等重大事件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大力宣传不畏艰难、百折不挠、敢于担当的高尚品格。鼓励和支持创作更多以歌颂普通劳动者为主题的优秀作品，大力宣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弘扬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不劳而获、贪图享乐、崇尚暴富的错误观念，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

#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年发展报告

## ——基于高校分类人才培养提质增效视角

史秋衡

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为《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逻辑起点和全国教育大会确定的顶层设计为依据,以笔者主持的国家大型研究数据库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采用文献数据挖掘与分析、权威人士深度访谈、重大问题研讨会探究等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升华成文。

### 一、审视的基本思路

《高等教育法》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具系统性、权威性、指导性的法律。《高等教育法》于1999年1月1日开始颁布实施,历经2015年和2018年两次局部修正,20年来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高等教育法》实施的20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大建设、大投入的20年,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成效及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同共进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 (一)《高等教育法》以人才培养为逻辑起点

《高等教育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基本依据,共有八章六十九条。该法的颁行,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统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基本法,以《高等教育法》为核心,以其他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的统一协调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体系。

《高等教育法》第四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五条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十一条指出，“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高等教育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六章也均体现人才培养这一主线。

总之，《高等教育法》规定，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使命即根本任务，通过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给予实现，是以人才培养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 （二）全国教育大会对人才培养做出新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高校全面加强党的领导。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并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全国教育大会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新时代高校培养人才提供了精神指引，也为高校贯彻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指明了发展方向，这与《高等教育法》突出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旨高度契合。

### （三）本报告的分析思路和基本结构

《高等教育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本报告充分把握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规律，从高校分类发展的视角切入，以人才培养为主线，坚持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则，从高校分类体系的构建、高校分类人才培养规律、高校分类管办评协调等方面，深入考察《高等教育法》实施20年来高校分类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情况，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 二、《高等教育法》实施以来我国高校分类体系构建

《高等教育法》颁布 20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陆续推出“双一流”建设、高校分类设置体系、“双高计划”，并进一步实施“双万专业”“双万课程”计划，我国高校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取得巨大成就。

### （一）国家主导、地方统筹的高校分类体系基本成熟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2017 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将高校设为研究型、应用型 and 职业技术型三类，初步形成了国家层面的高校分类体系指导框架，并提出了国家主导、地方统筹的高校分类指导思想。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纷纷出台了各自的分类体系。综改试点的上海市提出了十二宫格分类体系：依据高等学校职能、学科门类或主干专业大类两个方面，将高校分别划分为四种职能类型和三种学科特色类别。北京市将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大学、特色大学、应用型大学和技能型大学四种类型。云南省提出将高校划分为高水平大学、骨干特色校、应用型本科和技术技能型高校四种类型。

由于国家高校分类体系与上述直辖市、省高校分类体系几乎同时出台，国家主导推进与地方统筹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协调。

### （二）不同类型高校发展思路基本明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高等学校类型要与自身培养模式特点相适应，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需要。在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高校办学定位和发展思路逐渐明晰。

#### 1. 研究型高校发展定位

研究型高校的直接设立与试验现已成常态。研究型高校的各项活动围绕国际重大创新，以推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与服务地方重大创新为主，注重探索未知，面向未来，高新科教融合创新；学校不断创新理论和产出高新科技，在此

基础上培养一流人才并支持高新科技前沿发展。学校旨在培养国内外一流研究水平的学生，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学术型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的培养，且博士在校生数占研究生在校生数比例较高。

## 2. 应用型高校发展定位

应用型高校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应用型高校服务国家急需和区域技术技能创新积累，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产生联动，对接区域和行业对人才的需要。学校通过卓越实践教学、校企合作和应用研究进行人才培养，推动行业产业转型升级与服务地方重大创新；学位授予层次主要包含本科、硕士和博士，本科学位授予人数比例较大。学校以实践教学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

## 3. 职业技能型高校发展定位

职业技能型高校的类型特性正在独立建构，职业型本科院校队伍已见雏形。职业技能型高校以直接服务职业分类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学校组织架构以面向专业为主，围绕培养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展开。学校通过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进行人才培养。

### （三）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高等教育法》实施 20 年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虽然各有侧重，但均成效显著。

#### 1. 高校就业率保持稳定

高校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较为稳定，就业率数据的可靠性正在严格的监管下逐步提高。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结构各有特点。“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多选择深造；传统老牌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出路多元；建校历史较短的地方本科院校应用转型迅速；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倾向于直接就业。

#### 2. 用人单位满意度较高

20 年来，高等教育结构进入良性建设阶段，在科技与经济为首的整个产业界推动下，我国综合国力突飞猛进，这得益于数以亿计的高校优质毕业生的

人才支撑。从北京和浙江等地区相关机构的调查数据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整体呈上升趋势，毕业生各项能力达到优良水平。

### 3. 大学生满意度呈上升趋势

根据笔者主持的“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研究数据库”（以下简称NCSS）成果显示，大学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学习收获、专业满意度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说明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在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院校在办学成效方面有所差异。NCSS在2011—2019年连续调查了大学生极端应激下的极端应对状态倾向等，总体呈现出连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大学生在应激应对方面的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出现恶性事件的可能性大幅下降。在价值观层面，我国大学生对于“想要的生活”排序在2012—2019年均大致显示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选择顺序。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成长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明显，先完善自身，协调好小环境后，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 4. 高等教育促进了社会代际流动

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代际流动的重要途径，“读书无用论”缺乏实证依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2003—2015年的数据分析显示，社会代际流动模式并没有呈现出日益固化的态势，且个体自身的教育成为影响社会地位获得的首要途径，这种影响效应在市场化改革后显得更加突出。高等教育近些年在增进社会流动模式的公平性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高的能力和学历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回报。

## 三、我国高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研究制定高等学校分类设置标准，制定分类管理办法，促进高等学校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虽然《高等教育法》及相关政策文件强调高校分类发展，但是，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中“一头一尾”较为明确，然而应用型大学在体制机制的设计、办学资源的配置及自我寻位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行业产业脱离，社会服务能力薄弱，与研究型高校具有较高同质性，存在“中

部塌陷”现象。

### （一）中央与地方、产业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

现行的《高等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分类指导和特色发展相关的法律条文有粗略规定，但不太明确、表述不够。

在《高等教育法》中规定的有关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关于创新创业教育、进一步深化产业融合、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等，都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省、市两级政府在贯彻落实上有滞后、有弱化，缺乏具体的政策、措施、项目和资金等保障。虽然总体上高校与地方、产业、城市的关系有明显改善，但是距离《高等教育法》的要求，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等学校“四个服务”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要求，《高等教育法》也应该明确，省、市两级政府应该把当地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规划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起推进，促进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协同发展。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立法执法、地方发展、学校发展中应充分体现。

### （二）体制机制不利于应用型高校特色发展

#### 1. 学术评价标准对应用型大学的错误引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按是否授予学位及授予学位层次构建无授予学位的专科和授予学位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分层制度，争取更多学科数量、获得更高层次学位授权点成为高校的共同追求。精英层级思想催生学术评价标准，应用型高校在片面学术标准主导的高校排行榜中常名落孙山，由于高校排行榜关系到高校社会评价和生源，应用型高校只能选择铆足劲头奋起直追研究型高校。在传统标准的重压之下，应用型高校若坚守初心，则容易在社会第三方发布的排行榜处于不利位置；若选择两头兼顾，也会因基础研究薄弱的先天不足而分身乏术，更丢弃了自身应用型研究的优势。

#### 2. 高教资源配置不利于应用型大学特色发展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于重点建设高校，形成高校发展的“马太效应”，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欠缺精准扶持政策。虽然自2015年教育部等三

部委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以来，全国已有 27 个省份 364 所高校进行了转型试点；2016 年发改委等部门在全国遴选 100 所高校，开展产教融合发展工程，每所支持 1 亿元；2017 年教育部明确了应用型高校的类型存在，但由于国家尚未制定应用型高校设置和评估标准，众多地方应用型高校为追求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容易陷入学术型发展老路，从而难以走上特色办学之路。

### （三）协助应用型高校走出“中部塌陷”的建议

#### 1. 提取高校分类核心标准为应用型高校正名

明确高校分类核心标准是理顺高校分类设置的依据。应用型高校以应用研究为主进行知识生产，吸收科研成果并转化、转移和积累，注重科研服务产业转型和区域发展，应用研究引领和支撑教学，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转化吸收作用于教学。建议将高校分类核心标准作为高校分类设置、分类办学、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的参考要素，明确研究型、应用型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和管理的质量标准，改变以学术性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和资源配置方式，为应用型高校正名。

#### 2. 凝练比较优势促进应用型高校精准寻位

指导应用型高校精准寻位，制定最适宜办学的战略规划，提升应用型高校竞争力。应用型高校应根据高校所在区域、行业产业和要素禀赋，形成比较优势，克服盲目追求研究型发展的“路径依赖”或理念误区。与研究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的比较优势在于应用科学研究支撑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专业设置与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耦合度较高，知识溢出具有较高的行业、产业和地区贡献度。应用型高校唯有立足比较优势，才能避免陷入“路径依赖”。

#### 3. 从注重学科平台建制转向创新链条建设

应用型高校的个性化内涵式发展路径应从知识体系建设转向系统的产学研合作，以创新建设取代平台建设，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创新链条的体系化设计。应用型高校的创新链条打破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专业设置的垂直体系，更加注重横向联合多个相关学科和专业，从不同领域寻找促进行业发展和管理创新的方法。应用型创新链条的动态性体现在跨越知识生产的不同阶段，将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促进产业转型，解决一线热点问题。



#### 4. 从统一专业教学计划转向多样化专业课程组合

目前很多应用型高校采用与研究型高校高度相似的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人才培养出现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没有发挥和凸显比较优势。应用高校需根据自身定位、所在区域经济特点以及自身的学科发展优势，开设专业课程，构建特有的课程体系，满足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由不同课程和课程模块组成实现差异多样化的专业训练，真正实现不同高校的人才分类培养。

### 四、我国高校管办评分离改革有待进一步打破梗阻

对依法形成政府管理和监督、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各界参与和评估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的要求，高校管办评分离改革尚存在政府权力下放不顺畅、管办评关系不协调、高校的治理能力薄弱、社会评估机构杂念多等问题。

高校分类设置是管办评分离与协调的起点，需尽快理顺这一影响高等教育领域全局的关系。

#### （一）政府管理高等教育方式有待改进

##### 1. 清单管理方式尚未普遍推行

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下文，将一批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和高校，但相关政府部门尚未建立高等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现实中依然存在对高校办学过多的外部行政干预，高校和教师处在不停被检查的状态。各级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引导和督促高校规范办学的能力有待提升。

##### 2. 高等教育管与评的关系需理顺

《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教育评估的主体，《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和《教育督导暂行规定》细化了行为。但这些法律法规都未对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及其活动的法律地位给出明确界定，教育督导与教育评估未理清关系，一些社会组织为自己的商业利益绑架评估活动。

##### 3. 高校分类评价机制不能满足高校分类管理的需求

我国高等学校分类已经定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的体系，但是与此相对应的高校分类设置标准和评价机制还在研制中，高校分类设置标准与评价机制体制建设滞后于高校分类管理需要。



## （二）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能力有待提升

《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明确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协调相结合。目前，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作用发挥还存在以下问题。

### 1.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存在不确定性

国家对省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责的确定依据主要是各种政策性文件，行政色彩浓厚，使得省级政府统筹权行使面临诸多困难，存在不稳定性，效力较低，容易形成“放一乱一收一死”的循环。

### 2.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发挥缺乏协调机制

省级政府习惯于纵向指令，横向统筹协调机制没有有效建立，缺乏正式规章制度，统筹权的运行难以实质性启动。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组织、发改、财政、人社、教育等多部门协同配合，部门之间不配合将导致人才培养出现重大缺失项。教育部门作为相对弱势部门，许多跨部门难题无法自己解决。

### 3. 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监督机制不健全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对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但目前仅有7个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进行了些许探索。国家难以科学评估省级政府统筹绩效，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等部门对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的监督缺乏依据。

## （三）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落实还不够到位

《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教育部、人社部按照国务院统一要求，缩减行政审批事项，高校在选拔录取、专业设置、人才招聘、资产管理、职称评审、设置研究生院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在调研中发现，现行管理方式仍存在不适应之处，高校办学自主权在落实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高等教育法》缺乏硬性约束力。

### 1. 高校办学中的方向性迷失

我国高校办学目前依然存在四大问题和三个脱离。四大问题：一是学科专业划分过细过小及关联度低，学生的学科专业视野狭窄；二是对人文情怀和科学素养的并重培养不够重视，将通识教育误解为知识泛化；三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不够紧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明显不足，难以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的

结构化需求;四是教师评价片面强调科研或过度强调教学,无视《高等教育法》的开展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项高校职能共促人才培养中心工作的规定。三个脱离:一是专业与学科脱离,很多专业并没有建在学科上;二是教学与科研脱离,科研对教学的引领作用明显不足;三是教师与学生脱离,忽视了教学过程是教师与学生要素紧密互动促进的过程。

## 2. 对高校办学自主权度的把握不明

《高等教育法》有着严密性和完善的逻辑,里面有几条线,通过不同的中央机构分路实施。从全国人大的执法检查的模式来看,需要谨慎评判这种多头收放的效果。办学自主权下放是高校20年来的重要发展动力。没有自主权下放,学校会是死水一潭,模式同化。但我们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就涉及有些方面无权可放,有些方面在收权。这就带来高校办学自主权度把握不明的问题,其中尤其严重的几个问题如下。第一,中西部高校办学自主权较弱。应该落实中西部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尤其是公办学校,在专业设置、职称评聘、人员编制、贷款融资、规划建设、招标采购、资产处置、学费标准等方面,管得较多、统得过死,办学活力不足,与民办高校形成巨大反差。政府放管服改革缺乏系统性,该服务的做不到位。第二,高校选人进人自主权落实不到位。《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高校自主设置内部组织机构和评聘教员。由于地方政府人社、编制和教育部门的深度介入,不少地方高校的内设机构、干部职数、岗位设置和聘用均须由政府审批。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引进行业技术人员比较困难。第三,高校招生自主权受到压缩。虽然《高等教育法》规定政府只审核办学规模,但学校在录取标准、招生规模、生源分布、专业设置、收费标准等方面必须接受中央和地方教育、物价等行政部门的双重直接调整和控制,学校很难根据实际情况真正进行自主招生。

## 3. 学科专业设置权受限

地方高校设置专业需要经过地方教育、人社行政机关和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管、审,承受着比部属高校更多的限制和束缚。地方高校需要对接地方产业,灵活设置专业,《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条也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但事实上高校学科结构不够优化,专业布局不尽合理,专产对

接不顺畅，学科交叉协同与集成不充分。

#### 4. 高校办学信息公开落实不到位

目前，多数高校都已建立了信息公开的平台。但对照《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规定，高校许多信息尚未公开。

#### （四）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尚需进一步完善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即获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依法治教关键在依法治校。《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特别强调要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然而，简政放权不到位和高校治理不规范并存，现代高校法人制度、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影响着高校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办学特色的形成。

##### 1. 我国大学职能与使命之间的关系混乱

我国教育学界与各级教育行政、教育评估部门普遍有“人才培养二教学二课堂教学二教师课堂教”的误区。《高等教育法》中规定高等学校应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同时确认高校应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人才培养是核心使命，教学相长、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不可偏废。仅仅强调人才培养等于开展教学，有严重降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之虞。

##### 2. 政府与公办高校法律契约关系有待推进

人才培养为百年大计，需要以法治教的稳定性，克服行政治教的短期效应。公办高校外部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尚需加速，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契约关系有待推进，政府的规范管理与高校的自主办学应有效分离。一些公办高校主要领导流动过快，变更频繁，导致不愿意去做打基础的事情，不考虑长远的发展和规划。

##### 3. 高校治理的参与主体权力结构尚待完善

《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职责，第四十三条规定了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当前，高校主要由党政两大系

统人员控制，部分书记依法治校的理念并不很牢固，校内各类委员会的关系也不明确且易出现决策冲突，功利性现象较明显，内部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不够或较弱，外界利益相关人几乎没有参与。高校内部权力生态关系的失衡造成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群体缺乏切实有效的利益表达与权利救济机制。

#### 4. 《高等教育法》对教师权益的保护还需加强

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带来很多新问题，需要法律上给予回应，而《高等教育法》对人事制度改革的规定性非常少。高校对各类教师签订合同与考核要求较为随意，教师没什么发言权且处于不利地位，引发很多维权事例。所以《高等教育法》与《教师法》如何衔接及在教师权益界定上做出回应至关重要。

#### （五）高等教育投入保障存在问题

《高等教育法》实施以来，不断完善高等学校生均拨款制度，全国有31个省份地方普通高校生均拨款水平都基本达到了1.2万元，各省已全部建立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目前，高等教育投入保障仍存在一些问题。

##### 1. 省级政府对地方高校的财政保障相差悬殊

相较于东部省份，不少西部和东北省份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省级政府对地方高校的财政拨款总量存在滞后现象，有些地方政府对高校重设置而不重持续建设。经济落后地区高教经费持续短缺，有些高校甚至难以保障基本运行。

##### 2. 不同类型高校财政投入保障差异巨大

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和学生数九成以上的地方高校，获得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经费收入的六成左右。虽然国家提出2017年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000元的硬性要求，近四分之一的省份依旧沿用原文件要求。

##### 3. 民办高等教育办学投入严重不足

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每5名大学生中就有1名在民办高校就读。《高等教育法》第六条规定，“高等教育要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各方合理分担培养成本”。调研发现，民办高校经费来源渠道单一，办学经费以学费为主，其投入明显低于公办高校。许多民办高校经费投入少，



主要依靠学费办学。一些股份制公司以商业模式大量收购与运行民办高校，相关法规制度跟进不及时，存在较大不稳定隐患。

## 五、《高等教育法》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抵牾现象

### （一）《高等教育法》法理的异化

以《高等教育法》名义，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与规章。这在起到法律具体化作用的同时，也让法律彼此之间又变得相对独立，法律的作用可能还不如政策的作用大。回顾《高等教育法》20年走过的路，政策的影响比《高等教育法》要大。

我国名义上是大陆法系、是成文法，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国情太复杂，所以实际上是案例在起作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及推行高教案例的示范作用，形成了类似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倾向。从法律视角去判定《高等教育法》执法的有效性，就成为难以讲清楚的一个问题。

### （二）对违反《高等教育法》的行为缺乏制约

《高等教育法》的司法监督和执法作用有限，在各级行政部门的法理感较弱，缺乏刚性制约，《高等教育法》与高校章程之间的法律纽带也较弱。《高等教育法》作为相对宏观的上位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定向明确的下位法规相比，后者实施效果更好，且与《高等教育法》关系较弱。《高等教育法》既缺乏对政府管理的程序性规范，也缺少对高校自主办学的有效保障，导致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权力与高校自主办学权利可能出现冲突。国家在管理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现象，高校也存在依法办学意识淡薄与维权无法可依的现象。

依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有关主管部门、高校都可以作为《高等教育法》的执法主体，但它们之间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界定并不十分明确。《高等教育法》大量规定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权和行政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行政违法责任较为笼统和模糊，仅第六十六条规定“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相关行政政府规章也缺乏相应的认定、处罚机制与制度规范，对

这些行政违法行为无法有效制约，难以追究行政违法责任。

对此，建议加强《高等教育法》配套法规建设。加快健全《高等教育法》与高等教育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之间位阶层次分明、效力等级清晰，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配套，高等教育法律与高等教育政策、教育改革实践相协调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应该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执法，明确执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维护《高等教育法》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 （三）《高等教育法》与学位制度不甚兼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于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条例出台于改革开放初期，距今已有40多年，虽然2004年进行过局部调整，但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国内教育系统变革，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许多条款与《高等教育法》等存在不相协调的问题，目前已不能满足学位管理实践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例如，《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在现实操作中难度较大，亟需调整。2019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明确了学士学位授权审核的权责和省级学位委员会制定审核标准和办法，继续推动“放管服”改革，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可自主审核学士学位授权。

对此，需要从整个教育法律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对《学位条例》和《高等教育法》做出联动修订，可以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现行做法补充写入法律。近年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对修订《学位条例》立法工作积极回应，201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专门成立《学位条例》修订工作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当前，国家正在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管办评”分离，保障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急需法律保障。因此，联动修订《高等教育法》和《学位条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对全面实施依法治教、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四）高等教育对未来创新尚不适应

当前，新科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正处于深刻的根本性变革之中。特别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异军突起，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学校教育正在向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泛在教育”演变，校园、教室发生颠覆性变化，未来的世界环境是不确定、复杂、模糊和多变的，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对此，高校急需积极适应未来时代变化，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高校要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更新，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虚拟环境、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信息处理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高校亟需突破现有学科格局，促进跨界融合，大力培养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 六、依法育人需要科学规律指引及作为修法核心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法》限定的高校中心工作。《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三全育人”体系正在形成。高校在实际办学活动中必须要遵循学生自身的学习规律，进行教育教学制度和实践活动设计。然而，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中大学生学习规律应用的缺位现象较为突出。

#### （一）中国大学生学习规律应用的缺位

##### 1. 高校人才培养要素结构缺乏系统化设计

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易陷入“人才培养 = 教学 = 课堂教学二教师课堂教”的误区，第一、二课堂联动机制的应用缺位。在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中，课堂教学，尤其是教师“教”的课堂教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方式。然而，在NCSS的相关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学生的学习收获，还是学生的就业能力形成，都是学生多维体验的结果。在教育培养因素中，教师教学、同伴互动和实习实训对学生就业能力四因子的自我评价均产生了显著影响。NCSS研究发现，学生对教

师教学、同伴互动和实习实训体验越好，他们对就业能力的自我评价就越高，并且实习实训、同伴互动分别是影响就业能力不同维度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仅仅课堂教学，甚至教师的“教”，都是远远不够的，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效联动，师生、生生间的有效互动，才是促进大学生成长的关键因素。

### 2. 隐性教育规律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应用缺位

NCSS2013—201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均为：学校学习风气 > 与室友的关系 > 学校的就业指导；而最满意的三个要素则是：与室友的关系 > 与其他同学的关系 > 与专业指导老师的关系。由此可见，室友关系既是学生最满意的成长要素，也是他们认为较重要的要素之一。室友关系以及学风与其他室友要素等朋辈关系都是影响大学生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宿舍文化建设理应成为学风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核心组成要素。然而，在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宿舍文化建设尚未引起高校管理者的充分重视，过分重视显性的课堂教育而忽视隐性教育是当前高校管理上存在的重大制度缺陷。

### 3. “U”型年级发展规律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应用缺位

NCSS的诸多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大学生在适应性、学习方式、课堂体验、学习收获、满意度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U”型发展规律，突出表现为大二、大三学生的体验水平明显低于大一和大四的学生。这一方面反映了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无助，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即高校的培养方案和相应的培养模式并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年级成长的马尔可夫链规律，“学习压力”“人际压力”等依然是低谷期学生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如何遵循或应用这一规律是我国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做到事半功倍的重要利器。

### 4. 质疑能力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缺乏足够重视

在笔者主持的NCSS项目组与英国剑桥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发现，中国大学生在知识的建构能力方面已体验较好，而质疑能力方面的体验则差强人意。在终身学习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科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质疑能力则是科学创新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大学

生理性批判的思维与能力，需要引起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足够重视。

## （二）中国大学生学习规律应用的制度建议

### 1. 搭建学生交流互动平台

高校除了要重视传统的知识传授以外，更要关注同伴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不同学科学生的交流互动平台，进而促进学生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进行交流学习。要将大学生在第一、二课堂等多元课堂的表现和学习成果量化考核，对学生进行分类评价，构建学习研究型、实践技能型、社会活动型、特长特色型等类型开展评价，充分引导因材施教。

### 2. 注重宿舍育人功能的发挥

室友是影响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因素，学校在进行宿舍文化制度设计的过程中要结合学校的定位、学科特色等因素从育人的角度创新制度，让室友关系和学风在学生发展中发挥正向功能。创新高校学生宿舍的针对性教育、非正式组织治理、专业化服务模式，打破高校条块分割的育人制度设计，形成正向的宿舍文化育人的良好氛围。

### 3. 注重实习实训的开展

学生要就业，所学的专业知识就不能仅停留在课堂的教师传授，更应当通过实习实训等实操手段将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因此，加强实习实训是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所以，高校要注重人才培养过程中实习实训的设计。高校要构建“大实践”格局，将学生与社会多元互动的各平台都纳入实践教学，国家出台鼓励社会多元主体支持学生实践的相关政策，高校出台鼓励学生积极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知行合一的相关政策。

### 4. 注重学生学业全程指导

在 NCSS 的分析中发现，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U”型发展规律。当前高校注重新生教育的开展，却缺乏对学生大学四年学习全过程的持续咨询和指导。高校不仅要高度重视和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更要高度重视和开展学业生涯规划，按照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兴趣等个性化全过程指导。

## 5. 注重质疑能力培养的体系化

建立科学的研究性的课程体系和多职能育人文化，这需要通过设立专门的课程和实践环节，并将质疑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专业课程体系中去，营造质疑（批判性）能力培养的育人文化。同时，鼓励并培训教师在教学与研究、实践活动中积极引导大学生独立自主思考，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质疑精神，敢于审慎、理性、自信地批判自己或他人的观点。

## 七、对《高等教育法》未来修法的若干框架性建议

20 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虽然历经 2015 年和 2018 年两次局部修订，但《高等教育法》从逻辑核心至体系框架都有整体修法的需要。

### （一）以高校特色和核心特点为抓手，进一步明确分类管理、评价、学位授权和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

研究型高校不仅培养研究型人才，也培养应用型人才。研究型高校不仅有大量学术研究师资，还有大批工程类、技术类师资。因此，分类管理、多元评价、学位授权和资源配置机制不仅要针对不同类型高校，还应落实到不同类型师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要以法律的形式对不同类型高校的设置标准、资源配置、制度建设、评价准则给予明确。

### （二）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规关系

一是进行人大释法或修法，完善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提高其稳定性与位阶效力；二是加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配套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履行统筹职责的评价监督机制；三是推动中央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增强省级政府统筹权；四是鼓励省市共建地方高等教育，建立基于省高教资源优化配置，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的省市共建管理模式；五是鼓励对省级高等教育管办评权限进行明确区分，提供法治保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2017 年颁布了《上海市高等教育促进条例》，在国内率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对省级政府高等教育职权进行了明确界定。

### （三）进一步明确管办评关系的协调

一是改变教育资政门槛太低的现象，让高教监督与资政更加专业化和科学

化；二是理顺政府与高校关系，解决越位现象，政府取消下放相关行政审批事项，提高政府综合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的能力；三是落实高等学校独立的法人资格和主体地位，减少直线式管理；四是建立负面清单，从规定“高校可以做什么”到明确“高校不能做的底线是什么”，把办学的空间留给高校；五是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基础学术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不断健全有效行使办学自主权的自律机制；六是加强信息公开，深化高校招生、教学、财务等信息公开。

#### （四）进一步明确高校法人治理结构

第一，夯实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目前很多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章程，“一校一章程”让按章程来办学治校有了现实可能。但是，如若不能有效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问题，会导致章程的实际效用受到削弱，对于高校以法办学治校的指导性受到抑制。因此，《高等教育法》需要进一步审视其对大学章程的法律规定，更进一步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从法律源头出发夯实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让章程与《高等教育法》的精神有效呼应，成为高校依法治校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大学治理的具体实现形式。党委在理念性、价值性和方向性上负责，校长在执行性、过程性、工作性上负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表明党委是集体领导，书记和全体党委委员在党委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第三，从单向管理走向多元主体共治。高校的运行涉及多方利益相关主体，从而需要吸收这些机构或个人代表参与到大学的不同机构中，以便对高校的决策和监督发挥作用，形成从单向管理走向多元主体共治的内部治理结构。

（五）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以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保障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一是确保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拨款比例，明确省级政府的责任，规定地方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情况。二是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财政扶持。例如，从2012年起，陕西省财政每年对民办高等教育投入3亿元，有效支持了该省民办高教的健康发展。三是吸引



民间资本进一步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保护民办高校及其举办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非营利性、营利性民办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分类扶持。四是健全分担机制，进一步改进高等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扩大融资渠道，通过购买服务、混合所有制办学、发展引导基金、捐赠税收优惠等方式，形成政府投入和社会组织投入的良性互动。



# 从“重点学科”到“一流学科”： 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范式转换

谢冉 章震宇

英国学者史蒂芬·奥斯本 (Stephen P. Osborne) 认为, 现代以来, 公共管理领域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方面大致经历了二次重构, 表现为三种范式分期主导的局面, 即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公共行政范式,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新公共管理范式及 21 世纪的新公共治理范式。作为实现特定目标的公共政策活动, 我国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孕育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明确提出于 20 世纪 80 年代, 进一步发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双一流”建设的提出标志着“重点学科”建设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再次起航。纵观这一建设历程可以发现, 我国高校学科建设从“重点学科”到“一流学科”的发展历程深受公共管理范式的影响。具体来讲,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点学科”建设为公共行政范式所主导; “211 工程”和“985 工程”时期的重点学科建设深受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影响。上述两个时期重点学科制度使得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深受管理范式的影响, 我国重点学科建设的治理范式尚未形成, 无法适应“双一流”建设所强调的“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因此, 为使得“一流学科”建设真正发挥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作用, 需要结合公共行政范式和公共管理范式对前期“重点学科”建设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 并在总结其优势和缺陷的基础上, 以新公共治理范式为依据, 构建“一流学科”建设的理想路径。

## 一、从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公共管理的三种范式

### （一）强调政府“划桨者”角色的公共行政范式

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最早提出“公共行政”概念并将其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形态。随后，美国学者威尔逊通过将政治和行政剥离，开启了行政学的研究之路。马克思·韦伯通过引入强调层次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官僚制，对提升行政管理效率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总的来说，公共行政范式的主要特征为：在组织架构上，聚焦于单一集权制的行政体系，强调自上而下的层级化的垂直管理，政府在这一管理体制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发挥着直接供给公共产品和政策执行的“划桨者”的角色；在实践模式上，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整合为封闭的系统，强调“命令—控制”型规制及政策“制定—实施”的循环，重视规则和技术理性，强调以权力和命令为核心的等级制为资源的分配机制；在绩效评价上，基于政治和行政的二分，公共行政范式认为严格遵守上级制定的规则和制度既可实现对公用资源的最优利用，强调对政策的输入和过程进行全程的监管和控制。

20世纪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破产及福利政府所带来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的爆发，针对公共行政的批评尘嚣而上。研究者认为，在理论上，作为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上的公共行政，官僚制扩展膨胀的本性必然导致行政组织机构的庞大，从而增加行政的成本，无法对公众的需求做出迅速的反应，降低行政的效率。在实践中，一方面，“公共行政”范式将政策实施看做与外部环境割裂的独立的“黑箱”，必然阻碍政策优化和创新，仅仅对规则和过程的严控使得其所追求的内部效率无法落在实处；另一方面，作为政策执行核心和主导者的行政人员，由于自身的价值倾向性，在实践中存在将政策意图扭曲而服务官僚机构或自身目的的可能。

### （二）强调政府“掌舵者”角色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针对公共行政范式存在的政府主导、效率较低的弊端，研究者和实践者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理念“重塑政府”。1991年，克里斯托弗·胡德首次提出“新公共管理”一词，并对新公共管理强调专业化管理、强调具体的绩效标准与测量、强调结果控制、强调去中心化、强调竞争、强调私人部门的管

理模式、强调规则与资源节约等 7 项原则进行了论述。总的来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主要特征为:在组织架构上,基于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府应为战略性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掌舵者”。通过政府的分权、授权和多元主体的参与,使得组织从规则导向型组织转变为监管型组织,打破公共机构及其人员的低效率和垄断特权。在实践模式上,主张以市场的力量改善政府的服务效率,强调顾客至上,通过“委托—代理”和竞争性的契约来规范和调节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新公共管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透明,基于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对资源进行分配;在绩效评估上,基于顾客导向的逻辑,强调从结果去审视管理效率,关注的焦点聚焦投入的产出。

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治理演变过程中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在持续大概 10 年后,研究者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从价值和管理两个层面进行了批判。批评者认为,在新公共管理“产品主导逻辑”的支配下,人们往往过于重视政策的短期产出而忽视长期结果,过于强调管理的经济绩效而忽视公平、公正等价值理性。在管理上,重视分权化的竞争而忽视了机构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关系的建立,带来了管理的碎片化。此外,与公共行政强调内部效率类似,新公共管理同样忽视外部关系的协调和平衡,没有提升社会所需要的外部效益。

### (三) 强调政府“服务者”角色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面对公共管理实践中主体的多元化和问题的复杂性,针对新公共管理范式存在的弊端,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史蒂芬·奥斯本在 2006 年提出“新公共治理”一词,并将其视作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第三种“体制”,认为新公共治理实现了效率、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的平衡。与公共行政强调规则、新公共管理强调管理和效率不同,新公共治理重秉持“服务主导逻辑”,认为公共管理的重点是政府在其决策、执行等活动中能够履行“服务于民,授权于民”的职责。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多元而又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责任与贡献,重视基于参与型伙伴关系的多元共治,下放决策权给多元行动者。通过横向协作而不是纵向干涉,确保公共政策各阶段要素间的有效衔接和互动。在实践模式上,强调实践中的过程治理。但与公共行政强调过程监管不同,新公共治理重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互动所带来的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强调多方协商基

础上的责任共担的资源配置机制。在绩效评估上,聚焦公共利益和公共满意度,强调把公民的需求作为开展行政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强调评估应关注政府是否为多元主体表达各自偏好并达成共识提供有效的交流平台和充分互动的机会。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三者核心要素的不同如表 1 所示。

表 1 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核心要素

范式要素	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治理
理论基础	政治科学及公共政策	公共选择理论、管理学	制度和网络理论
组织结构	单一行政制、科层制、封闭	竞争与规制、理性开放、清晰的责任界限、委托-代理	多元网络、开放、交融的责任、分权与合作
关注重点	规则实施	资源管理与绩效	不同价值关系的协调
资源配置	科层制、规则、输入与过程	基于目标的契约、竞争与绩效评估,输出与产品主导	网络、对话、信任、关系契约、结果与服务主导
价值取向	公共部门伦理、规则	竞争与市场功效、顾客满意度	分散和竞争、公共价值

## 二、公共行政范式下的重点学科建设: 20 世纪 80 年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快速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成为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在此背景下,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提出恢复重点高校建设。同年10月,教育部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确立了重点建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984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重点学科建设政策。根据该决定的精神,1987年2月,原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在试点学科中进行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的通知》,5月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8月下发《关于做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的通知》,随后又陆续下发《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高等学校

重点学科评选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文件具体化重点学科建设活动。纵观这一时期的重点学科建设政策，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公共行政范式主导的特征。

### （一）政府在重点学科建设中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

作为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诉求，20世纪80年代的重点学科建设体现出鲜明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推行的特点。政府以权力化、制度化、行政化的运作模式集中资源，根据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进行资源的再分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既是重点学科建设制度的制定者，又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领导者，还是重点学科评估的组织者和评估者。重点学科的数量由行政部门事先确定。教育主管部门几乎承担了从政策调研、出台到政策执行、监督的所有职能，高校作为重要的学科建设方主要以执行者的角色参与，听命于教育主管部门，官僚制在重点学科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1987年下发的《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七五”期间，国家教委拟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教学科研基础好、对四化建设和科技、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中择优确定一批重点学科点。《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规定：“重点学科的总体规划、学科点的确定、评估和调整工作，由国家教委统一组织领导进行。”

### （二）建设过程中的强规则与弱透明

这一时期的重点学科建设主要依靠政府部门颁发的政策文件和管理制度来执行，通过简单化的审批程序和指令性的规章制度来体现，通过严格的人、财、物的审批来规制重点学科建设实践。无论是重点学科评审制度的制定过程，还是评估标准和评审过程，都呈现出鲜明的行政部门主导的严格依据规则进行管理的权威性和不透明性。如1987年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指出，国家教委将各学科的重点学科数限额分配到各通讯评选小组，评选小组根据《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严格评选，提出初步建议名单。国家教委再按一级学科组织专家小组，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重点学科点必须具备的条件、合理布局的需要和规定限额，严格进行审核。参加各学科通讯评选和参加专家小组会议审核工作的专家只对国家教委负责。专家名单不对外公开，评审的内容、意见均应保密。



### （三）建设绩效聚焦输入和过程管理

这一时期的政策文本对于整个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的质量保障体系缺乏系统规划，也缺乏各种评估和规范的指南，更没有对重点学科建设的成效进行明确的规定。但从政策的强约束可以看出，管理机构认为，重点学科建设政策的效率建立在强化政府控制力、资源的投入度和规则的严格执行的基础上。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是强化政府的控制力，由政府决定重点学科建设的评审规则、建设方式及内容；二是重点在入口处进行输入控制，关注资源的投入；三是对重点学科建设的全过程进行细节干预，认为建设效益高低取决于是否严格执行程序化的制度性规定。如1987年颁布的重点学科的建设文件中，强调财政拨款主要是输入为主，预先规定每一笔经费的用途和额度，并根据年度原则和专项专用原则进行明确的规定。

## 三、“新管理主义”范式下的重点学科建设：“211工程”与“985工程”时期

新公共管理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渗透使得强调竞争、绩效和契约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理念日渐凸显。“高校像社会上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深受市场模式的影响，按竞争、供求、营利能力及其他古典经济学的特征来进行定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1993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逐渐从偏重荣誉转向偏重绩效。重点学科建设的经济价值也随之增强，这一时期推出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呈现出新公共管理范式主导的特征。

### （一）一定程度上政府权力的分散与下放

针对这一时期的重点学科建设，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分权和授权，引入目标管理与竞争机制进行管理。一方面，政府给予地方更多的管理权和高校更多的自主建设权。《“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提出，以主管部委或地方政府的管理为主，学校的自我管理为基础，逐步增加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和管理上的统筹力度。另一方面，在角色上，政府逐渐从全程的组织者、主导者转变为政策的制定者、管理者和监督者。在“211工程”建设中，



强调“211”协调小组负责重点学科建设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对重点学科建设统一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督；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主管部委或地方政府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对有关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和概算进行审核批复，并具体负责重点学科项目建设管理；有关学校按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要求，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建设任务。此外，首次借助第三方力量对各高校递交的评审材料进行通讯评议和审核，由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承担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

### （二）以项目制、合同制推进学科建设过程

在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中，通过引入“委托—代理”机制，政府依协议提供资助，大学依照协议自主制定发展规划，政府根据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估。一方面，重视竞争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实现了从高校依据分配建设资金整体申报到比较学科优势、通过竞争获得立项资助的转变，建立了以投资效益为核心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绩效考核机制。在项目的立项审批上，从“九五”期间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立项审批、“十五”期间按基本建设程序和财政预算管理进行立项审批，转变为“211工程”三期建设中强调通过比较高校不同的学科优势竞争立项。在政策工具中引入学科评估，强调依照绩效而不是需求进行资源分配。二是通过合同制推进重点学科建设的透明和公开。工程建设项目的立项，采取专家咨询和行政部门决策相结合的方式，遵循科学、民主和平等竞争原则，增加透明度，充分发挥专家和舆论监督作用。项目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各建设高校的法人必须严格按照可行性报告的批复，对项目建设投资、工期和建设质量实行全过程管理，开展不定期的检查制度，并负责项目建设年度统计、报告和建设决算的审核上报，接受项目建设情况检查，并承担相应建设责任。

### （三）绩效评估聚焦学科建设产出

在新公共管理范式下，高等教育作为经济的子系统，其价值由其效率或绩效来判定。正如利奥塔所说的，这是一个功利主义价值观取胜的时代，知识的意义取决于其交换价值，高等教育作为经济的子系统，其价值由其效率或“绩效”来判定。在竞争和问责的驱动下，学科建设成为在管理契约下强调绩效目

标的实施过程。这一时期的重点学科建设强调结果为导向的责任机制，改革原有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方式，把对国家重点学科的考核和认定，作为加强建设的重要手段。国家重点学科的考核每五年进行一次，考核的依据是各国家重点学科制订并备案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考核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家重点学科规划的完成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将重新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对建设成效差、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将予以淘汰。高校“985工程”的项目建设实行年度报告、中期检查和总结验收，教育部财政部组织进行项目的检查、审计和绩效评估，并根据结果实施奖励和惩罚。

#### 四、新公共治理范式：“一流学科”建设的理想路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重点学科建设的管理模式经历了从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政府的角色逐渐从划桨者转变为掌舵者，基于市场的竞争及绩效评估的理念也逐渐凸显。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新公共管理范式存在的忽视价值理性和碎片化管理的弊端，使得我国的重点学科建设仍然存在如下问题。首先，重点学科建设对效率的重视强化了高校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往往是一种强调工具理性和短期效益的内部竞争，带来了高昂的交易成本。其次，管理理念下的重点学科建设使得政府仍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决定着高校学科建设的方向，高等教育重点学科建设所应体现的政府服务、市场配置、多元主体责任共担的公共治理的体系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超越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范式，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新公共治理理论，对推动我国新时期的“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启示价值。

##### （一）强化政府元治理角色，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网络

新公共治理认为，多元主体不仅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对象，更是公共政策与服务体系的评价者、参与者和“合作生产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的充分参与。在新公共治理范式的视域中，“一流学科”建设若仅仅通过改变财政拨款的方式和项目确立、退出的方式，并不必然使得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模式从行政管理体制向治理体制改变。因此，“一流学科”

建设应强调主体的多元、方向的多维与底部的自治。要以学科建设为本，以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社会之间的充分参与为基础，通过学者组成的专业协会和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学科治理方式的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承担着“元治理”的角色，重在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学科建设网络进行建设和管理。在学科建设上，应该强调利益相关者充分的知情权、协商权和参与权，将多元学科建设主体发展为平等的“合作生产者”。总之，“一流”学科建设虽由政府推动，但其根本的目标不是建立长期的由政府控制的项目，而在于养育利益相关者长期合作的文化，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一流”学科建设，促成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 （二）基于信任与关系契约配置学科建设资源

与公共行政重视执行和管控的过程管理不同，新公共治理范式强调聚焦组织间关系的过程治理。强调推动具有不同利益、价值观、认知取向和权力资源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互动和协商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一项在治理情境中的复杂实践，“一流”学科建设是一种与周围环境、不同团体和个体的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性行动，其价值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充分理解、接受和参与。新公共治理范式下的一流学科建设应注重对多元学科建设主体间信任关系的建设，通过对过程本身价值的关注引导多元主体去倾听，进而在他们之间建立信任。以信任和共识提升“一流”学科建设的效率和效果，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理念的真正落实。“一流学科”建设不强调目标的先在性，而应强调基于谈判和反思过程中的目标的调整和生成。总之，新公共治理范式下的重视信任关系建设的“一流学科”，其根本的目标不再是仅仅聚集资源突破发展，而在于养育学科建设的文化，以重视互动、对话、信任关系的过程建设实现制度创新的目的。

### （三）绩效评估重视服务主导的结果评估

新公共治理强调服务逻辑，认为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价值不能局限于强调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与效益，还应该注重其所增益的公平、民主等价值理性。作为本身具有公平、真理、民主等社会效益属性的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除了强调规模、设施、效率等有形价值，更应该强调对公众的观念、能力、意识等无

形价值的培育，应重视对学科建设的公共性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估。首先，秉持宽泛的结果评估理念，在重视学科建设的经济效率和内部效益的同时，从公正和公平的角度对学科建设进行评估，将公共价值融入绩效评估中，使得公平、正义等价值理性与经济绩效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共同成为评估学科建设的标准。其次，对多元主体组成的学科建设系统的互动关系与信任水平进行评估。关注学科建设合作网络的绩效，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个组织的绩效。总之，新公共治理范式下的一流学科评估，应兼顾民主与效率价值取向，强调构建“善治”的学科治理模式。通过基于契约的合作，形成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状态，使得治理的过程自然成为一个组织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 三部委联合发文加快“双一流”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 跨界融合精准培养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

董鲁皖龙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依托“双一流”建设，深化人工智能内涵，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提升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水平，为我国抢占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提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

## 一、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部署

《意见》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培养和会聚具有创新能力与合作精神的高层次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相继成立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通过其他创新机制，将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列为重要建设任务，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但是，我国高校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高层次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跨学科创新平台不足，学科建设缺乏深度交叉融合，基础理论、原创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突破较少，复合人才培养导向性不强，高校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方面。”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说，对此，三部委联合印发了《意见》，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针对现状与问题，着力在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理念思路、推



动策略和具体举措上进一步创新突破。

## 二、创新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

《意见》提出，要以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战略需求为中心，以“需求导向、应用驱动”“项目牵引、多元支持”“跨界融合、精准培养”为基本原则，瞄准“理论、算法、平台、芯片和应用”等急、断、缺的短板领域，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适度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培育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有序推动人工智能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国抢占世界科技前沿，取得人工智能领域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提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

在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方面，《意见》提出了确立专项任务培养研究生机制、强化博士生交叉复合培养、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举措。

在落实专项任务培养机制方面，《意见》提出要以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问题的专项任务作为研究生课题主要来源和培养载体；支持高校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保障和提高相关博士生待遇等。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要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算法、关键技术和核心应用，强化问题导向的多学科交叉博士生培养，同时支持高校与人工智能领域骨干企业、产业化基地和地方政府设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完善工程博士培养标准等。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要避免“拼盘化”，以理论沿革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为主干，打造核心课程体系，重点建设一批与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等学科交叉融合的人工智能基础课程；鼓励高科技创新企业参与建设一批“场景驱动”的应用型模块课程；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教材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在国际交流方面，要加大国内外联合培养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博士生的支持力度，创办高水平学术期刊，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科研平台和基地等。

## 三、确保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扩容与提质并举

为进一步促进“双一流”建设高校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提高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能力，《意见》提出了健全学科设置机制、完善学科评价机制、健

全学位质量保障机制、加强资金投入引导等多项措施，加大支持与组织力度。

在学科设置方面，《意见》提出要健全以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学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有条件的高校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以自主试点、先行先试方式，自主设置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在学科评价机制方面，完善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应用成效为核心的学科评价体系，给予相对宽松的建设和评价周期；构建激励学科交叉研究人员动态流动的复合评价机制。在人才培养规模上，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支持范围，安排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招生计划专项增量。在健全学位质量保障机制方面，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要设立人工智能专门工作组，负责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学位标准和管理规范制定，承担学位评审相关工作。同时，引导加强资金投入，鼓励高校统筹财政投入、科研收入等各种资源加大培养力度。加强与骨干企业合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高校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实施。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介绍，《意见》特别重视多维融合的推动策略。一是学科建设强调“融合发展”，健全学科设置机制，以学科重大理论和实践应用问题为牵引，促进人工智能方法与技术向更多学科渗透融合；二是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复合培养”，探索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大力提升研究生创新和实践能力；三是课程体系建设强调“精密耦合”，以“全链条”“开放式”“个性化”为目标，打造人工智能核心知识课程体系和应用模块课程；四是评价机制强调“组合创新”，以成果评价为突破口，科学评价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多种成果形式，推进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分类评价机制，构建有利于教师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的人才评价机制。

据悉，教育部将加强政策措施统筹协调，成立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培养专家委员会，指导高校实施人才培养专项计划，及时总结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

# 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邓传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谋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中国奇迹”、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推动、保障下取得的。伴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高等学校数量居世界第二，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办学质量显著提高。高等学校数量从1949年的206所增加到2018年的2940所，本专科招生规模从3.1万人增加到791万人，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78年的10708人增长到2018年的85.8万人。2018年，普通本专科招生791万人，毛入学率已达48.1%，即将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体现在4个“60%”：高校所拥有的院士、“国家杰青”获得者、“千人计划”入选者、“万人计划”入选人员等高层次人才占全国总数60%以上；我国基础研究和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60%以上由高校承担；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60%以上建在高校；国家科技三大奖60%以上是由高校获得。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与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40多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4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设立近2400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016年我国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高等教育这些成就的取得，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发挥了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作用。

## 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

世界上没有标准的大学制度样板，也没有不变的大学制度模式，不同国家、

不同时期、不同大学结合其办学理念和发展环境,探索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大学制度经历了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如在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方面,不同时期分别施行了校务委员会制、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等,直到1989年中央确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被1996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进一步法定化。围绕这一根本领导体制,中国大学制度建设持续推进。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并部署了十大改革试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是其中之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根本制度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首先是中国的。要扎根中国大地,契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其次是现代的。要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适应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体现治理效率,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次是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其中根本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本制度包括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制度、学生代表大会制度等,重要制度包括决策议事规则、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学生管理、招生管理、合作办学、后勤管理等治校办学的方方面面。《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我们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落实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加强大学章程建设,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取得重要进展,有力支撑和保障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 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优势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形成的,是被实践证明“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好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认识不到我们的制度优势,就不能解释这些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1. 领导力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现对高等学校的全面领导。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管干部、管人才，切实为高等学校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保证、组织保障、人才保障，引领高等学校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2. 决策力优势。**由于中国高校办学、管理有了体系化制度保障，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进一步得到理顺，高校逐步由政府附属机构转化为独立法人，政府主要负责宏观管理，学校享有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学校党委通过集体决策方式行使决策权，使领导班子更加敢于决策、善于决策，决策也更加科学有效。

**3. 执行力优势。**学校党委、行政通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形成的决策，能够最大程度统一思想、调动力量、凝聚资源，转化为强大执行力，使决策及时得到贯彻落实，保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功能的发挥。特别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一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三、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就是制度的有效实施。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从规模扩张到了内涵发展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非常强烈，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对中国高校提出新命题新要求。推进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使这一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

**1.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这是办好高校的根本保证。高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党管办学方向、管改革发展、管干部、管人才，把党的领导贯穿高校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保证，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并不断完



善。要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基本功，落实好《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抓实抓严学校和院系党建工作，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师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加强对高校课堂、论坛、讲座、网络等宣传舆论阵地的管理，营造规范有序而又生动活泼的学术生态。

**2. 深化依法治校，提高学校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依法治理、科学治理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我们发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发布关于依法治理“校闹”的意见，组织召开全国高校法治工作会议，负责或者参与了高校学生管理、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高等学校招生、高校师德规范等规章的制定，指导高校开展法律纠纷的应对，努力提高高校对依法治校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水平。2020年，我们还将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把依法治理作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学校管理的基本方式，把法治融入学校治校办学的各方面各环节，以法治化推动、服务和保障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持续推进高校章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评估高校章程实施情况，建立章程实施监督机制，健全章程的解释和修订程序。高校要以章程为依据，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及规范性文件，构建形成规范统一、分类科学、层次清晰、运行高效的规章制度体系。

**3. 加快教育立法，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保障机制。**建设一流大学，法律制度的完备是基础更是保障。2015年，我们推动修订了《高等教育法》，将此前高等教育目标宗旨、拨款体制、办学体制、质量监督、学术治理等方面形成的改革成果予以法律化。回顾《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的20年，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阶段，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过程，高等教育质量快速提升，法律的保障作用得到了实践的证明。目前，正在推进学位条例、教师法、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其中包含了如何进一步改革学位制度，减少和优化行政审批，增强学校自律，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如何根据发展需要，明确教师权利义务，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如何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制度，促进不同类型高校的协调发展等，这些内容都与高校改革发

展密切相关。

4. 推动“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治理环境。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高校管得过多过死的状况基本改变。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与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办出特色的需求相比，目前的管理方式还远不适应，高校自主权还不够，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解决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要进一步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扩大高校在专业设置、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外事审批、教师职称评审、人员总量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放管服”改革列入了2018年首轮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列入了年度教育改革重点督察事项。各地各校普遍制定落实办法和实施细则，高校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目前，正在研究构建教育部门权责清单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努力使教育部门职能更加优化，职责更加明晰，权责更加协同，服务更加到位。

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经费保障、一流的学生、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学术成果，还要有一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期待“双一流”建设高校进一步发挥标杆和引领作用，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经验，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 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及路径 (笔谈)

钟秉林 洪成文 李立国 周海涛 李泉鹰

## 面向重大现实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教育科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大地，面向基层一线，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教育科研的实践性，以重大教育战略问题和教育教学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支撑引领教育改革发展”。简而言之，就是面向重大现实问题，深化教育科学研究。部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转型升级，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导致社会职业和人力资源需求变化，要求高等学校调整人才培养规格、学科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再次，从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关系来看，教育改革张力增加，系统性不断加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之间改革的关联度增加；同时，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教育决策过程伴随着多元利益诉求的冲突与博弈，教育外部制度、政策、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增强，需要教育系统内外、教育的不同部门之间加强协调，注重综合平衡、统筹推进。最后，从国际视角来看，随着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融合与竞争并存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加，人力资源和教学资源流动加速，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在传播中融合；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加剧，高等

教育国际化遭遇文化认同的挑战。如何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框架下，积极推进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国际拓展，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格局重构，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主题。

概而言之，教育主要矛盾转化和发展方式转变，学校从社会边缘步入社会中心，教育利益相关者诉求多元，教育内外部联系更加紧密，诸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使得教育现象更加复杂，教育规律更加隐蔽，教育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探索。

### 一、关注和发现重大现实问题

面向重大现实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要增强问题意识，发现新问题，研究真问题。

第一，教育理论、观念层面的问题。如何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合理的教育公平观，尤其是适应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特点的人才观和质量观等，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首要问题。第二，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保障，教育治理就是要处理好学校与政府关系不顺畅、学校与社会关系不协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第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教育资源分布与分配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校际差异的问题一直存在，包括教育财政投入、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资源的分布等。第四，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变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学生工作创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第五，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实践路径。包括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促进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双一流”建设大学的建设与评价等。第六，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包括民办学校、教育产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等，民办学校集团化办学等发展新业态也值得研究者关注。教育科学研究要发现新问题，提取真问题，围绕中央关心、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 二、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化研究

面向重大现实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增强科研成果转化意识，全面提高教育决策服务能力。

第一，规范政策研究，提高资政服务水平。既要重视教育政策研究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又要将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要重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政策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要科学解读有关政策和改革举措，搭建社会公众了解政府决策的桥梁。第二，重视微观应用研究，强化指导实践功能。高等教育研究要关注高校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重视校本研究和院校研究，主动服务于高校改革发展和管理实践。第三，加强比较研究，增强研究的针对性。既要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又要保持理性的批判与反思，结合中国国情和高校实际，开展本土化实践研究。第四，探索“跨域”“跨界”“跨学科”研究。要突破教育不同层次、类型、领域的界限，实现“跨域”融合研究；要重视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实现“跨界”系统研究；要注重不同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实现“跨学科”创新研究。第五，改善学风与文风。既要支持兴趣导向、自由探索、个体研究；更要鼓励问题导向、团队合作、协同攻关。要倡导严谨求实，保持个性风格，研究话语体系，引导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不断深化高等教育研究，服务政府教育决策，指导学校改革实践。

## 三、重视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

面向重大现实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教育基本理论的指导、支撑和解释作用。

缺少理论指导的问题研究与实践探索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学科也会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庸”。教育（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学科，教育学需在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方面不断完善；作为研究领域，教育研究需要更好地回应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学科发展和实践诉求构成了推动教育研究的双重动力，学科交叉融合将



促进教育理论和教育观念的创新。在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一直存在过分重视欧美国家教育理论和方法论的现象，而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教育理论的挖掘、继承与发扬。新时代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弘扬中国优秀教育文化传统，扎根中国大学办大学、研究大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理论、制度发展的脉络，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增强中国教育自信。

#### 四、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

面向重大现实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应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

首先，丰富和完善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借鉴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成功应用的统计分析法、模型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手段，创造性地运用于教育领域。其次，注重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研究方法要为研究目标、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服务，通过运用合适的方法手段，揭示复杂和隐蔽的教育规律，阐释杂乱纷繁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再次，注意避免陷入“纯技术性”误区。一方面，要加强教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充分运用认知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开展教育研究，拓展教育科研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会对传统的教育观念、教师角色和师生关系、学习方式和教学策略、教学组织形态和教室布局等带来直接的冲击与挑战，但是并不会改变教育育人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应该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加强教师的育人功能，回归教育本质，保持教育初心，警惕背离教育的基本价值。

总之，面向重大现实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聚焦于创新理论、科学资政、指导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科及研究领域的特色优势。

# 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呼应高教实践

洪成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要不要呼应高等教育实践是不证自明的。如果不能呼应实践，那么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呼应高等教育实践既是服务社会的体现，也是丰富自身更好发展的手段。因为理论源自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高等教育理论，实践不仅为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生长环境，也为理论得以检验提供了应用的“靶场”，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还为理论提供了生存的合法性。当下来看，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存合法性，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很多问题。这是需要高等教育研究界深入反思的迫切问题。本文首先阐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二八”偏向，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提出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 一、理论与高等教育实践关系的再梳理

高等教育专家刘献君说过：“一线的工作经验对于我的教育研究帮助很大。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再进行研究，得出理论、结论，研究与实践是互相推动的。由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这是我的研究路径。”由此可见，理论只有与实践密切关联，才能找到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第一合法性。然而，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实践的需求，理论不闻不问；实践的需求，少有人问津；实践逐渐与理论疏远，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有没有理论研究，似乎没有多大的差异。有人说高等教育理论界与高等学校办学实践之间也存在着“二八现象”，比如，80%的研究者都在做理论研究，而为实际服务的实践导向式研究不足20%。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研究对象、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的聚焦上。第一，高等教育学者存在着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多数学者的研究主旨不是为了解决政策和实践问题，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升迁问题，从较低级别的职称到较高级别的职称发展，这是最重要的目标追求。至于能否走进高校，面对实践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方案，却不是最关心。第二，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对偏狭。所谓偏狭，指的是只看

到了部分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研究学术成长问题一定是研究一流大学学生的成长；研究教师队伍建设一定是研究一流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大学规划和发展不是研究中国的“双一流”建设，就是研究美国的“常青藤”盟校。研究的偏狭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几乎将80%的精力用到了占比不到20%的高校中，而需要研究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发展、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地方普通高校的洼地、偏远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不平等以及对世界同行讲好中国高等教育故事等问题，研究成果却严重不足；第三，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成果偏向于理论思辨和哲学思辨；哲学思辨也不是就很容易产生成果，但是相比实证研究来说，还是要容易得多，如同伯顿·克拉克在《创建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中提出的十大案例，涉及国别众多，蹲点调研需要很长时间，这类鸿篇巨制式的研究，要想速成是万万不可能的。另外，我国高校职能部门工作繁忙，也不很愿意接受研究者的访谈，且数据公布有诸多限制。理论工作者即便走进高校，也很难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材料和数据。多方面造成了高等教育学者偏重思辨研究的偏向。第四，高等教育学者忙于本学校的研究事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为本大学服务也是应该的，但是久而久之，我们的学者就成了会议报告的撰写机器，撰写报告固然也是研究，但是时间长了会损伤其理论水平的提高。忙于本校事务性报告，还会影响其学术交流和合作。同时，他们用于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将大大减少，很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同行也多有抱怨，认为他们与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工作的区分也越来越小了。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全国近六百家高等教育研究所（院、中心、室），拥有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近万人，但是我们离高等教育研究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二八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要建设高等教育研究强国，那么至少我们得改变这个“二八现象”。即使不能发展到“倒二八”，也要发展到“五五”，或者“四六”。换言之，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更多关注实践问题，少一点自娱自乐式的研究；打开视野，而不只是关注“双一流”建设的高校；重视思辨研究，但不仅仅是思辨研究；忙于本学校的工作需求，但更要研究高等教育的全局问题和趋势。

## 二、理论研究呼应高等教育实践的八大策略

当然，作为学者，我们应该成为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主力军，我们做出积极改变的意愿和态度，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全部，但至少会有助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的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呢？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加强努力。

第一，要加快步伐，更多地走进大学发展或高校的学生、教师和管理者当中去，腿要更勤，嘴要更勤。不走进高校围墙里，怎么知道大学的研究需要，不了解需要，又怎么能服务他们；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服务好他们就会变成空话。高等教育研究界流传很广的中药研究成果几乎无一意外是对实践需求的及时解决或满足。1960年美国加州颁布的“总纲计划”，就是为了回应加州高等教育急速发展的现实需求而制定的政策，这个计划不仅让加州高等教育有序发展，为建设美国高等教育最强大的州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全面启动建设四个现代化，但是人才缺乏是重要的瓶颈。李政道等科学家提出的“物理学人才赴美留学计划”便立即成了中央政策，推动了我国物理学人才的培养，也为我国建设科教强国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2007年，高等师范教育发展遇到了生源下滑的巨大挑战，未来的中国教师素质严重下滑的话题引起了顾明远等教授的关切，国务院采纳了他的研究成果，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由此而出台，中国教师培养才又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多么深奥的哲学思辨，但是因为离学校很近，离实践很近，研究成果很接地气，所以能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实践。尽管不能将是否接地气看作是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价的唯一指标，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成果一点地气都不接，也不能说它是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因此，要繁荣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就必须走进实践。如何走进实践？至少要在态度和方法上下功夫。一要学习黄炎培和陶行知等老一辈教育家，树立教育可以改变社会的自信。我们也要学习费孝通那样不畏艰难地奔赴中国乡村第一线，从事自己的调查和研究。费孝通的早期经典社会学著作“都是以中国乡村社会为研究对象，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报告，而且其中提出的问题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言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即便是在西北联大暂时留住汉中的时候，很多学者“不仅做



出了重要的科学技术贡献，而且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以高等教育滋养西北，推进了西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要从行动上走进实践，思想上要首先走进实践。走得多了，研究者的腿杆子就硬朗了；走得多了，尽管很累，但也感觉欣慰。

第二，要在选题上做好平衡。当下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主要的研究选题还是依据各种课题申报指南。但是过多地关注课题申报指南，将无疑会把我们的研究与精力局限到政策和理论层面。久而久之，学校需要的我们不感兴趣，我们的研究学校也不感兴趣，二者渐行渐远。当然，不全是研究者不感兴趣，而是研究者不能感兴趣。学校的横向课题再多，也不可能对其教授职称的晋升或者当前最为紧迫的“非升即走”问题产生促进效果。现实的尴尬让我们只能做好一个平衡，那就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与申报纵向大课题、拿政府大项目之间维持平衡。维持这一平衡，对于个人是有利的，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研究界也是可取的。

第三，要展开合作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要与实践者加强合作，让他们有机地加入研究队伍中。比如我们给地方高校提供规划和发展研究，首先要与案例学校沟通好，不仅仅要完成一个规划文本的制作，而且要带来案例学校规划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一次合作的成功不在于成功地做完了规划，而是带来了校内规划能力的提高。我们的服务不是永远持续的服务，而是尽量让我们完成合作项目，因为内部团队能力提高了，外部专家的这把拐杖就没有价值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于大学如何筹资，我们要坚持与校友会、基金会开展合作研究；对于大学如何规划，我们要与发展规划处、人事处以及学校分管领导一起合作探讨。合作，不仅可以提高学校内部的能力建设，而且也能促进双方的共同提高。

第四，要做好研究分工，这也是呼应高等教育实践的关键。分工就是要根据高等院校的具体需求，突出不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甚至不同学者的研究特色而从事自己的研究。有研究学生就读经验的，也要有研究学生学业规划发展的；有研究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也要有研究高层次人才流动和引进的；有研究财政分配的，也要有研究社会资源拓展的；有做政策研究的，也要有做院校研究



的。一旦有了分工，我们就可以做到术业有专攻，专业研究水平就会提高，服务社会实践的效果就会更好。分工让高等教育研究者可以避免对某一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的一窝蜂扎堆现象或重复性研究。当然，分工不是行政上的安排或强行推进，而是学者共同体的相对区分，区分也不排除有共同研究。学术研究应以自由探讨为前提，而这个自由才是学者分工的关键。

第五，要通过大数据和定量研究提供更多证据本位的研究。研究工具在过去是我们的弱项，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实效性，要做更多以证据为本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更为直接，解释性更强，可以增加研究成果的直观性和可接受性。如果想要影响教育政策或相关决策，那么含有证据和大数据的建议被接纳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在影响高等教育实践或某一所高校的发展方面，含有证据和大数据的政策建议，更有可能在学校决策层面形成统一意见，从而更有可能被高校决策所接受。对于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即便倡导定量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研究，但是并不除其他方法的运用，研究方法还是多元为好。

第六，研究评估上也要有适当调整。评估促发展是共识，什么样的评估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研究偏好。目前高校中的学术评估存在着重理论而轻视实践的偏向。实践成果的编著不能算成果，或者说不能算是重要的成果。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成果才是重要的成果？另外，评估中唯国外刊物马首是瞻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只要是国际刊物上的发表就是高绩效，就是高水平，如此下去，一定会让那些走进高校踏踏实实做研究的学者心寒，甚至对实践有意回避之。当然，一线的研究并非不能出大成果，但显然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更长的周期。

第七，要为学者走进实践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在健全的机制下，高等教育研究者还是愿意做一线研究的。那么最需要建立的机制是什么？第一，要给横向课题以更高的待遇，不能将所有的横向课题都看作是低水平的，横向课题的评估不是考察其是否建构了理论，关键是要看其实际效果。第二，要让横向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相关起来，如果一项资政建议得到了权威部门的认可和接受，就可以认定其具有与顶尖刊物相同的水平，那么横向课题至少可以作为CSSCI来源期刊的水平或者核心期刊的水平来认定。第三，要将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实践研究成果给予鼓励和奖励。第四，对于县级机关单位所委托的课题，要研制出相应的鼓励计划。县级政府离群众最近，对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最为了解，但是因为其级别问题，由县政府所出具的任何科研成果证明，在大学里都不受重视。这种一竿子全都打倒的做法值得商榷。第五，对于广泛流传也有良好社会

效益的研究报告和学术短文，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肯定，优秀成果应该可以算作一定等级的研究成果。总之，科研成果的评估还应遵循精细化原则。如果我们的成果评估精细化了，理论研究工作者对实践的呼应也将大大加强。

第八，要倡导研究和服务的民族牌。何为民族牌，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色或个性。与国外相比，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特色主要从研究对象、改革经验和思维方式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国高等教育有很多研究对象是世界独有的，比如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政治辅导员制、高校之间的“大手拉小手”结对帮扶、民族学生高考特别政策、世界最大规模的学生住宿制、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等。其次，从改革经验来看，中国为全球提供了最为丰富的高等教育改革的 firsthand 资料和最多的鲜活案例，有研究型大学国家支持计划的成功，也有令人瞩目的中外合作办学事业；既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大学成功合并运动，也有鼓励不同类型学校齐头并进发展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很多，但是关于供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的提炼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再次，从思维方式讲，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改革思维是大部分国家所不能比的，与此同时，我们所坚持的信念是从来不变的。这种变中有不变，不变且不断在变的思维是很少国家所有的，这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导向式的思维是有紧密关系的。这些特点都在呼唤着高等教育研究者来加以深入探讨。

## 筑牢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文化根基

李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指出，“弘扬中国优秀教育文化传统，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理论、制度发展的历史根脉、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这就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既要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更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优秀教育理念，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增强中国教育自信”做出贡献。

### 一、高等教育研究应重视我国优秀教育文化传统思想的传承与弘扬，筑牢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文化基石

中国教育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有概念体系、表达方式，而且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教育精神和理念。例如，重视人格养成的人格观，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伦理观，“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观，知行合一与培养学生“身体力行”的知行观，内化育人与培养学生“主动精神”的学习观，教师榜样示范与道德责任的师德观，师生从游与春风化雨的教学观，师法家法与学术传承的师承观，这一切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对教育教学的认知和人生的感悟，承载着中华民族对于教书育人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的恢宏气象，奠定了最为深沉、最为持久的教育自信。

我们关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论、模式与方式方法，高等学校师生关系，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与人才培养方向等，都可以从古代教育思想中汲取智慧，丰富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如古代教育之人格修养，一是要以仁义标准要求自己，处理好人我关系。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推己及人到与人为善，这对于今天我们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公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二是要自强不息。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自称是“饭

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赞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颠沛流离、疏食淡饭的生活，虽足以使一个人不堪其忧，而仁人君子面对环境而不改其乐，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境界。三是对待荣辱关系。孔子提出“杀身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先贤们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也不能失节，这种观点对形成中华民族的节操和气节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天祥所赞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对“成仁”和“取义”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解读。正因为有此信念，中华民族的单一个体才能临大节而不惧，“留取丹心照汗青”。四是社会责任感。儒家的培养目标不是培养只会读书的书生，而是培养“敢为天下先”，“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认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统，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儒家这种精神保存在深怀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与民众精华人物的精神境界中。每当社会面临政治危机与民族危亡，每当民众陷入苦难深渊，社会上总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直言敢谏，舍身求仁的义士。这些都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起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 二、高等教育研究应总结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探索，特别是总结和认识在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的同时，如何继承中国优秀教育文化传统来发展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不是简单地移植模仿西方大学，而是有意识地与中国教育思想和传统相结合，是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与西方高等教育对话、抗争而形成的近代大学教育。清华大学的梅贻琦认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诚如梅贻琦所讲的“制度为一事”，“精神又为一事”，大学的制度是学习西方的，但大学的精神却与中国古代教育传统有着

不可分割的联系。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也是运用中国传统精神诠释现代大学内涵，提出大学人才培养按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目标来进行。

如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对于近代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办学宗旨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寅初在北京大学成立 29 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北大之精神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并即吾人之使命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指出，南开是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而设立的，其目的是“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提出了“允公允能”的培养目标。系统总结这些办学理念与实践，才能寻找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独特性在哪里，才能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是既学习借鉴西方，也是继承与弘扬了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也才能从理论高度总结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 三、高等教育研究要总结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他们始终扎根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伟大实践，他们善于总结办学治校的实践经验，探索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逐步形成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他们的教育思想丰富深刻，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他们的治校方略实际可行，蕴含着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

很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既是杰出的教育家，同时也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或者某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吴玉章、成仿吾、李达、彭康、江隆基、匡亚明、屈伯川、蒋南翔等都是早年投身革命，是坚定的革命者，并且在革命年代即开始从事教育工作。陈垣、马寅初、刘仙洲、陈望道、孟宪承、杨石先、王亚南、周培源、苏步青、贺绿汀等都是进步知识分子，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



动。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革命经历、社会经历，使他们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对时代发展趋势具有科学准确的把握。他们立场坚定，视野开阔、眼界高远，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坚定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持为人民服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服从大局，注重高校办学规律，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尽可能地抵制错误做法，保护师生。他们是可称得上教育家的大学校长，一方面是教育思想家，能够审时度势、旗帜鲜明、不失时机地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学校发展实际的教育思想，虽然这些思想不一定都以理论的形态出现，但它们都是教育理论宝库和教育思想大厦中的丰硕成果，也是区别于教育家与普通校长的根据。同时他们是杰出的教育实践者，能够身体力行地把教育思想转换为具体的办学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的发展并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留下了宝贵的足迹。

老一辈教育家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而且在实践中认真地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深入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办学实践，同时又将办学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善于将这些经验和理论总结和表达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吴玉章是新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开拓者，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始终坚持教育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持面向工农办学，致力于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与国家建设、社会需要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陈垣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注重研究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问題，认为高等师范院校是培养教育工作者和发展全国教育的重要环节，让青年学生树立起教师光荣的思想，自觉重视人民教育这一光荣事业。马寅初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坚持民主办校的精神，提倡教师在教学上、学术上要有创造性，学生要勤于思考，学术研究要敢于坚持真理。李达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校在搞好教学之外，还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学术地位，大学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学术重镇。陈望道主政复旦大学期间，提出复旦要致力于培养高级建设人才，为此，他倡导“好学力行”，以求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倡导又红又专，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倡导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美好的校园生活。

孟宪承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从中学教师既应具备专业知识，又要具备充分的教育技能这一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出发，对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担任中学教师的师范毕业生与综合大学毕业生彼此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辩证的看法。成仿吾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提出革命战争期间，教育要服务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的教育要积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他首倡教研室制度，积极促进教学、科研齐发展。彭康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交大人才培养的新路子，提出交通大学的办学特色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后，充分认识到区位优势 and 传统优势，明确提出了“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与华侨，为千百万华侨服务”的办学定位。周培源担任北大校长期间，重视基础理论，突出基础教学，搞好基础训练。苏步青担任复旦校长期间，呼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强调正确处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江隆基在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兰州大学校长期间，提出综合大学要有自己的办学特色，总结出了高等学校工作的八条带规律性的经验。匡亚明主张打通“文史哲”，创办“大文科”，提出大学要有高度的政治空气、学术空气、社会主义团结与文明风气、文娱体育风气。屈伯川在担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期间，倡导面向经济建设，开展科学研究，信任知识分子，建设一流教师队伍。蒋南翔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

总结、概括这些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系统认识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 **四、高等教育研究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更要扎根中国历史和传统**

高等教育研究要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与智慧，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筑牢历史文化根基。当代高等教育理论须建基于既有历史的基础之上，扎根于传统，放眼于全球。高等教育研究者要注重从中国教育文化传统

中汲取解决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概念工具和思想智慧，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是汲取传统优秀教育理念，进行挖掘和阐释，赋予其时代价值，赋予其新的教育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激发其生命力。创造性转化是通过改造使中国传统教育的价值体系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赋予传统教育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和当代呈现方式，从而使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获得新的生命力的一种自我生成和自我革新、自我发展的过程。

“创新性发展是按照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对传统教育理念的内涵加以拓展、完善，与现代高等教育要求相协调和适应，使之能够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发挥作用。创新性发展是要实现传统教育思想的提升超越，以发展为价值追求，以创新为价值特征，以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为价值目标，从而使传统教育思想富有鲜活的生命力，彰显‘以文化人’的本真价值。”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以传统文化与教育思想为本体资源，使中国大学的本土化文明与世界文明相融合，使得扎根中国大地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发展模式走向世界，最终建立起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

## 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周海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高等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应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直面发展难题、突破发展瓶颈、创新发展模式，尤其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强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聚力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持续强大的理论支撑。

## 一、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实践的成绩斐然

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注重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紧密结合，汇聚多方研究力量、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推进教育改革创新，研究力量持续壮大、研究内容稳步拓展、研究效能不断释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第一，聚集和培育相统一，研究力量持续壮大。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始终将聚集和培育研究力量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注重聚集多方研究力量，多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理论与现实问题。政策制订者从决策分析角度，着眼高等教育发展重大现实与瓶颈问题展开政策研究，不断完善教育制度体系；理论研究者从逻辑分析的角度，统筹推进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学理探究，持续增强教育理论深度；管理实践者从经验提炼的角度，聚焦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经验，深入推进教育理论创新。另一方面，重视培育后备研究人才，促进教育理论研究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在大力聚集已有研究力量的同时，以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为抓手，在保持研究领域连续性的基础上，推进教育理论创新。

第二，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融通，研究内容稳步拓展。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逐渐走出纯学理研究的“象牙塔”，理论研究、实践问题研究、政策制度研究紧密结合，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在理论研究上，聚焦于高等教育学科基本问题、高等教育理论重大问题、高等教育实践学理分析、高等教育政策理论依据；在实践研究上，关注高等教育发展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剖析问题症结所在、探讨改革发展方略；在政策研究上，围绕政策制订逻辑、高等教育发展现实问题等，不断完善高等教育顶层设计。整体上，以理论研究引领高等教育政策制订与改革实践，以实践研究推进高等教育理论与制度创新，以制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夯实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实践、制度根基。

第三，问题导向与方法契合相同步，研究效能不断释放。随着研究发展趋势向成熟，研究越来越能瞄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与关键问题，同步推进研



究问题的精准性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效能不断释放。在提升研究问题精准性上，紧跟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导向、高等教育发展突出问题、高等教育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和呼声，注重分析政策问题、探讨改革举措、回应社会关切，助力化解实践难题。在提升研究方法科学性上，在实践中促进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拓展，在推进形成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多学科研究等多种类型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適切性。同时，出台了《关于在教育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促进实证调研与科研诚信建设，对“真”问题开展“真”研究，释放研究效能。

## 二、统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关系

立足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依然面临着十分突出的问题，深入研究并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难题，总结实践经验、提炼实践规律、强化学理分析、建立系统学说，进一步推动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兼具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还需要统筹协调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统筹学理研究与咨政建言的关系。学理研究与咨政建言的关系，本质上反映着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关系。智库研究不同于学术研究，但又根植于学术研究，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学术研究为智库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思维方法，智库研究则为学术研究成果走向实践提供出路、促进学术研究的创新和繁荣发展。学术研究是纵向的，以理论为依托，关注基本理论问题及对实践问题的学理分析，重在推动理论创新发展；智库研究是横向的，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政府、社会及行业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重在提供有坚实学理支撑的政策研究报告或咨政建议。一项好的学术研究或智库研究往往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只不过前者更加偏重学理性，后者的实践性更为明显。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日益深入、高等教育实践问题日趋复杂，应实现学理研究与咨政建言的深度融合，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提升高等教育研究质量。

二是统筹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改



改革发展中的两项重要内容，统一于高校改革发展全过程。一方面，二者从根本上反映着高校的两项基本任务。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中心，高水平的学科建设表现为学科资源聚集、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科技创新成果丰硕、社会服务能力较强；人才培养是高校基本职能，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表现为学生学习体验良好、能力发展较强、社会评价较高。另一方面，二者在发展中相互交叉、相互促进。学科建设重点在于专业建设、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等重点要素的建设，而这些教育要素又与人才培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以加强教育要素建设为抓手，能够有效提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在实践探索中提炼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经验。

三是统筹学派塑造与国际互鉴的关系。高等教育理论学派塑造和国际互鉴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既需要扎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保持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定力、塑造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学派，也需要密切关注国外高等教育实践状况、全面考察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立足中国文化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理论。具体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中，既需立足中国特殊的国情、教情、校情、学情，深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史经验、现实问题、发展模式、改革方略，在强化理论研究与学理分析的基础上，凝练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推动建立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学派；又需保持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学派塑造与国际互鉴中提升高等教育理论品位。

###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系统化

展望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将直面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基本理论与核心问题、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高等教育政策制订完善难点与关键问题，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凝练实践规律、深化理论研究、推进科学发展，从整体上筑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基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思想体系。

首先，从顶层设计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科学谋划和总体设计。从我国高等教育内部规律

性与外部规定性相结合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高点站位和高标定位，提高理论的指导性与预见性，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进一步凝聚多方力量、聚集多方资源、发挥多方效能，助力理顺高等教育外部关系、引导完善高等教育内部制度，大力优化高等教育发展环境、提升高等教育内生发展能力，提炼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时代背景、核心理念、推进路径、发展动力和内在规律。致力于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从实践发展到理论建构、再到指导实践的螺旋式上升推进进程，推动有关研究注重现实关怀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方案和思路。

其次，从重点议题看，要聚焦高等教育发展核心与热点问题，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以扎实的核心问题分析支撑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的解决，以深入的热点问题探索助推高等教育核心问题的深化。理论研究中，应该在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核心和根本问题研究的同时，直面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任务，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以人才培养为基本遵循，深入探索高校立德树人体系；以加强学科建设为重点，分析“双一流”建设内部逻辑与实践路径；以优化内部治理机制为核心，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举措；以加强课程建设为导向，研究“金课”建设的内涵要点与基本策略；以改善教学方法为目标，探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方式；以加强队伍建设为指向，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发展模式研究，等等。

最后，从研究范式看，推进研究范式丰富拓展与紧密融合，为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夯实研究方法根基。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历史和辩证法引入哲学，注重哲学的实践原则、历史原则、辩证原则。这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高等教育教育理论强调实践性、历史性和辩证性，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从既成性思维方式转向生成性思维方式，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的实践生成、历史生成、辩证性生成和自我生成。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特定的具体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中理解与把握具体的高等教育实践、具体的高等教育现实、具体的高等教育历史的内在联系，理解与把握各类高等教育现象的历史内在逻辑。当前在高等教育

理论与实践日趋复杂的形势下，只有选用适当的研究范式才能全面把握研究问题，只有融合多种研究范式才能有效推进高等教育理论创新。

## 高等教育研究要为立德树人服务

李泉鹰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为谁服务，是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终极关怀问题，也是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理想彼岸问题。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根据马克思的论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等教育研究首先是为了解释或认识高等教育世界，继而为了改变或改造高等教育世界，再而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最终还是为了人的发展。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是人创造了人的世界，而人类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自身。高等教育是人的伟大创造，人创造高等教育也是为了发展人自身。可以说，人是高等教育的原点和归宿、主体和客体、主题和核心、价值和尺度，没有人就没有高等教育的一切，也没有一切的高等教育；遮蔽了人，偏离了人，脱离了人，高等教育将失去最根本的合法性；高等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而行动。

高等教育研究意在走进神秘的高等教育世界，探明高等教育世界的奥秘，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为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理性思维和行动依据。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正所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高等教育教育要促进学生为学与为人齐头并进，成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与“专业能力创新拔尖”兼备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而不是缺乏德性和人性的单向度的人以及抽掉了脊梁骨的人。高等教育研究应形成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学术成果，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步和繁荣，全面服务于立德树人或教书育

人，系统服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终极关怀，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想彼岸，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承诺。偏离了这种终极关怀和理想彼岸，背离了这种责任使命和重要承诺，高等教育研究终将成为“一棵不结果的树”甚或“一颗不开花的树”。当今中国之高等教育研究存在构建理论体系与解决现实问题偏废的现象，高等教育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还需要警醒的是“无论是构建理论体系还是解决现实问题，高等教育研究不能眼里或心中没有人，不能偏离或脱离服务于立德树人的航向和坐标”。

首先，加强高等教育人学研究。教育从人而来，向人而去，与人同转。“一切教育以人的成长和发展为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因而教育必须根基于对人的认识和发现。”换言之，人是一切教育生发的逻辑前提，而“人是什么”是一切教育研究需要探明的第一问题。无论是立德还是树人，前提是认识人、理解人、发现人、尊重人和珍视人，否则，就无法真正做到眼中有人和心中有人，而眼中无人和心中无人的高等教育，必然是无根的高等教育、无智慧的高等教育、没有方向的高等教育和不能释放人的本质力量的高等教育。可以说，人是高等教育的“阿基米德支点”，是高等教育的认识论起点和实践论终点，是高等教育研究生发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为什么需要高等教育，人为什么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人怎样接受高等教育，要想回答这几个问题，都要从人说起。一直以来，高等教育研究有些怠慢对人的研究，在以高等教育学为主干的高等教育各分支学科群蓬勃发展的今天，高等教育人学似乎还未“被唤醒”。当下的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全面汲取哲学、心理学、生理学、医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人学思想，生成可以解释和指导高等教育行动的高等教育人学，全面服务于高等学校的立德树人。2019年5月19日，厦门大学邹大光教授在《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兼论高等教育研究为谁服务》的学术报告中如此强调：高等教育研究必须提升服务能力，必须增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如何把成熟学科的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研究中来；二是如何把成熟的理论用到不成熟的实践中来；三是用成熟学科的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成熟性；四是不应该满足于没有实践基础或事实基础不足的理论，也不应该满足于不能清楚



地说明理论框架的“理论”。总体而言，这种见地是对症的、独到的和深刻的。当然，高等教育研究不能只有借鉴，还必须立足于高等教育的特殊性来奠基自身的理论底座，立足于高等教育的复杂性来架构自身的四梁八柱，高等教育人学无疑是最重要的理论底座和四梁八柱之一。总之，高等教育研究不能因“人学空场”而失去了正确的航向，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不能因“人本缺失”而异化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羁绊，高等教育不欢迎一切形态的“伪人本化现象”或“人本化伪似现象”。

其次，加强高等学校德育研究。过去，我们对高等学校德育研究得不够，迄今呈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小学校德育研究口门，给人一种“德育是中小学校之责任”的错觉。事实上，德育不是一种阶段性教育，也不是一次性教育，而是贯穿于整个教育链条的教育，是典型的终身教育。与中小学校一样，高等学校也承载着德育的责任和使命。高等学校不只是教人“成才”和教人“成事”，还包括教人“成人”。成人、成才和成事在系统关联中完成，每一个人都是在成事中成人和成才，同时又是在成人和成才中成事。高等教育研究非常有必要探究成人、成才和成事的规律，引领高等学校德育走出“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的知识论窠臼，指导大学生在行动中或生活中陶铸自己的品行和德性，帮助大学生“学会自律”和增强“道德外炼力”。

再次，加强高等学校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研究。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高等学校的学科优势、师资优势、科研优势、平台优势等必须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否则，这种优势只能是一种摆设或装饰，隐含在其间的求真、求善、求美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或口号。当今中国高等学校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双一流”建设，不同学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唯有转化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成果，才能释放和彰显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否则，只能被当作高等学校炫富的一种资本或财产。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不少高等学校的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人才培养犹如行驶在两条永不相交之轨道上的两辆列车，集中表征为一流学科建设取得的学科优势、科研优势、师资优势和平台优势等没有惠及人才培养或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这在各高等学校一心抢占发展战略高地和谋求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的今天，却不懂得在各种优质资源的价值实现、潜能发挥以及优势共享上积极作为，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走出这种困境需要多方努力，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增强科研成果转化意识，引导鼓励开展政策咨询类、舆论引导类、实践应用类研究，推动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教案、决策、制度和舆论”，解决理论困惑、制度设计、机制构建、组织保障、实现路径等问题，攻克“高等学校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的堡垒。与此同时，有必要建立一种“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行动指南。

最后，加强高等教育“应然之是”研究。一切学科或研究皆有“求是”的责任和使命，只是不同学科或研究“所求之是”的彼岸不同而已。当代中国生态美学家袁鼎生教授认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求本然之是，必然之是，是谓实然之是。人文学科，在循实然之是的基础上，再求理想之是，是谓应然之是。管理学科，其规则、规定、制度、条文，有着强制性与必须性，应以实然之是与应然之是为依据，形成须然之是。技术学科，在遵从上述诸是中，追求最佳最好的方案、方式、构造与效应，成精然之是。哲学汇聚提升其上之是，成通然之是、统然之是与超然之是”。高等教育学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属性，不同类型或层次的高等教育研究聚焦于“不同之是”的探寻，这是高等教育研究需要恪守的健康法则。但是，鉴于高等教育的“属人性”和“为人性”，无论什么类型或层次的高等教育研究都不该忽视或缺失对“高等教育应然之是”的探寻，必须探明每一项研究背后潜藏的责任使命、行为准则和终极关怀，必须兑现服务于“教书育人”和“立德树人”的重要承诺。

# 疫情防控供给高等教育变革新动能

刘向兵

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给高等教育的影响、推进高教变革的力度，都是全面而深刻的。

## 一、教育理念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更加全面有力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大中小学推迟开学，全国高校 3600 多万大学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瞬间稳在家乡、稳在原地、稳在疫区，共克时艰。

全国 120 多所高校近 300 家附属医院的上万名医护人员“逆行”驰援湖北，成为疫病救治生力军，更多大学生踊跃投身抗疫基层，参与社区管理、乡村防控、物资调配等志愿工作，在疫情防控中践行使命担当。

武汉学院学生郭岳染病后自我隔离 38 天，未连累一名亲友，康复后还主动献血，帮助其他患者战胜病魔；深圳女孩、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刘浩自己构思、自己录制《WeAreAllFighters》英文短视频，向全世界发出中国抗疫的最强音。

这些鲜活的事例，让我们看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教战线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的突出成效；看到了高等学校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所开创的改革发展的可喜局面。

疫情防控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美丑媸妍。高等教育要抓住这次难得的契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地理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目标的重视，更加有力、更加立体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 二、学科专业上，加强民生领域学科建设要更加积极有为

疫情防控是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一次全面、系统的体检。疫情防控中“硬核”闯入人们视野的流行病学、中药学、生物/医学统计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公共卫生管理、社会治理、劳动关系、劳动法等人文社科领域，灾害防治学、应急技术与管理等文理交叉领域，都到了要更加重视的时候了。

高教界要站在对政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重视民生领域、公益事业学科专业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

教育主管部门要立足长远，宏观布局学科专业，适时优化学科目录，及时调配招生数量，对涉及民生领域、公益事业的学科专业出台倾斜政策予以支持。

各个高校要未雨绸缪，坚守“良心”，不追“热门”，不赶时髦，坚守特色优势专业，坚持内涵式发展、特色发展，引领教师积极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应用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好“卡脖子”科技难题，以一流的学术和智库成果供给服务社会、服务民生。

媒体也要加强对民生领域、公益事业学科专业的了解与宣传，鼓励医生、专家、学者等在媒体上积极发声，回应公众关切，加强科学常识教育普及，也让大家辩证看待“热门”“冷门”“长线”“短线”专业。通过共同努力，让“冷门”专业的价值凸显；让“小众”专业得到社会公众更多关注；让学科专业目录中层级虽低但关乎民生的学科专业，得到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让就业后平均收入水平偏低的专业也得到一定的政策调控。

## 三、教育手段上，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要更加高速有效

疫情当前，教育部部署“停课不停学”，在学生不能返校、不能聚集的情况下，推出了22个线上课程平台、2.4万门课程，提供了包括慕课、SPOC、虚拟仿真实验课等多种形式的课程，开放了国家网络云课堂、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国家开放大学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中国教育电视台频道节目等免费平台，指导学生在线学习或收听收看。

教师承担在线教育教学、在线辅导答疑、作业批改等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管理。运行两周多来，以其打破时空限制、教育资源丰富、教学评价快捷，

以及个性化多样化教学模式等优点，得到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普遍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高等学校的在线教学，不是为应对疫情临时仓促制作上线的，而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地各高校的共识推动、全员参与、技术支持下，蔚为大观，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不仅在疫情期间起到了救急作用，为高教界赢得全胜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有力助推了教育领域的“学习革命”。这就启发我们，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慢不得、等不起，我们要以此为契机、为动力，推进高等教育技术手段变革再深入、再提速。

总之，疫情防控是给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全面“画像”和“会诊”，更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新动能。

# 新工科教育治理刍议

刘坤 陈通

“新工科”（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获得广泛共鸣。在实践层面，相继涌现出以新工科建设“天大方案”等为代表的创新性探索。新工科教育涉及政府、高校、社会等多元主体，如何协同好历史与当代、国内与国际、政府与社会、高校与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完善新工科教育体系、创新新工科教育模式，将新工科教育价值最大化，实质上是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命题。本文提出“新工科教育治理”概念，并厘定其理论内涵、研究范畴等基本理论问题，为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撑。

## 一、新工科与新工科教育治理

### 1.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加速推进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正在推动高等教育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工程教育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更新周期，与信息及相关领域新知识产生与应用的快速发展不够协调，传统工程教育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需要。新工科搭建起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鸿沟的跨越之桥。

从理论层面来看，学术界特别是工程教育界在普遍认同新工科，并积极开展新工科实践的同时，在认识层面对新工科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甚至争论，这在客观上产生了“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对推动工程教育改革特别是新工科教育治理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当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新工科的内涵是：新工科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



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从理念、要求、途径三个层面对新工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从实践层面来看,新工科建设“天大方案”强调营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新格局,在新工科人才核心素养结构上,注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通过跨学院、跨学科的新工科人才培养平台进行复合式培养。

## 2.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理论内涵

新工科在实践层面的推动、延展和持续创新,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教育教学改革活动,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在新工科教育过程中,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涉及政产学研各方面,政府、高校、教师、学生、企业等多元主体必然要从不同的层面、环节、阶段参与新工科教育。

在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层面,必须坚持新工科教育的唯物论并正确把握新工科教育的辩证法。尤其要明确的是,新工科教育中的“新”是创新的“新”,是一种探索之义。新工科教育是在“老”的基础上创造“新”,在“新”的带动下改造“老”。今天的“新”可能成为未来的“老”。因此,在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具体情境中,必须基于持续改进、迭代创新的理念和眼光,分析其类型体系、主体构成、互动关系及模式。

我们认为,新工科教育治理是围绕新工科教育“与未来合作”的核心理念与“塑造未来”的主要目标,政府、高校、教师、学生、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共议、对话、协商、妥协、试错等多种方式后采取一致的行动,共同推进新工科教育持续改进、迭代创新的复杂过程。新工科教育治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呈现出多元性、系统性、合作性、持续性等多种特征。

## 二、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进展与现阶段理论特征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概念虽未明确提出,但新工科教育相关的研究中已涉及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研究内容。

### 1. 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概况

(1) 国际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与实践动态。德国学者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揭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趋势。技术和数字化正在改变一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二是大机遇。物理、数字、生物世界跨界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一系列新兴突破性技术涌现。三是大挑战。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将颠覆现有的商务模式，生产、消费、运输和交付体系将被重塑。2004年美国工程院发布的《2020的工程师：新世纪工程的愿景》提出，优秀的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创造力、沟通能力、商业和管理知识、领导力、道德水准和专业素养、终身学习等是未来工程师应该具备的素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 *The Future of Jobs: Employment, Skills and Workforce Strategy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强调了包括社会技能、系统技能、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资源管理技能、技术技能在内的交叉复合技能。

与此同时，世界一流高校在内涵意义上的“新工科运动”实践取得重要进展。代尔夫特理工学院在2014年研究报告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中指出，未来工程教育包括以下关键方面：工程严谨性、批判性思维与非标准化解决问题、跨学科与系统思维、想象力、创造力、主动性、沟通与合作、全球化思维模式、多样性与流动性、学生参与和专业学习共同体、就业与终身学习。麻省理工学院（MIT）于2017年提出了“新工程教育”计划（NEET），旨在培养学生能够开发21世纪中期将要建造的新机器和系统，并在2018年发表的报告 *The global state of the art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中指出，工程教育进入了快速和根本性变革时期，最好的工程教育不限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小而精学校，新的竞争者将为未来优秀工程教育建立新的标准。斯坦福大学提出《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其中最关键的计划之一“开环大学”，对教育模式进行了重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出台“NTU2020战略”，瞄准“5C”人才培养目标（Character, Creativity, Competence, Communication, Civil-mindedness）实施跨学科、本研贯通的“博雅英才课程”。

国际上内涵意义上的“新工科运动”开展了相关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但对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研究尚未深入开展。

（2）国内新工科教育治理及其研究进展。2016年6月，教育部在讨论工程教育改革时，首次提出“新工科”这一词语。截至2019年9月，国内关于

新工科教育的相关文献共计 2200 余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新工科？即新工科的概念、内涵、特征与要素是什么？新工科建设发展的起始阶段是典型的政策主导型逻辑。“复旦共识”认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机遇、新挑战，要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复旦共识”虽然没有明确给出新工科的概念内涵，但在操作层面指出了新工科内涵包含的一些要素，即一方面要主动设置和发展一批新兴工科专业，另一方面要推动现有工科专业的改革创新。具体来讲，包括五个方面：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天大行动”提出，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指引，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深入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推动思想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实现从学科导向转向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这已经初步勾勒出了新工科的内涵。钟登华在《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新工科的英文名称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并明确界定了新工科的内涵。他进一步指出，理解把握“新工科”，要充分认识到“工科”是本质，“新”是取向，要把握好“新”字，但又不能脱离“工科”。这是目前获得公认的新工科的内涵。与此对应，该文进一步指出，新工科具有战略性、创新性、系统化、开放式的特征。

第二，为什么要建设发展新工科？新工科何以为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国际竞争的环境使然。从全球的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及转型趋势来看，工业本身在三大产业中的数量、质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新的特点。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人类共同的挑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高端人才的竞争。加快工程教育改革，培养创新工程人才，主动承担起应对挑战、造福人类、塑造未来的时代责任，成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要战略选择。二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使命使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制造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支撑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动能转换，高等工程教育必须改革创新，由被动的适应服务转型为主动的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认真履行好高等工程教育的使命，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三是工程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从工

程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历次工业革命都对工程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塑造”作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高等教育从 1.0 发展到 4.0，虽不是完全对应，但总体而言，工程教育与工业革命始终在“合拍”行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指数级速度爆发式发展，新工科是工程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

第三，怎么建设发展新工科？从本质上讲，新工科教育是实用性很强的工程教育，最终要落地实施。在方法论层面，其路径与方法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宏观层面上的新工科教育体系构建。新工科教育根本性的变革在育人体系。新工科建设“天大方案”具备人才培养目标、核心内涵、基本导向、核心路径、实施模式等基本要素，构成了完整的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在实践中形成了构建新工科教育体系的开拓性方案。此外，华南理工大学发布了“新工科 F 计划”，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二是中观层面上的新工科教育模式创新。新工科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 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抓手，育人模式创新是新工科教育的关键性变革。目前关于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较多，既有个案性质的某一专业课程或教学环节的模式研究，又有全口径分析探讨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是新工科建设的基础，更新人才培养理念、重构培养目标和知识结构、转变培养方式是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本质内涵。

三是微观层面上的新工科教育要素重构。新工科教育实质性的变革在育人要素，相关研究体现了分类、分层发展的思维。聚焦于新工科人才核心能力素养，张凤宝等人提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更加注重理念引领，并积极面向产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增量优化”与“存量调整”两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新工科专业结构的路径与方法。陆国栋则认为应该有可供操作的新工科教育培养方案，并从突破学科壁垒、专业藩篱、本研隔断、师生淡漠、校企隔阂五个方面具体推进新工科教育。

## 2. 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的现阶段理论特征

(1) 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的产出主体不平衡。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的产出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新工科教育的政策逻辑、



知识逻辑、产业逻辑在国内呈现出“三足鼎立，合力归一”的趋势，其中的主导是政府的政策逻辑，知识逻辑、产业逻辑与政策逻辑呈现出高度的同频共振并形成合力。例如，2017年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文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基层首创精神，依托学科和人才培养的优势和特色，围绕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学科专业的新结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教育教学的新质量、分类发展的新体系等内容开展研究和实践，并分为工科优势高校组、综合性高校组和地方高校组三组开展研究和试点。此后，高校、产业界及非政府组织围绕新工科教育的“五新”开展了广泛的理论实践探索。

(2) 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的分化程度不充分。从新工科教育治理的自觉意识及研究的分化程度来看，国内外理论研究层面尚未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队伍和阵地。虽然国内已经明确提出了“新工科”的概念、内涵、特征以及新工科教育范式，并且新工科教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呈现出特有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研究手段，但从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等方面来讲，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仍然属于工程教育研究范畴，理论研究的分化程度仍然不够高，不能脱离工程教育而进行独立的理论探讨。

(3) 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的成果产出不充分。目前，对新工科教育治理研究大多停留在背景探讨、理论认知、改革路径等方法论的具体层面，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和突破性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工科教育的深入、可持续发展。对当前新工科教育治理中存在的科学问题，如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及其理论模型、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类型体系划分、全球范围内新工科教育的大规模适用性难题及其有效解决模式等缺少足够的关注，特别是从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统筹考虑解决这些科学问题的研究较少。

### 三、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研究范畴

新工科教育治理是一项实践性较强的课题，它涉及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同时又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它的主体更加多元、要素更加丰富、关系更加复



杂。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主体体系、类型体系、主体间互动关系及其规范等成为基本的研究范畴。

### 1.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及理论模型

在新工科教育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如政府、高校、教师、学生、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对“什么是新工科教育”存在争论，这一理论困惑带来诸多实践难题。实际上，自“新工科”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产业界等围绕新工科的概念、内涵、建设路径与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多种观点和看法。一方面，因为研究视角和实践惯性的路径依赖，各方对新工科的概念、内涵、建设路径等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另一方面，由于理论层面难以统一带来的困扰，甚至出现了新工科的“新旧之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新工科教育为先导的工程教育改革的速度和质量。

因此，从理论层面厘定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及其理论模型成为当务之急，有必要从价值层面探讨新工科教育治理，科学界定新工科教育价值结构的概念和理论内涵。我们认为，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内核是“与未来合作”，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包含若干理论要素并呈现出一定的理论模型。

### 2.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类型体系划分理论与方法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位列世界第一，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从体量上看，工程教育又占中国高等教育的2/3，位列世界第一。作为世界工程教育改革前沿，我国新工科教育治理必须放在世界坐标中来观照和考察。唯此，才能对新工科教育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并唤起工程教育大国建设的主体意识。在系统考察各国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工程教育改革后，我们认为，虽未有“新工科”之名，但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新工科运动”已经铺展。基于此，构建一套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类型体系划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

“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类型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特别是类型体系划分的基本理论与标准体系、方法亟待明确。

### 3.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及共同体构建

对世界范围内“新工科运动”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新工科教育的“大规

模适用性”是一个普遍的世界难题。在系统观看来，新工科教育是开放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高校、教师、学生、社会、企业以及若干利益相关者多元治理主体。因此，政策逻辑、知识逻辑、产业逻辑等构成新工科教育治理的逻辑体系，上述若干主体构成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新工科教育治理主体体系构成特别是其互动关系模式成为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精准厘定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构成，并构建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有效模式，使其在中国情境下能够大规模适用，是新工科教育治理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因此，紧紧围绕新工科教育的实践难题，构建“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界定多元治理主体体系的构成，构建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关系、有效运行的模式，以期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工科教育治理的重要研究范畴。

# 本科生的质疑态度 及其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阎光才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恩尼斯 (Robert Ennis) 提出“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这一概念以来,批判性思维便在欧美高等教育教与学领域广为盛行,它不仅被视为通识教育课程教学所要关注的基本素养,而且也是所有其他各类课程必须予以重视的核心能力。在我国,近年来关于重视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加强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呼声也颇有走高的趋势,然而,对于批判性思维究竟如何理解,它有哪些前置条件与要求,我们未必就非常清楚。限于既有调查工具设计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此并不想也无法就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特征及其培养做过多的展开,而是尝试结合掌握的调查数据,仅仅对当前大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形成过程中所必备的条件之一,即质疑、批判意识或精神,展开系统的描述性分析,与此同时,立足于群体内部在该方面表现程度的差异,探究它与学生学习行为表现之间所存在的关联。

## 一、批判性思维性向中的质疑立场与批判精神

在教育领域,批判性思维的最早提出者虽然是恩尼斯,但是,究竟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可谓众说纷纭,至今也并没有一个完全相对统一的认识。例如,赖 (Emily R. Lai) 通过文献梳理指出,所有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概念界定大都围绕哲学、心理学或教育学的角度,每个学科角度都存在众多不同的理解。不过经归纳,她认为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共识:如在能力上重视对观点、主张和证据的分析,强调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推断,重评价与问题解决;在性向 (disposition) 上具有开放、公正、理性、质疑、沟通、变通以及尊重他人观点的态度。为避免众多分歧带来的纷扰,在此仅将恩尼斯的有关观点略做梳理,

或可了解大要。

恩尼斯在 1962 年提出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应该说带有一定的逻辑经验主义倾向，他认为：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关于陈述的正确评估”，其基本要义在于教育者应该让学生掌握一种技艺（skill），即对任何陈述（非价值命题）的意义都要能够做出它是否可靠的判断，这种判断的依据可以存在三个维度：合乎逻辑、存在评判的标准与实用性。1964 年，他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将批判性思维概括为九大特征，即学生要能够判断：陈述是否有前提，是否存在一个假定，观察性的陈述是否可靠，是否能够将其做简洁的概化，假设能否成立，理论是否成立，争议是否是由于存在模糊性，陈述是否过于模糊或过于具体，所谓的权威是否可靠，如此等等。该阐释尽管依旧在强调批判性思维所具有的逻辑技能与技艺，但是，他至少提出了对“权威”所应持的置疑立场。1993 年，针对人们关于他提出的“批判性思维就是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性与反思性思考”概念，存在过于含糊而引起的争议，他又从测量的角度提出了包括来源的可靠性判别，结论、理由与假定的辨识，证据的质量判别，恰当且清晰化的问题提问等十个方面的特征。

恩尼斯因为是在教育界第一位明确提出了该概念而被称之为批判性思维之父，正如鲍尔（Richard W. Paul）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诸如环境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口膨胀、资源枯竭、全球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等各种深层次社会问题浮出的背景中，迫于对现实问题反思的情势和要求，批判性思维迅速在北美乃至欧洲的教育领域得以盛行，进而形成一个“批判性思维运动”。但是，反思仅仅聚焦于恩尼斯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技艺偏好显然是不够的，它实际上必然地要触及批判性思维的一些前置条件或性向，即对教育中知识乃至社会既有秩序的合法性问题的质疑。如人们往往认为既有的知识是经过证实的命题与获得坚实支撑的理论，而少有人去讨论其中可能存在的成见与偏见。故而，鲍尔认为，恩尼斯对技艺与艺术的关注是“低或弱意义”的批判性思维，它是自足性的（self-serving），尽管优于完全无批判性思维，但弱于“强意义”具有“公正意识”（fair-minded）的批判性思维，因为后者始终是以有争议的问题或质疑为先在条件。

以问题始或质疑在先，其实意味着批判性思维首先需要个体持有一种性向或者说是立场、态度等，性向不等于能力，而更近乎作为能力的前置条件。正如邓恩（GerryDunne）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性向有别于能力，但它是批判性思考者的DNA，反映为一种态度或心灵习性，这种习性就是“批判精神”。批判精神作为一种习性，它可以表现为主体对周遭日常世界各种现象与观点纷纭的一种有条理质疑态度，甚至对书本知识以及权威持有一种谨慎看待的倾向性。但这种质疑并非是无端的怀疑论或否认任何共识存在的相对主义，正如门德哈姆（TimMendham）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了当下社会中存在如愤世嫉俗的、伪科学的和集体性反科学的三种怀疑论，他认为这些取向是对批判性思维的滥用。有条理的质疑应是基于对知识以及有关社会观念可能存在缺陷甚至谬误的理性审视，以严谨的科学方法通过寻求经验证据来小心求证的态度。这种态度或立场其实在——杜威强调质疑与反省性思维的实用主义哲学、默顿关于科学共同体有条理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波普尔关于大胆猜想与反驳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乃至近代哲学的笛卡尔主义以及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等理论、思潮和方法中——都能寻觅到它的踪迹。简言之，有条理的质疑在西方社会有悠长的文化与历史源流，它强调对既有的知识、成见与观点持怀疑立场但又不是武断性地排斥，主张在对各种观点持开放、尊重、谦逊与灵活变通心态的同时，又能以探究之心去寻求其合理与否的证据和理由。

正是因为拥有这种质疑的立场，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学生才可能对教材中的知识、教师乃至权威的观点不会轻易接纳，更不会奉之为绝对的信条与真理，而是会立足个体经验、情境和智识生成困惑和问题，并对其予以检视和求证。当然，囿于学生的经历、理解能力以及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特殊性，学生的质疑乃至问题界定也可能是错误的。然而，即使是存在错误的界定，它至少也会启发学生通过自我探索、求解和澄清，丰富学生自我学习的体验，强化问题解决方法的训练和对正确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质疑并不意味着教学中的知识必然存在不确定性，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正是立足不确定性的假设或前提，人们才会在心理上具有一种质疑动机与取向。拉姆妮娜（MariannaLamnina）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发现，在课堂情境中，相对于确定性，设置教学内容的不确定性



情境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进而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所以，她认为，在不确定性、好奇心与学习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关联性的心理机制 [8]。当然，这里的不确定性毕竟源于一种人为的教学设计，而本文在此认为，或许存在一个更为值得去关注的议题：如果这种不确定性是源于学生的内在自觉，也无论它是倾向于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怀疑立场，它与学生的学习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迄今为止，还鲜有这方面的研究。

## 二、对教材、权威、科学的质疑态度与学生的学习行为

在大学的教与学情境中，本科生对知识确定性的质疑，主要表现为对教材知识、教师与学者的权威观点、科学以及科学知识所持有的理性或非理性怀疑态度，这种态度的程度是否会影响学生的有关学习行为？是存在积极还是消极效应？基于上述设问，本文尝试通过对“2019年本科生教与学调查（CCTL）”的部分数据进行挖掘（相关人口学信息见表1），对此展开探索性分析。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为：本科生对知识不确定性态度差异，会影响其相关学习策略与学习行为。在此将相关变量略作说明如下：

质疑立场或态度。教育场景中，质疑存在对象之区分。在此，我们界定为三类质疑对象，分别为，对教材即相对稳定的书本知识、对学科专家或教师即权威、对泛指意义上的科学或科学知识的质疑。为此，我们分别设置了3道题项来测量，“我会质疑教材中的知识”“我会质疑学科专家的知识”和“科学知识是确定无疑的（反向赋值）”，按认同程度设置5级评分，1代表“极不认同”，5为“非常认同”。三道题因为质疑对象不同，故分别作为三个不同的变量。

主动学习策略。考虑到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相关表现差异，我们把学生的学习策略区分为如下维度：对新旧知识之间关联取向、问题取向和理解取向，并分别设置了3道题项，包括“学习新知识时总能与已经学过的旧知识建立联系”“学习过程总围绕问题进行学习”和“阅读课程资料总是尽力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按认同程度5级评分，因子分析表明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99，解释总变异的70%。考虑到三者之间存在的相对一致性，本研究将上述3道题项加和平均，作为主动学习策略的观测值。

有意义学习表现。我们理解的本科生有意义学习，主要表现为学习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掌握方法和形成自己的观点或解决问题。对此，我们设置了4道题项，如“善于总结并改进学习方法”“学习过程中发现解决已有问题的新方法”“能够独立发现新问题”“能够形成自己的观点”，按频率5级评分，1为“从不”，5为“总是”。因子分析只析出一个因子，解释总变异的67.90%，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6，为此我们采取将4道题项加和平均作为观测值。

开放学习倾向。对该倾向的观测主要是基于学生合作意识以及小组学习中的参与程度与表现，包括3道题项：“与同学一起合作完成学习或研究任务”“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在小组任务重解决问题”，按出现频率为5级评分，并加和平均作为开放性态度的观测值。

### （一）本科生质疑态度的差异分析

为考察相关人口学变量对学生态度的影响，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详析有关变量可能对态度引起的影响。表1为本科生对知识确定性所表现出的态度在相关人口学变量中的均值分布。

表1 本科生对各方面质疑态度的均值（标准差）与样本分布（N=4461）

		质疑教材	质疑专家	质疑科学知识	N (%)
原“985”		3.48 (0.91)	3.35 (0.97)	3.22 (1.12)	994 (22.3)
原“211” (非“985”)		3.35 (0.90)	3.25 (0.89)	3.26 (1.04)	1406 (31.5)
其他		3.29 (0.89)	3.20 (0.91)	3.27 (1.04)	2061 (46.2)
	男	3.44 (0.91)	3.37 (0.93)	3.19 (1.09)	2108 (47.3)
	女	3.27 (0.88)	3.14 (0.90)	3.32 (1.02)	2353 (52.7)
大一		3.40 (0.94)	3.28 (0.95)	3.25 (1.09)	1199 (26.9)
大二		3.30 (0.89)	3.20 (0.92)	3.25 (1.02)	1312 (29.4)
大三		3.34 (0.88)	3.23 (0.89)	3.30 (1.03)	1185 (26.6)
大四		3.37 (0.88)	3.30 (0.92)	3.21 (1.11)	765 (17.1)
	统一招考	3.35 (0.90)	3.25 (0.92)	3.26 (1.05)	4279 (95.9)
	自主招生	3.42 (0.91)	3.29 (0.99)	3.23 (1.14)	175 (3.9)
	保送生	3.43 (0.98)	3.14 (1.22)	3.29 (1.11)	7 (0.2)

人文学科		3.43 (0.93)	3.30 (0.92)	3.40 (1.00)	414 (9.3)
社会科学		3.17 (0.87)	3.11 (0.89)	3.28 (1.01)	837 (18.8)
自然科学		3.37 (0.91)	3.29 (0.94)	3.27 (1.11)	695 (15.6)
工程技术		3.40 (0.90)	3.28 (0.92)	3.20 (1.07)	2340 (52.5)
农医军事		3.25 (0.84)	3.20 (0.89)	3.51 (0.96)	175 (3.9)
	前 10% 以内	3.52 (0.92)	3.39 (0.94)	3.23 (1.12)	642 (14.4)
	前 10%				
	~20%	3.41 (0.88)	3.32 (0.91)	3.25 (1.07)	793 (17.8)
	20%~40%	3.32 (0.88)	3.22 (0.93)	3.25 (1.04)	1175 (26.3)
	40%~60%	3.32 (0.91)	3.21 (0.89)	3.25 (1.07)	1130 (25.3)
	60%~80%	3.26 (0.87)	3.16 (0.94)	3.29 (1.03)	499 (11.2)
	80% 以外	3.14 (0.95)	3.07 (0.92)	3.38 (0.94)	222 (4.7)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 在学校类别上, 通过事后比较发现, 关于对教材的质疑, 原“985工程”建设高校(以下简称“985”)显著高于“211工程”建设高校(非“985”高校, 以下简称“211”)( $p < 0.001$ ), “211”高于其他一般院校( $p < 0.05$ )。对权威的质疑也呈现同样的特征, “985”高于“211”与其他一般高校( $p < 0.05$ ,  $p < 0.001$ ), “211”与其他高校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质疑上, 三类高校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年级方面, 一年级无论在对教材还是专家的质疑上都显著高于二年级( $p < 0.05$ ,  $p < 0.01$ ), 但其他各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数据还显示, 对科学知识确定性质疑各年级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在性别方面, 在对教材与权威质疑上, 男性都显著高于女性( $F = 43.98$ ,  $p < 0.001$ ;  $F = 66.72$ ,  $p < 0.001$ ), 但是, 在对科学知识确定性质疑上, 女性则显著高于男性( $F = 17.94$ ,  $p < 0.001$ ), 这也意味着女性对科学知识确定性质疑相对于男性更强烈, 但对教材与权威的质疑则偏弱。

在学科大类方面, 事后比较发现, 社会科学大类无论在教材还是权威的质疑上, 都明显弱于除了农医之外的人文、自然与工程技术三大类( $p < 0.001$ ),

三大类之间不存在差异的显著性。该结论的确有些令人意外，后文将对此再做细究与探讨。但是，在对科学知识确定性质疑上，人文学科大类的质疑倾向最为突出，与工程技术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01$ ），与其他各学科存在微弱的差异。至于在成绩表现方面，成绩最好的前 10% 对教材知识的质疑显著高于所有其他学生（ $p < 0.001$ ），对权威的质疑显著高于除排名在前 10~20% 之外的所有学生。总体而言，排名前 20% 的质疑倾向最为突出，而排名在 80% 之后的学生质疑最弱。对于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质疑，不同成绩的学生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

以上统计分析表明，本科生对教材知识、权威的质疑程度与相关人口学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就总体而言，男性、“985 工程”建设高校、人文学科以及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相对于其各自参照群体，质疑倾向更为突出。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质疑，在整个样本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对而言，人文学科大类学生质疑倾向更为突出。在此，我们的关注点为：是否上述不同方面的质疑是批判性思维性向的构成部分？它们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有关特征，如学习策略、有意义学习行为以及开放性态度或倾向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因果关联机制？表 2 显示，学生对各方面质疑程度与主动学习策略、有意义学习表现和开放学习倾向之间都存在一种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不妨可以采取回归分析方法来进一步探讨彼此之间的关系。

表 2 学生对各方面质疑程度与有关学习行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质疑教材	质疑专家	质疑科学知识	主动学习策略	有意义学习表现
质疑教材	3.35	0.90	-	-	-	-	-
质疑专家	3.25	0.92	.728***	-	-	-	-
质疑科学知识	3.26	1.06	-.234***	-.294***	-	-	-
主动学习策略	3.79	0.66	.378***	.336***	-.183***	-	-
有意义学习表现	3.55	0.73	.407***	.392***	-.239***	.590***	-
开放学习倾向	3.56	0.80	.311***	.298***	-.201***	.467***	.652***

\*\*\*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二）本科生学习行为对质疑倾向的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本科生对知识确定性质疑水平与相

关学习行为之间的关联，在此，我们以学生的性别、学校类型、招生入学方式、年级、学科大类和成绩排名等为控制变量（皆设置为虚拟变量），以对不同方面的质疑水平作为自变量，分别对相关学习行为与策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见表3）：

表3 各方面质疑水平对学习行为与策略的多元线性回归标准系数

	主动学习策略	有意义学习	开放学习倾向
人口学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对教材质疑	0.267***	0.240***	0.194***
对权威质疑	0.100***	0.165***	0.123***
对科学知识质疑	-0.088***	-0.130***	-0.120***
调整 R 方	0.170	0.222	0.136

\*\*\* 表示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表3显示，学生对针对不同对象的质疑水平显著影响了其学习策略，在对人口学变量予以控制后，加入对不同方面的质疑变量后，调整R方对主动学习策略解释增加了0.139，表明质疑对主动学习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同样，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对各方面质疑的水平明显提高了它对有意义学习和开放学习倾向的解释力，调整后R方分别增加了0.179和0.117，表明不同方面的质疑水平与学生的有意义学习与开放性学习行为之间存在关联。通过观察发现，无论是对教材还是对权威的质疑，都更有利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有意义学习和开放学习。但是，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质疑，却是上述学习策略与行为的重要抑制因素，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议题，后文再略微展开分析。

根据阅读行为来审视学生的学习表现，也不失为一个可作为参考的角度。采用简单的相关分析发现，学生对教材与权威的质疑水平越高，其书籍阅读量越大，阅读内容也可能越为广泛。但对科学知识确定性质疑越强，反而阅读量越小。题项为本学期书籍阅读数量，1为“没有”，2为“1~5本”，3为“2~10本”，4为“10~20本”，5为“20本以上”（见表4）。



表 4 学生对各方面的质疑与阅读行为间的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质疑教材	质疑权威	质疑科学知识	老师要求阅读	专业相关主动阅读
质疑教材	3.35	0.90	-	-	-	-	-
质疑权威	3.25	0.92	.728***	-	-	-	-
质疑科学知识	3.26	1.06	-.234***	-.294***	-	-	-
老师要求阅读	2.49	0.99	.178**	.220**	-.265***	-	-
专业相关主动阅读	2.24	0.98	.241**	.280**	-.296**	.629***	-
专业无关阅读	2.73	1.06	.180**	.212**	-.142**	.404**	.497***

\*\*\*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三、结论、研究局限与讨论

上述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学习行为表现上，学生对书本、知识权威质疑立场和态度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对科学知识确定性质疑上，它与积极学习行为之间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因而部分证实了本文开始提出的基本假设。在此结合该结论略作如下谨慎分析：

第一，本研究中关于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质疑，或许需要进一步说明才能够更细致地揭示它与学生学习行为之间的关联。就总样本而言，关于“科学知识是确定无疑的”的认同均值较低，在频次上有约 47% 为极不认同或不太认同，比较认同和非常认同仅为 24%（其他 30% 为一般），前者将近为后者的 2 倍，这足以说明大多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是持一定怀疑或模棱两可态度。但进一步观察发现，该题项标准差达到 1.06，表明学生的评价存在较大的离散度。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通过对相关分析后发现，学生对“科学知识是确定性的”的否定态度，与学生关于“对教材知识的质疑”与“对学科专家或教师的质疑”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分别为 -0.234，-0.294， $p < 0.001$ ）。这又无疑表明，越具有质疑取向的学生，他们质疑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教材与教师。也许换一种说法更直白，即越信赖科学的学生，越可能对课堂中的教材与教师所呈现的知识具有质疑偏好，进而促进其积极的学习行为。

因此，结合本研究的实证结论，不妨回应上述关于批判性思维性向的议题，

很可能真正对学习行为具有积极影响的质疑是有条件的，即属于那种持守科学精神的批判立场，它不盲从于书本与教师的权威，而是对课堂中的知识抱有一种谨慎的理性察辨与严格求证的态度。对科学精神、方法与规范的认同，也正是批判性思维所尤为强调的能力品质。当然，至于为何有相当部分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持否定或模棱两可态度，这种态度是否代表学生关于科学信念、精神、思维与规范的付之阙如，以及它与学习行为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本文尚无法辨识其中的内在机制。不过，就观念层面而言，否定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也并无过错，在今天把科学知识视为绝对真理，无论在哪个学科领域都难成共识。真正令人忧虑的其实并非是学生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质疑，而可能为他们对科学精神、思维、方法与规范的漠视，因为即使科学知识未必是确定性的真理，但相对于其他至少要更为可靠。因此，如何全面正视和强化本科生的科学精神与素养的涵育，在如今信息繁杂与各种观念纷呈的环境中，则更显得迫切与重要。

第二，研究中发现，相对而言，社会科学大类学生对教材与权威的质疑偏弱，该结果不仅令人意外，而且会产生一种担忧。因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恰恰需要学生结合现实生活体验与现象观察，对既有的知识和权威能够具有独立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立场，进而促成不仅是有意义的积极学习行为，而且有助于围绕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伦理思考与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至于该结果所产生的原因，究竟是源自社会科学大类的知识属性、学生既有知识积累与思维习性，还是该大类教材与教师在课堂中的表现，本研究无法做出判断与评价。但是，通过对样本特征做进一步分析发现，来自一般高校学生占社会学科大类的86.5%，表明研究样本分布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缺陷，故而我们推测学校类型很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干扰变量。为此研究采取将一般院校样本剔除，仅仅针对“985”与“211”高校样本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依旧显示：在该样本中，社会科学大类的学生无论在对书本还是权威的质疑方面，依旧显著弱于人文（ $p < 0.01$ ， $p < 0.05$ ）与自然科学大类（ $p < 0.01$ ， $p < 0.001$ ），从而否定了学校类型在其中所存在的干扰作用。

第三，关于有条理的质疑或批判精神塑造，可能源于群体内部个体的禀赋

与人格特征差异，如本研究发现，男生更倾向于质疑教材与权威，而女性更偏向于质疑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也可能与学生既有的成长过程、教育经历有关，但在本科阶段，它更可能与学校的整体环境与文化氛围、教师学术视野与探究品质、课程的内容乃至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等之间存在关联。如研究发现，“985”高校学生对教材与权威的质疑显著高于其他类型高校，或可佐证这一点。因此，就总体而言，后天环境的培养与训练对于批判精神的养成至关重要。换言之，无论是就整体环境还是微观课堂情境而言，高校及教师应该努力去营造一种开放、民主、平等和宽容的氛围，允许学生去质疑而不是武断地压制他们的不同观点与看法。尤其是在课堂情境中，以争议而不是无可置疑的命题来引导学生产生疑惑或问题意识，进而围绕问题独立判断、思考与学习，不仅会更有助于学生通过理解而非记忆方式掌握知识，而且呵护了他们的好奇心与自我探究精神，促成其主动和有意义的学习行为。

第四，本研究需要再次重申的是：质疑与批判精神并不是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构件，而是批判性思维所必备的一种性向、态度与立场。但是，如果是因为有违个人固有的信念、成见和偏见而持有一种无原则、非理性的怀疑论倾向，它不仅不能导向批判性思维，而且还可能是批判性思维的大敌。当然，即使具备合理的质疑态度，如果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与技艺，如辨明问题、厘清概念、重视证据、善于合乎逻辑地推理如分析与综合等，也难以具备达到高阶的批判性思维水平。因此，本研究其实充其量揭示了批判性思维的质疑立场与本科生部分学习行为之间存在的关联，至于批判性思维能力本身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培养，以及它与学生学习行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尚需通过其他方式做进一步的探究。由于批判性思维主要表现为一种能力素质，它不同于性向与态度，后者很可能是学习行为发生的因，而前者则可能是学习行为的果。也就是说，学习行为应该是批判性思维性向与能力之间的中介变量，故而，它更突显了质疑与批判精神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作为前提条件的重要性。

总之，即使存在局限性，从本研究中我们至少获得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或启发：有条理的质疑与批判精神，有利于学生的积极与有意义学习行为。这种精神的培养要求教师在本科教与学的过程中，应淡化知识权威的角色，始终保持

开放谦逊的态度，不避讳学生提出有争议哪怕是错误的观点；在课堂讲解过程中，要避免对教材内容的生搬硬套，而是善于设疑问难，以系列连贯性的问题为导引或索引，不断启发学生做系统性的自主思考与探究。当然，还有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要求：大学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善于自省与批判的质疑者，是对批判性思维能力与技艺运用自如的驾驭者。在如今人们不断强调重视本科教与学的语境中，我们似乎对各种所谓的新理念、新方法尤其是新技术青睐有加。须知，如果这些所谓的“新”不是辅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其效果就难免让人存疑。

# 大学生选课与评教行为 理性与非理性倾向

李琳琳

##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大学教学质量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点。近两年，教育部多次发文关注本科教学，2018年8月发布的《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强调要整顿教育教学秩序，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吴岩提出“金课”应具备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特征。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从大学和教师角度建设和改进课程以符合“金课”的标准，我们更需要了解“水课”出现的原因，并防止课程“变水”。只有理解背后的机制和原因，并进行相应的调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教学质量下降的现状和趋势。

在大学教学管理中，学生并不是简单的被动者、接受者，而是通过参与选课和评教，获得了一定的学习自由与学生权利，与教师群体互动，共同形塑大学的实践教学，影响高校的课程质量。因此，我们在进行课程改革时，不能将学生群体的动机和意愿排除在外，必须了解学生群体的行为特征和意义体系，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或制约。我国当前的大学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产物，受到自由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理念的影响，“选课制”与“学生评教”等现代大学的教学制度设计，都凸显了学习自由和学生权利。但没有基本限制的自由和权利可能带来混乱，自由必须有与其相匹配的责任。大学对学生最重要的问责机制就是建立在课程考核和学分计算基础上的学位授予机制。我国当前本科毕业率高达90%以上，这与美国约50%的本科毕业率相比，是一种“学校宽容”，学校在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都在降低学术要求，没有了底线标准。给予了自由却问责宽松，学生学习的成效与课程质量必然堪忧。



大学生是相对独立的、具备理性的行为主体。传统经济学认为理性人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精确的计算能力，能够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做出最佳决策，达到效用最大化。社会学家韦伯却将理性划分为两种，满足手段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的“工具理性”，与满足了规范合理性的“价值理性”。韦伯批判现代社会普遍存在“有利于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有损于价值理性”的行为。因此本研究尝试分析学生选课与评教行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并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 我国的本科生选课与评教有什么样的行为特征和群体特征？(2) 大学生如何理解和诠释自己的选课和评教行为，他们的行动策略基于什么样的理性考量？

## 二、文献综述

早在19世纪的德国，基于对学术发展基本保障的讨论，就形成了“学习自由”的理念。即学生应该享有“选择学什么的自由、决定什么时间学和怎样学的自由，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学习自由与大学教师的“讲学自由”“研究自由”一起，被认为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获得可靠知识的先决条件。大学生既不是被管制的对象，也不是被灌输的对象，大学生享有接受或拒绝教师观点的充分自由。此外，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以及教学过程的全程参与者，也被认为在教学评价方面能够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输入，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上，拥有一定程度的发言。在课程管理中，学生自由和权利集中体现在选课和评教两个环节。

选课制可以追溯到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后来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推广开来。选课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生的学习自由，行使了消费者的权利，还被认为能够激发学习兴趣，使得学生以最旺盛的精力学习自己选择的课程。此外，从教育的目标上，可以帮助学生追求独特性和多样性。但选课制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耶鲁学院于1828年发表了《关于自由教育课程的报告》，认为大学生在智力上还不够成熟，不了解构成“高深学术成就共同基础”确定无疑的知识，因此不能给学生以选课自由。此外，学生自主选择中的实用主义取向容易导致知识的破碎和社会共同价值的失落。1872年，艾略特在哈佛大学推

行选修制，也遇到各种阻力，哈佛大学当时的入学率增长速度低于其他学校。此后，伴随着质疑和批评，选课制又不断得到发展，并逐渐形成必修、选修、限制性选修相结合、与专业课和通识课相结合的多种模式，试图在学习自由和学习要求之间寻求平衡。

学生评教实现了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权利，评教过程学生广泛参与，体现了民主性。学生作为教学全程的参与者，本身具有信息优势。此外，评教过程简单易操作，结果也便于管理者解读和比较。因此，学生评教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成为高校的常规活动。评教结果也被广泛应用于教学改进、人事决策、学生选课、教学奖的提名、绩效工资等方面。但大量国内外的实证研究都曾对学生评教的有效性产生质疑，学生评教的结果受到许多与教学质量无关的因素干扰，例如：(1) 教师个人因素，包括教师性别、性格、年龄等等；(2) 课程相关因素，包括课程负担和难度、预期成绩、班级规模等；(3) 评教管理因素，评教的方式是课堂评教还是在线评教、评教的维度和题项；(4) 学生相关的因素，包括学生年级、课程兴趣、学习投入与态度、学生参与评教的自选择偏差等。董桂才通过对同一位教师讲授的多个班级的学生评教分数进行泰尔指数统计，结果显示：24%-31% 的学生评教差异是非教师因素导致的，其余部分则归结于教师因素。2017 年发表的一篇元分析文章对全球学生评教领域 51 篇实证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再分析，认为教师的评教成绩和学生的收获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联系，据此否定了学生评教的有效性。

通过以上综述发现，已有研究较少关注不同学业发展状况的学生（包括读硕意愿、学业排名、挂科状况）在选课与评教两方面的行为特征及其原因。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 没有读硕意愿的同学，选课与评教时更多考虑负面因素；(2) 学困生在选课与评教时更多考虑负面因素；(3) 选课与评教的负面因素在不同成绩水平学生中的影响不同。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先使用自编的“本科教与学”调查问卷收集量化数据 (CCTL)，后针对量化数据中发现的大样本规律，针对性地进行深度

访谈,分析数量规律背后的原因。量化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层抽样,借助问卷调查平台共回收有效问卷 4461 份。样本分布如表 1 所示,样本兼顾了大学类型(原“985”、原“211”和其他大学),学校所在的地区、学生年级等因素。样本中性别比例合理,学生所在专业的成绩大致呈正态分布。有读硕意愿的本科生占 86.2%,将挂科两次及以上的学生定义为学困生,学困生占比 9.9%。

表 1 问卷调查的样本分布

类别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类别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学校类型	原“985”	994	22.3	学校地区	东部	2429	54.4
	原“211”	1406	31.5		中部	1264	28.3
	其他	2061	46.2		西部	768	17.2
年级	大一	1199	26.9	成绩排名	前 10% 以内	642	14.4
	大二	1312	29.4		前 10% ~20%	793	17.8
	大三	1185	26.6		20% ~40%	1175	26.3
	大四	765	17.1		40% ~60%	1130	25.3
性别	男	2108	47.3	挂科情况 (学困生)	60% ~80%	499	11.2
	女	2353	52.7		80% 以外	222	5.0
读硕意愿	不想读硕	617	13.8	挂科一次及以下	4014	90.0	
	想要读硕	3844	86.2	挂科两次及以上	441	9.9	

质性研究的访谈遵循理论抽样的原则,对 18 位高年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进行录音并转录,对转录后的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对受访者进行匿名处理,受访者的标识码用“访谈日期-学校层级-专业-年级-性别”进行标注。质性研究深入分析学生如何诠释和理解自己的选课与评教行为,这些行动策略背后是什么样的理性考量。

## 四、研究发现

### (一) 选课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对学生选课时情况符合程度进行调查,例如:“我会选择点名少的课程”,从“极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赋值为 1 到

5. 结果如图 1 所示，学生在选课时考虑诸多因素，符合程度的均值由高到底依次是教学口碑好、感兴趣、收获大、有助于就业、容易通过、职称高、点名少。由此可见，学生在选课时兼顾自身兴趣、学习收获和职业发展诸因素，在教师方面，相对于教师职称，更看重教学口碑的因素。与我们的研究结论相似，一项对美国大学生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的评教成绩对学生选课产生显著影响，评教成绩好的教师，课程更快被选满。需要考虑的是：学生兴趣本身有什么特点？他对于学生学习有何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引导学生兴趣？杜威认为“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这些兴趣不应予以放任，也不应予以压制……兴趣与自我的努力、严格的训练绝不是对立的，兴趣必须经由努力与积极的训练，进而成为动机与责任——即志趣”。因此，高校中新兴的旨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各类“潮课”，能够顺应学生对选修课的诉求与期待，但也需要引导学生兴趣与高深知识探究的努力相结合。尉建文等人的实证研究把课程分为实用和非实用两类，发现学生在选择实用课程时，会考虑内容和收益；非实用的课程，考虑兴趣、同学、朋友和社会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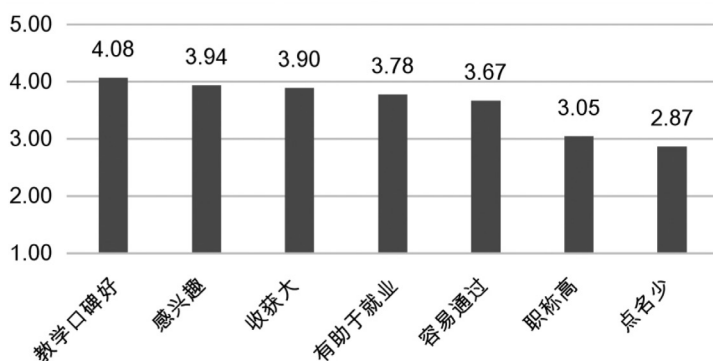


图 1 学生选课考虑的因素

“容易通过”和“点名少”两因素是选课制度设计中不希望被考虑的因素，在本研究的调查中，这两项虽然得分相对较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同。对“非常符合”和“比较符合”的频数合并计算，结果显示 60.4% 的学生会选择容易通过的课程，29.1% 的学生会选择点名少的课程。Brown 在美国的实证研究也有类似发现，那些在评教中被认为是更容易的课程，也更快被选满。

表 2 选课负面因素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

		点名少			容易通过		
		均值	标准差	T 值	均值	标准差	T 值
读硕意愿	想	2.84	1.11	-4.07***	3.67	0.96	-0.43
	不想	3.04	1.12		3.69	0.98	
是否学困生	非	2.85	1.11	2.67**	3.67	0.96	-0.17
	是	3	1.11		3.66	0.91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下同

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学生对“容易通过”和“点名少”这两个负面因素的赞同程度，我们选取两个与学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变量“读硕意愿”“是否学困生”。结果如表 2 所示：不想读硕的学生和学困生都更赞同“点名少”这一因素，与参照群体都有显著差异。不想读硕的学生和学困生选课时也更多考虑“容易通过”的因素，但与参照群体的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也有实证研究表明，选课动机在考研意向上有显著差异，有考研意向的同学在选课时更多考虑个人与教师因素。

把学生在本专业的排名情况和对消极因素的赞同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也能看到明确的趋势，排名越差的学生，在选课时取向越消极，越多考虑“容易通过”和“点名少”两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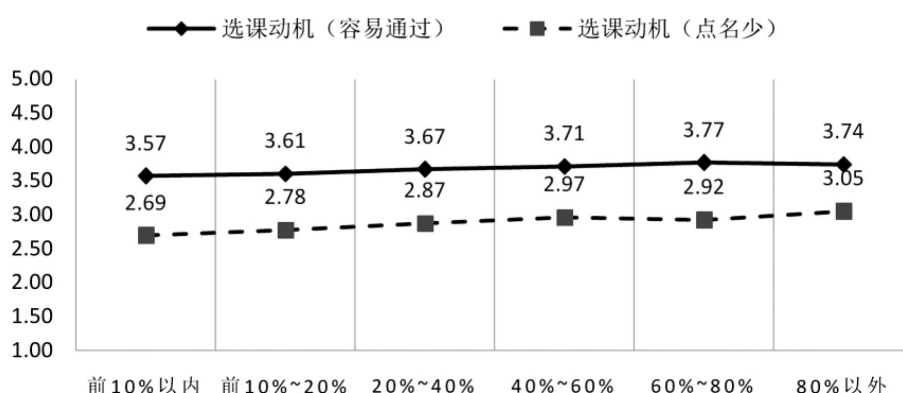


图 2 选课负面因素在不同成绩段学生中的分布

在我们的访谈中，学生的故事更深入阐释了他们考虑“容易通过”等负面因素的原因。我们选择其中一个典型个案进行分析，这位来自“985”大学工



科的大三男生，成绩优秀，准备读研，曾经修读的一门课程非常符合我们的“金课”标准，但是由于老师考核严格（我们将这位老师匿名为“严老师”），同学们纷纷避免选严老师的课：

刚进大学的时候所有人都告诉我不要选严老师的课，他很可怕，挂的人多，不给友情分。那门课有两个平行班，我们是按入学考试分配，我就分到了严老师的班上。他的课特别难，但他对知识掌握得好，讲得也好，每节课目的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手写板书，我从他的课上学会了很多。他让同学们上去做练习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他，他就自己在上面写，我就觉得他很可怜。这门课我学得很辛苦，绩点还算很高的，3.85……我们要去争绩点的，这对保研、出国都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选他的课，没有人传他讲得好，都传他给分低。因为有两个平行班，另一个班就给分松，绩点高。考虑到这两个平行班落差这么大，我们系就不让学生选了，提前给分好班。但学生们不乐意，现在我们17级的学生就在抗议，去找教务处告状，凭什么他们可以分到不挂人的老师，我们就要分到挂三分之一人的老师。（20190607-985-工科-大三-男）

可以看到，学生的选课策略是一种对绩点、保研、出国、评奖等高利害结果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个人在课程上的收获和成长更多是一种长期的、潜在的收益，但课程拿到的成绩是一种显性的、短期高利害的收益，自己的上课时间和精力是显性的成本。刘云杉对北京大学的一项质性研究表明，学生选课时会在学习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及学习产出（成绩和绩点）进行性价比评估，通过精心选课的技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Babad 等人认为学生选课的决策过程是在有限的信息和课程中，比较每一门课程能带来的效用和付出，在牺牲一些效用和换取其他效用间做出权衡，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学生在选课时的理性表现在对显性的成本和受益进行衡量，但非理性表现在对长期和潜在受益的忽视。

## （二）评教

同样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对学生评教时情况符合程度进行调查，例如：“我会给收获大的课程打高分”，从“极不认同”到“非常认同”依次赋值为1到5。结果如下所示：学生认同度的均值从高到底依次是“投入多(4.33)”“收获

大(4.33)”“要求严(3.75)”“得分高(3.62)”“作业简单(3.12)”“不点名(2.83)”。其中，前三项是我们在评教制度设计时期望被学生考虑的因素。后三项则是我们不希望学生评教时考虑的因素。我们将其归类为消极因素。虽然后三项的认同度均值相对较低，但也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认同这些观点。

对“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两项频数合并计算，发现57.3%的学生会在评教时，给自己可能得高分的课程打高分；34.4%的学生会给作业简单的课程打高分；27.9%的学生会给不点名的课程打高分。学生评教考虑的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行为和课程质量。国外一项研究调查了教师群体认为怎样能够提高评教得分？这项多选题的结果表明，72%的教师认为“减少作业难度”可以提高评教得分、68%的教师选择“给学生高分”、60%的教师选择“减少作业量”。学生评教考虑这些消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让教师感受到降低教学要求的压力。

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学生对“得分高”“作业简单”“不点名”这三个负面因素的认同程度，我们选取两个与学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变量“读硕意愿”“是否学困生”。结果如表3所示：有读硕意愿的学生评教时更多根据自己的预期成绩进行评教，但这个差异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不想读硕的同学评教时更多考虑作业简单与不点名的因素，不想读硕的同学与想要读硕的同学差异显著。学困生在评教时更会给“得高分”“作业简单”和“不点名”的课程高分，与非学困生的差异都非常显著。

表3 评教负面因素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

		得高分			作业简单			不点名		
		均值	标准差	T 值	均值	标准差	T 值	均值	标准差	T 值
读硕意愿	想	3.63	1.00	0.11	3.11	1.03	-2.05*	2.80	1.13	-3.31*
	不想	3.62	0.97		3.20	0.97		2.96	1.11	
是否学困生	非	3.61	1.00	3.12**	3.10	1.02	3.08**	2.80	1.13	3.98***
	是	3.76	0.93		3.26	0.99		3.03	1.12	

把学生在本专业的排名情况和对评教负面因素的认同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作业简单”和“不点名”两个因素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排名越差的学生，在评教时观点越消极。但“得分高”这一因素却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成绩排名在前 10% 的学生在评教时也较多认同“我会给得高分的课程打高分”，10%-20% 的学生最不在意，之后认同程度缓慢增长，排名 80% 以外的学生又有所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排名前 10% 的学生有能力争取奖学金和保研名额，因此非常看重自己能否得高分。而 80% 以外的学生已经没有希望争取这些重要机会，因此对于课程能否得高分就不太重视，可能对这个排名的学生来讲，及格就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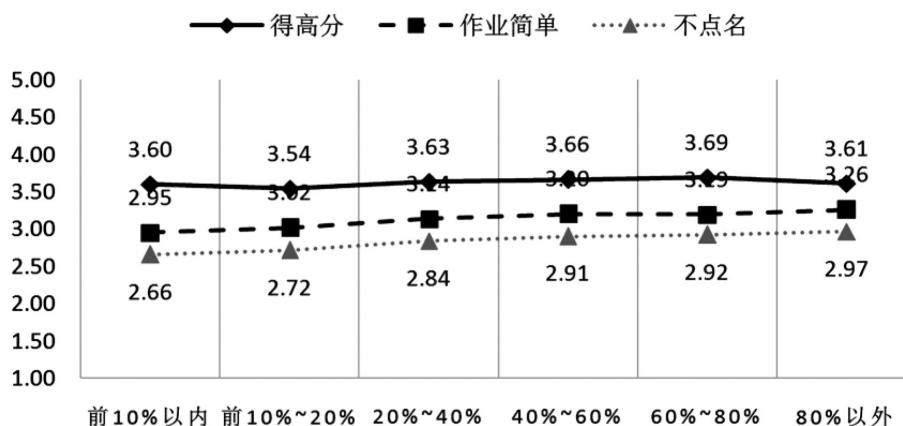


图 3 评教负面因素在不同成绩段学生中的分布

通过访谈进一步分析学生对评教行为的理解和意义阐释。有强烈诉求的学生会把评教视为自己行使权利的重要机会。学生能否得到评教反馈会极大影响他们的评教投入，一直得不到反馈又有强烈诉求的学生甚至会通过其他公开途径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此外，教师评学与学生评教同时存在，且都是高利害的量化评价，会影响师生双方行为的客观性。

有个老师不太像老师的样子，很喜欢跟学生计较。有学生质疑他观点的时候，他会非常生气地给怼回去，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比如说在微信群里。这就让人很难受，我室友终于逮住这个（评教）机会，给他评得不是很好。（20190608-“211”-社科-大二-女）

因为学校没有给你反馈，你只是评教了这个老师，但是你这三年都不知道老师得了什么分数，这个老师有没有在这方面改进。与其不知道评了之后老师会不会看，干脆就都评还可以，不太愿意花太多精力去评了。(20190531- 普通 - 社科 - 大三 - 女)

我经常看到朋友圈有学生用拼音缩写说：“XXX 老师，上课怎么怎么样，多水”，底下就会有很多也选过那个课的人附和。这些同学往往还加了其他老师（微信），事情就会被传到学院，这个舆论中心的老师就会被面谈，是有过这样的例子。比起评教，我觉得这个方法（利用公开舆论）我们收到的反馈效果要更好一点。(20190608- “211” - 社科 - 大二 - 女)

一个给我们打分很低的老师，他上课的确非常好，但是有很多学生讨厌他，评教的时候就给他分低一点，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客观地给分。(20190608-“211”- 社科 - 大二 - 女)

因为评教是在出成绩之前，有一部分同学就会给高一点的分数，不是为了讨好老师，就是为了攒人品、不要干坏事，给老师的分给高一点。(20190610- “985” - 社科 - 大四 - 男)

给分严、作业难、点名，这些教师为了保障教学质量而采取的教学手段会直接导致评教成绩变差。考虑到这些短期的投入和收益，貌似理性的同学将具备这些特点的“金课”或“虐课”列为公敌。在哈巍和赵颖的自然实验研究中，放松教师评学的成绩限制直接导致学生评教成绩的上涨，出现了教学相“涨”的现象。Eiszler 对美国一所高校 19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学生的预期成绩对评教成绩有显著的影响，由此认为学生评教是分数膨胀的诱因之一。Gorry 的研究发现限制分数的政策会导致学生评教的成绩更低。

## 五、讨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在学生进行选课和评教的过程中，没有读研意愿的学生、学困生、专业排名差的学生更多考虑负面因素。而这样貌似理性的行为策略，会损害长期和潜在的学习收获，还会通过选课和评教影响教师的课程设计，损害课程质量，最后导致非理性的结果。已有对我国选课和评教的研究中，已经

发现诸如选课指导不充分、评教工具有效性差、管理过程浮于形式、评教结果反馈不及时等问题。在打造“金课”、杜绝“水课”的过程中，改进选课与评教制度，弱化消极因素对课程质量的侵蚀是有效改革的关键。

### （一）学生选课的信息支持和充分指导

首先，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优势，在选课平台上提供丰富的课程信息，为学生理性匹配自身需求提供信息支持。例如：每门课程的选修条件、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学习责任、阅读材料、之前同学的文字评教等。其次，将教学发展中心的作用范围从促进教师的“教”拓展到支持学生的“学”，同本科生导师一起，为学生基于长期潜在效用的理性选课提供专业指导和信息支持。

### （二）评教结果的修正统计与谨慎使用

其一，评教成绩的统计须剔除低出勤率的学生，客观的出勤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投入，低出勤也意味着学生没有持续参与课程教学，评教本身就不具备有效性；其二，增加课程难度指标、班级规模指标和学生平均成绩指标，用以补充管理者对评教成绩的判断，弱化消极因素对课程质量的影响；其三，增加课程中期形成性评教和教师反馈说明环节，促进师生之间的沟通 and 理解，增强学生评教的反馈感；其四，设计专门的文字评教题项向学生公开，作为选课参考，增强学生评教积极性和知情权；其五，量化评教结果不向学生公开，对新开课程、新教师的评教结果只用于改进而不纳入高利害评价，晋升、奖励等高利害评价可以参考学生评教结果，但必须与专家评教、同行评教配合使用。



# 工科本科生主动学习特征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丁飞已

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我国高校工科本科在校生人数已逾 500 万，绝对规模位居世界首位；本科在校生中工科生占比超过 1/3，工科专任教师占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比例已超过 1/4，相对规模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伴随招生规模的扩张，工科班级授课规模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鉴于工科学科知识体系相对复杂，理论教学任务较重，长期以来我国工科教学主要采用大班讲授教学，工科生学习具有明显的被动学习（passive learning）倾向。21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工程教育相继掀起了回归工程实践的改革浪潮，开始由重科学轻实践的科学范式走向科学与实践并重的整体工程范式。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被动学习形式的掣肘和弊端也日益显现。

众多研究证实，主动学习既是激发工科生工程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提高工科生工程能力的重要手段。国内关于主动学习的研究主要分散在有关本科生学习过程的研究之中，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够充分，专门针对工科生主动学习的实证研究则更为匮乏。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对主动学习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厘清主动学习基本概念，并通过实证的方法了解我国高校工科生主动学习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改进工科教学方法、提高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提供借鉴。

## 一、关于主动学习概念的理解

从教与学的历史来看，主动学习方法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产婆术”强调教师的主动提问与学生的自主回答，“启发教学”强调学生的主动提问与教师的引导回答，二者虽然在

具体实施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通过问答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的主动学习方法。古代先贤的教育实践塑造了主动学习的理念，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直到杜威提出进步主义教育观之后，主动学习理论体系才得以逐渐形成，并开始由理念走向实践。在杜威看来，知识对于学习者而言属于被认识的对象，关于知识的学习往往采用被动学习方法；而活动学习则要求学习者主动投入、亲自参与学习事项，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内在的、精神的提升，因此活动学习往往采用主动学习方法。进步主义教育观明确区分了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的基本特征，让主动教学成为了可能，此后探究式学习、基于问题学习、合作学习等主动学习方法不断涌现。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对主动学习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特征和方法的研究，虽然在主动学习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尚未形成明确的主动学习概念，在对主动学习与活动学习关系、主动学习的实际效果的理解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

关于主动学习的共识主要包括：其一，主动学习是以学习活动为基础的教与学的方法，学习活动能够为学习者参与学习提供机会，是教师激发学习者学习主动性的基础，格里沃（Tershia A. Pinder-Grover）的研究表明，教师通常会借助特定的学习活动来界定主动学习，斯特维勒（Ruth A. Streveler）则把主动学习看作是所有有别于与被动讲授的学习活动；其二，主动学习是强调学生主动参与教与学过程的方法，学习者的主动参与是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的本质区别，费尔德（Richard M. Felder）与布伦特（Rebecca Brent）认为实施主动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所有学生都参与到学习中来，福斯特（Jennifer L. Faust）等人则把主动学习描述为能够让学生参与进来的所有学习活动；其三，主动学习是传统被动学习的有益补充，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埃德斯特罗姆指出，主动学习可以完美融入传统大班讲授教学。

学术界关于主动学习的分歧为进一步明确主动学习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分歧表现为：第一，主动学习是否等同于活动学习，部分学者将活动学习与主动学习一视同仁，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将主动学习视为一类特殊的活动学

习,如邦威尔(Charles C Bonwell)和艾松(James A. Eison)认为,同时满足强调学生参与、强调技能学习、强调高阶思维、注重学生参与学习活动、引导学生重视态度和价值观念等五个特征的活动学习方能称其为主动学习。松下佳代(Kayo Matsushita)进一步将是否强调认知过程作为区分活动学习与主动学习的标准,《美国本科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检测指标(2018)》在定义主动学习时,特别强调高阶认知目标是主动学习的主要目的,普林斯(Michael Prince)则把主动学习限定为课堂学习活动,以此区分主动学习与课后作业、自主学习。第二,主动学习是否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早期研究普遍倾向于认为主动学习能够提升工科生学业成绩、提高工科生工程能力、激发工科生工程学习兴趣、改善工科生学习态度。基于这一经验判断,齐克林(Arthur W. Chickering)与甘姆森(Zelda E Gamson)将主动学习纳入有效教学基本原则。然而,近期的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正在打破这一固有观念:普林斯发现,学者们提供的相关证据并不都是充分的,部分研究结果甚至证实主动学习无法提升工科生的学业成绩;巴伦(Cissy J. Ballen)等的研究结果显示,主动学习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所有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对于少数族裔(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而言,主动学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针对主动学习效果的争议,罗克珊娜推断主动学习只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诸多因素之一,它并不能够独立促进学生学习,而是与其他教育学的方法一道共同影响学生学习效果。

综合上述共识与分歧,本研究在此将主动学习定义为一类以课堂学习活动为基础、强调学生参与和高阶认知过程的一系列教与学方法的总称。基于这一理解,本研究认为,教师组织的课堂讨论、小组活动等课堂学习活动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基础,学生的主动提问、回答问题或思考问题等主动学习行为属于高阶认知行为,能够反映学生在主动学习中的实际投入程度。

## 二、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源于2019年“中国本科教与学调查(CCTL)”,调查对象为38所抽样高校的特色专业本科生,问卷通过在线问卷的形式进行发放,6027位本科生匿名参与了本次调查。经过人工筛选剔除无效样本后得有效样

本 4461 份，问卷总体有效率为 74.02%。其中，工科有效样本 2340 份，占比 52.45%。从样本分布（如表 1）来看，有效样本中男性工科生占比 64.70%，基本符合我国高校工科在校生中性别分布的现状；调查以一流大学高校与一流学科工科生为主（占比 76.20%），同时适当兼顾普通高校；年级分布较为均匀，大一、大二、大三本科生占比均在 20% 以上，仅大四本科生略低于实际在校生占比；调查涵盖了各主要工科专业大类，各专业大类占比基本合理，仅计算机类和化学与制药类两个专业大类占比与实际在校生占比存在一定差异。

表 1 调查对象样本分布

类别		N	占比	类别		N	占比
性别	男	1514	64.70%	专业	机械类	537	22.90%
	女	826	35.30%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412	17.60%
学校类型	一流大学高校	730	31.20%		电气类	251	10.70%
	一流学科高校	1052	45.00%		电子信息类	234	10.00%
	普通高校	558	23.80%		化学与制药类	185	7.90%
年级	大一	700	29.90%		材料类	127	5.40%
	大二	666	28.50%		土木类	124	5.30%
	大三	524	22.40%		计算机类	111	4.70%
	大四	450	19.20%		其他（含未注明）	359	15.30%

主动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课堂学习活动的一类教与学的方法，其学习效果可能会受到有关人口学与教育学背景变量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在此尝试结合既有的相关研究，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 1：不同性别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假设 2：工科生专业兴趣越高，其主动学习水平越高。假设 3：工科生对自身的学业发展目标定位越高其主动学习水平越高。假设 4：教师主动教学显著影响工科生主动学习水

平, 教师使用主动教学的频率越高, 学生能够参与主动学习的机会也越多, 其主动学习水平也越高。假设 5: 教学满意度越高的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越高, 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越高, 其对学习共同体的归属感越强, 越倾向于参与主动学习活动。

研究借助 AMOS24.0 对主动学习水平子变量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使用 SPSS26.0 将性别、专业兴趣、学业发展目标、教师主动教学、教学满意度分层纳入回归模型如下式所示的层次回归模型:

$$AL = \alpha + \beta_1 \text{Gender} + \beta_2 \text{EI} + \beta_3 \text{AG} + \beta_4 \text{AT} + \beta_5 \text{TS} + \epsilon$$

表达式中, AL (主动学习水平) 为因变量,  $\alpha$  为常数项, Gender (性别) 为控制变量, EI (专业兴趣)、AG (学业发展目标)、AT (教师主动教学)、TS (教学满意度) 为自变量集,  $\beta_1$  为控制变量回归系数,  $\beta_2$ 、 $\beta_3$ 、 $\beta_4$ 、 $\beta_5$  为四个自变量集的回归系数,  $\epsilon$  为误差。各变量具体含义如下:

**主动学习水平:** 依据前文对主动学习的定义, 结合主动学习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将主动学习水平分解为主动参与 (AP)、主动提问 (AQ) 与主动响应 (AR) 三个子变量, 主动参与考察本科生参与课堂讨论、小组活动等主动学习活动的频率, 主动提问与主动响应考察本科生在主动学习中的实际投入程度, 主动提问即学生在参与主动学习时主动发起提问的频率, 主动响应即学生在参与主动学习时通过回答问题、思考问题等方式主动响应教师教学的频率, 所有频率按 1 (“从不出现”) 到 5 (“总是出现”) 进行计分。

**专业兴趣:** 主要包括自主选择专业和专业推荐度两个变量, 自主选择专业测量本科生入学前对本专业的兴趣, 专业推荐度考察本科生入学后对本专业的兴趣, 满意度与推荐度均按五点计分。

**学业发展目标:** 以期待最高学历作为衡量标准, 按 1 代表本科、2 代表硕士研究生、3 代表博士研究生计分。

**教师主动教学:** 由讨论为主、小组项目、课堂汇报展示、实地调研、实验操作等主动教学方法为主要变量, 同时用讲授为主作为参照变量, 主动教学按 1 (“从未”) 到 5 (“总是”) 五点计分。

**教学满意度:** 主要评价与学生学习有关的师生互动满意度、学业支持满意



度与校园文化满意度，教学满意度按 1（“极不满意”）到 5（“非常满意”）五点计分。

###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工科生主动学习总体特征描述。表 2 的调查结果表明，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整体得分较低，主动提问得分最差，均值仅为 2.80（SD=1.096）。与美国高校工科本科生相比，我国工科本科生主动提问频率显著偏低（参考 NSSE 调查数据），选择“从未提出自己的问题”比例高达 12.7%（美国仅 5%），25.6% 的工科生选择“经常”或“总是”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问题（美国工科生占比 60.0%）。由于工科与非工科属于二分类变量，研究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分析工科生与非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差异（后续性别差异分析与此相同）。在表 2 中，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各子变量得分均低于非工科生，其在主动参与上得分均值显著低于非工科生均值（ $p < 0.001$ ），而在主动提问与主动响应上的得分与非工科生相比仅存在数值上的差异。这一结果意味着，工科生并非主观上不愿意参与主动学习，而有可能是外部因素制约了工科生的主动学习，比如工程学科知识的复杂性、工科教师教学风格的特殊性等。

表 2 工科生与非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比较

比较指标	学科大类	均值	标准差	U
主动参与	工科	3.24	0.961	2278596***
	非工科	3.38	0.965	
主动提问	工科	2.80	1.096	2400670
	非工科	2.86	1.091	
主动响应	工科	2.26	0.994	2402359
	非工科	3.32	0.999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不同性别工科生主动学习特征。表 3 所示的分析结果显示, 男生主动学习水平显著高于女生, 男生在主动参与 ( $p < 0.001$ )、主动提问 ( $p < 0.001$ )、主动响应 ( $p = 0.031 < 0.05$ ) 三个变量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这一调查结果与史静寰等人针对全部本科生的主动学习调查结果相左, 其中原因可能是由于女生占比较低, 工科教师在教学中忽视了女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未能充分考虑其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风格等特征, 尽管采用了主动教学的方法, 但这些基于主动学习的教学并不适用于女生, 进而导致她们的主动学习水平始终低于男生。考虑到主动学习能够提高工科生学习兴趣和投入, 在低水平主动学习的制约下, 女生学习工程的兴趣与投入也将低于男生, 女生的学习效果也将低于男生。

表 3 不同性别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比较

比较指标	性别	均值	标准差	U
主动参与	男	3.30	0.97	565208***
	女	3.14	0.96	
主动提问	男	2.86	1.1	568003*
	女	2.68	1.1	
主动响应	男	3.30	1.01	593114***
	女	3.21	0.99	

不同教育背景工科生主动学习特征。从学校类别 (如表 4) 来看, 普通高校本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显著高于一流大学高校本科生与一流学科高校本科生, 在主动参与 ( $p = 0.009 < 0.05$ ) 和主动提问 ( $p < 0.001$ ) 两个指标上得分较高, 三类高校本科生在主动响应指标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515$ )。与前述分析结果类似, 史静寰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我国一流大学 (“985 工程” 高校) 本科生主动学习水平不如普通高校 (地方高校)。本研究的推断为: 受工程教育规模扩大的影响, 我国一流大学高校的工科教学可能大班讲授教学依旧普遍, 主动学习尚未成为推崇的教学方法。

从年级差异（参照表4）来看，我国工科本科生的主动学习水平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总体趋势，即大一、大四工科生在主动参与（ $p=0.025<0.05$ ）、主动提问（ $p=0.008<0.05$ ）、主动响应（ $p=0.024<0.05$ ）三个变量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工科生。以往研究发现，低年级本科生的学习存在一个适应阶段，因而低年级本科生的主动学习水平会低于高年级本科生。基于调查结果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工科本科生的学习既是一个适应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兴趣积累的过程。在低年级，由于工科类专业性课程较少，故而在入学后一定的阶段工科生的主动学习水平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在高年级，随着工科生对本科阶段的学习适应性加强以及大量专业课程的开设，其主动学习水平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表4 不同教育背景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比较指标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F
主动参与	学校	一流大学高校	3.24	1.008	4.722**
		一流学科高校	1.19	0.945	
		普通高校	3.34	0.922	
	年级	大一	3.32	0.952	3.121*
		大二	3.24	0.947	
		大三	3.22	0.956	
		大四	3.14	0.994	
	主动提问	学校	一流大学高校	2.67	1.13
一流学科高校			2.80	1.093	
普通高校			2.94	1.037	
年级		大一	2.9	1.135	3.968***
		大二	2.78	1.076	
		大三	2.69	1.052	
		大四	2.78	1.104	

主动响应	学校	一流大学高校	3.24	1.025	0.665
		一流学科高校	3.26	0.991	
		普通高校	3.30	0.955	
	年级	大一	3.36	0.982	3.157*
		大二	3.24	0.994	
		大三	3.19	0.993	
		大四	3.23	1.003	

工科生主动学习影响因素层次回归分析。为进一步探究影响工科生主动学习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利用 AMOS24.0 软件对主动学习水平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拟合度良好（ $p < 0.001$ ， $CFI = 0.992 > 0.95$ ， $TLI = 0.985 > 0.95$ ， $RMSE = 0.054 < 0.08$ ）。结合模型路径系数，可构建如下主动学习水平模型：

$$AL = (1.082 \cdot AP + 1.152 \cdot AQ + 1 \cdot AR) \div (1.082 + 1.152 + 1)$$

在对教师主动教学数据进行清理的基础上，得到了包含所有主动教学方法的全样本有效样本 2213 份。依据前述主动学习水平模型与层次回归模型对工科生主动学习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得到如表 5 所示的层次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模型的整体解释力为 0.305，五个预测变量的影响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p$  值均小于 0.001）。随着纳入变量的增多，模型解释力稳步提高。

表 5 不同教育背景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阶层	预测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性别	女（参照男）	-0.074***	-0.067**	-0.064**	-0.055**	-0.051**
专业兴趣	自主选择专业		0.019	0.020	0.026	0.004
	专业推荐度		0.161***	0.151***	0.100***	0.056***
学业发展目标	硕士研究生（参照本科生）			-0.009	0.035	0.030
	博士研究生（参照本科生）			0.121***	0.148***	0.135***

教师 主动教学	讲授为主				0.000	-0.045*
	讨论为主				0.166***	0.141***
	小组项目				0.075**	0.079**
	课堂汇报展示				0.067*	0.036
	实地调研				0.224***	0.213***
	实验操作				0.024	-0.014
教学 满意度	师生互动					0.199***
	学业支持					0.072**
	校园文化					0.021
常数项		3.296	2.731	2.699	1.336	0.854
F		12.131**	25.402***	23.036***	66.012***	69.031***
R <sup>2</sup>		0.005	0.032	0.047	0.244	0.301
$\Delta R^2$		0.005	0.028	0.016	0.198	0.057

在表 5 中，当预测变量只有性别时，性别对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回归系数为 -0.074，性别解释了主动学习水平变异的 0.5%，表明男性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工科生，验证了假设 1。

将专业兴趣变量纳入到回归模型以后，性别对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有所降低，模型对主动学习水平的解释变异达到 3.2%。其中，自主选择专业对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入学前专业兴趣不影响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专业推荐度显著影响主动学习水平，说明工科生入学后的专业兴趣越浓厚，主动学习水平越高，从回归系数来看，专业推荐度对主动学习的影响要高于性别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部分验证了假设 2。从模型 3 来看，学业发展目标对工科生主动

学习水平的影响 ( $\Delta R^2=0.016$ ) 介于性别 ( $\Delta R^2=0.005$ ) 和专业兴趣 ( $\Delta R^2=0.028$ ) 的影响之间，以博士研究生为学业发展目标的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显著高于以本科生为学业发展目标的工科生，以硕士研究生为学业发展目



标的工科生主动水平与以本科生为学业发展目标的工科生之间不存显著差异，部分验证了假设 3。

模型 4 说明，教师主动教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最大（ $\Delta R^2=0.198$ ），在加入教师主动教学变量后，模型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解释力大幅提升，解释变异达到了 24.4%。模型 4 显示，传统被动讲授教学和实验操作教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讨论为主教学和实地调研教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最大，部分验证了假设 4。

模型 5 加入了教学满意度变量，其整体解释变异为 30.1%。在模型 5 中，师生互动满意度和学业支持满意度显著影响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校园文化满意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不显著，师生互动满意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高于学业支持满意，部分验证了假设 5。综合模型 4 和模型 5 可以发现，在纳入教学满意度变量前，课堂汇报展示教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有显著影响，纳入教学满意度变量后，课堂汇报展示教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工科生对汇报展示教学的满意度，特别是对汇报展示教学的师生互动满意度较低，课堂汇报展示教学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商榷。另一方面，纳入教学满意度变量后，讲授教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虽然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只有在教学满意度相同的情况下，讲授教学才会对工科生的主动学习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仅为 -0.045）。

####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 2019 年“中国本科教与学调查（CCTL）”数据对全国六千余位本科生进行了调查，并对我国高校工科本科生主动学习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高校工科生课堂提问频率低于美国高校工科生，12.7%的工科生在课堂上从未主动提出问题；工科生主动参与得分均值为 3.24，显著低于非工科生。研究验证了假设 1，即男性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工科生。

第二，教师主动教学是影响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最为重要的因素，教师主动教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变异的解释水平最高（ $\Delta R^2=0.198$ ），教师采用

讨论与实地调研等主动教学方法越多，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越高。层次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只重视主动教学方法（如课堂汇报展示教学）的使用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提升，采用传统讲授教学也不意味着一定会降低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

第三，教学满意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有重要影响，工科生师生互动满意度、学业支持满意度越高，其主动学习水平也越高。数据也表明，工科生对校园文化的满意度不影响其主动学习水平，由于缺乏定性证据，这一推断可能并不准确。第四，学业发展目标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工

科生主动学习水平，以博士研究生为学业发展目标的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显著高于以本科生为学业发展目标的工科生。可能的解释是立志读博的工科生致力于长期从事学术职业，其对学习的积极性较高，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主动性。

本研究最为重要的发现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满意度都是影响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重要因素，单独强调主动教学并不一定能提升工科生的主动学习水平，传统讲授法的使用也不一定就会降低工科生的主动学习水平。从学理上来看，主动学习与传统讲授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与教学有效性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费尔德在推广主动教学时，介绍了一种在大班讲授教学中穿插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小型学习活动的主动教学方法，并认为教师只要能够确保学习活动与课程内容高度相关、每个学习活动的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以内，就能够在不打乱已有课堂讲授秩序的情况下，提高教学有效性。在各类教学满意度指标中，师生互动满意度对工科生主动学习水平的影响最大，工科生师生互动满意度越高，其主动学习水平越高。在实际教学中，师生互动可以分为教师主导互动、教师引导互动、学生主导互动等多种互动形式，工科教师在实施主动教学方法时，应采取多样化的生师互动形式，满足不同工科生的实际学习需求，提高工科生的主动学习水平。